

公益慈善周刊



2014年8月3日

2014年第28期(总第128期)

恳请读者为《公益慈善周刊》投票

各位公益同仁，您们好！

《公益慈善周刊》自2011年12月13日创办以来，旨在运用电子邮箱、NGOCN、新浪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为全国的公益人提供优质专业的资讯。截至到2014年8月3日，共发布了128期。三年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除重大节假日外，我们保证每期周刊每周一准时出现在公益同仁的邮箱里，陪伴大家开始崭新的一周。

2012年5月21日，我们开通《公益慈善周刊》的新浪微博，每周一发布最新的《公益慈善周刊》供读者下载。2013年11月11日，《公益慈善周刊》微信公众号开通，提供专业的公益资讯。在2013年底的读者调查中，公益同仁们给了我们不少的鼓励与建议。我们也欣喜的发现，《公益慈善周刊》的订阅读者或者机构有近9000个，覆盖80000左右的公益人。我们相信，在做公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孤单，每个公益人都很幸运，而我们也希望一直陪伴着大家，一同见证中国公民社会与公益事业成长！

现在，我们参加“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新媒体创新奖”的评选，恳请大家投上宝贵的一票，支持《公益慈善周刊》入围，谢谢！您的支持将鼓励我们继续前行！

投票请点击：<http://2014.appku.org/Home/Index/showProduction/id/137>

关于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

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简称安平奖）由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北京北广传媒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旨在通过评选优秀公益传播作品，倡导并推动客观、公正、深入、有创意、有担当的公益报道与传播实践，致力于“成为公益新闻传播领域价值引领的风向标”。

◎政策点击

- 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通知 4
-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 6
-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7
-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李毅中会长在“2014 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11

◎专家视野

- 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 18
-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谁在治理中国乡村？ 28
- 徐永光、金锦萍：基金会不应为个体救助发起募款 31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培峰：中国基金会仍处于初级阶段 公信力建设等存不足..... 34
-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政府购买服务“一笔过”，广州取错了经吗？ 38
- 刘洲鸿：公益专业人士的长江求学之路 39

◎行业观点

- 人民日报：几乎每一次慈善捐献都有行政命令参与 42
- 人民政协报：应对“威马逊”凸显公益组织老难题：信息不透明缺乏良性互动平台..... 43
- 公益时报：“威马逊”救援：期待社会组织定位更准确 45
- 京华时报：近八成受访者认为捐赠人有权收回捐款 48
- 文汇报：谁为社会组织人力成本埋单 51
- CSR 环球网：麦田计划的 4 个 100 万故事：善款难得，更要善选善用 53
- 公益时报：解析我国儿童大病救助的慈善模式 56
- 公益时报：儿童大病救助机构怎样合纵连横 60
- 善达网：别把公益众筹做成“化缘” 63
- 【十问资助者】伍松：如果我们做到 35 万所学校的 10%，也许改变就会发生 64
- 【鸿芷】阿里公益基金会 Q&A 四部曲（一）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是如何运作的..... 68
- 【鸿芷】阿里公益基金会 Q&A 四部曲（二）阿里员工做公益委员如何确保专业性..... 73
- 顾远：社会企业的品牌营销之道 75

◎行业动态

- 2014 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行业协会发展须转型提质 83
- 《现代慈善与社会治理——2013 年度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报告》出版 84
- 北京市认定新一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 85

深圳 1700 多家公益组织面临“断粮”危险	86
NGO 在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领域内的探索和实践	90
重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联席会首届会员大会召开	95
◎公益人	
“背叛”商业之后，他们怎么活？	99
刘小钢，公益行业尊称她“小钢姐”	108
◎国际观察	
联合国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减灾需贯穿始终 救灾应依托本地 重建至少需十年	112
比特币捐赠在美国初现峥嵘	114
泰国创变者们怎么玩儿的？	116
好时公司企业传播与社会责任国际部总监唐少瑰：企业做公益要考虑员工参与度	117
◎企业社会责任	
全球社企孵化器研究报告	121
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落幕	124
2014《中国企业公民排行标准》发布	126
国内首份《商学院责任教育现状评估》报告发布	127
通用磨坊公司承诺采取行动改善气候变化	129
◎专题报道：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	
徐永光：文化凝聚、慈善传统、信托管理是家族财富传承的三大密码	131
王振耀：中国的企业家能否创造类似联合国的慈善项目？	132
家族基金会与家族传承分论坛实录	133
华人七大家族荣获“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奖”	137
◎公益布告栏	
安平中国·2014 北大公益传播奖邀您参评	140
美国影响力投资高级哈佛大学访学团开始报名 截止 8/31	142
2014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公众教育小额资助项目招标公告	144
凉山社会性别与艾滋防治研究会寻求项目支持	146
“青杏网”青年发声性教育资助计划开放申请	148

◎政策点击

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通知

民发〔2014〕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各司(局),全国老龄办,各直属单位:

《“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已经2014年5月19日民政部第9次部长办公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民政部

2014年6月3日

“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2014年5月19日第9次部长办公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确保评选表彰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鼓励更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慈善事业,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和《民政部表彰奖励工作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由民政部负责实施,每两年举办1届,旨在表彰我国慈善领域事迹突出、影响广泛的个人、企业、机构和项目。

第三条 每届“中华慈善奖”具体奖项设置根据慈善事业发展情况和特点确定,表彰名额原则上不超过50个;同时设立提名奖,原则上不超过100名。

第四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库由党政军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媒体、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代表和热心慈善事业的个人组成,共设100个席位,其中机构席位70个,个人席位30个。

第五条 每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启动前,民政部自评委库中选取25名评委组成当届“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其中包含8名指定评委,由民政部领导和相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其余为随机抽取。

担任评委的机构,应选派其负责人作为代表履行评委职责。

评委个人或其所代表的机构参加“中华慈善奖”评选时,实行“回避”制度。

第六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成立后,下设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民政部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办公室可选择有资质的行业性、联合性慈善组织以及富有广泛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开展合作。

第七条 “中华慈善奖”候选对象由推荐和自荐两种方式产生。推荐和自荐的候选对象申报“中华慈善奖”时，应提交能够证明其对慈善事业发展所作贡献的文字或影音材料。材料应真实、准确、详细。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按照属地原则接受个人、企业、机构或项目的推荐或自荐，完成初选工作，确定拟推荐候选对象，向“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办公室进行推荐。

第九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办公室同时受理来自中央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全国性社会组织，港澳台地区等关于个人、企业、机构和项目的推荐或自荐。对于自荐材料，评委会办公室将向自荐者所在地省级民政部门或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第十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办公室统筹研究候选对象在慈善领域的贡献程度、社会影响、区域和行业布局等因素提出当届“中华慈善奖”建议提名名单，报评委会审核同意。

第十一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办公室将提名名单在民政部门户网站等网络媒体公示，接受公众网络投票。

第十二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独立对提名名单进行甄选、投票。评委所投选票需附个人签字方有效。

第十三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综合评委投票情况并参考网络投票情况提出拟表彰名单。

第十四条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办公室将拟表彰名单在相关媒体进行为期两周的公示，并向相关单位和部门征求意见。

公示和征求意见后，报民政部部长办公会议审议确定表彰名单。

第十五条 未入选表彰名单但入选提名名单且公示无异议的个人、企业、机构和项目获提名奖。

第十六条 民政部采取适当形式对获奖者进行表彰。

第十七条 累计10年或今后连续5届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个人，可授予“中华慈善家”荣誉称号，作为终身荣誉，此后可不再参评“中华慈善奖”。

参评企业、机构和项目不受时间和届次的限制。

第十八条 被推荐或自荐参加“中华慈善奖”评选的个人、企业、机构或项目，填报评审材料或者在网络投票中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6年内不得再行申报。

获奖者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对其已获奖项予以撤销。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05年发布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同时废止。

来源：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shflhshsw/201407/20140700674145.shtml>

[【返回目录】](#)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 通知

（民发〔2014〕1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财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财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财务局：

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推进社会团体依法自治，激发社会团体活力，现就社会团体会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通知》发布之日起，社会团体通过的会费标准，不再报送业务主管单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部门备案。

二、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可以向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收取会费。

三、社会团体可以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工作成本等因素，合理制定会费标准。

会费标准的额度应当明确，不得具有浮动性。

四、社会团体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应当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应当有 2/3 以上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出席，并经出席会议或者会员代表 1/2 以上表决通过，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除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以外，不得采取任何其他形式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

五、社会团体应当自通过会费标准决议之日起 30 日内，将决议向全体会员公开。

六、社会团体会费应当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该社会团体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

社会团体应当每年向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定期接受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并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填报会费收支情况。

七、社会团体收取会费，应当按照规定使用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除会费以外，其他收入不得使用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八、社会团体会费标准的制定、修改，以及会费收取、使用和管理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部门应当对社会团体会费的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九、社会团体收取会费不符合本通知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规定的，社会团体会员有权拒绝缴纳，并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3〕95号）、《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的通知》（民发〔2006〕123号）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同时废止。

民政部 财政部

2014年7月25日

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

地址：<http://www.chinanpo.gov.cn/2351/78921/index.html>

[【返回目录】](#)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陕政办发〔2014〕107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规范和推进我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精神，现就我省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进一步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准入，改革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

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推进“三个陕西”建设。

（二）基本原则。

——积极稳妥，有序实施。立足省情实际，准确把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突出重点，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稳步推进，有序实施。

——科学安排，注重实效。坚持精打细算，与财力相适应，突出公共性、公益性，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升政府购买服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开择优，以事定费。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费随事转，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力量，确保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平等参与竞争，加强监督检查和科学评估，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

——改革创新，完善机制。推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新机制。

（三）目标任务。

“十二五”期间，首先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推开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初步形成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相关制度法规初具雏形；到2020年，在全省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

二、基本内容

（一）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主体是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具体条件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具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社会和商业信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良好记录，并符合登记管理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条件，具有由购买主体会同财政部门根据购买服务项目的性质和质量要求而确定的承接某项具体服务的具体承接条件，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购买服务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

（二）购买服务的主要内容。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内容为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保密事项以及司法审判、行政行为等不适合向社会力量购买，以及不属于政府职能的服务项目外，下列事项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交由社会力量承担：

1.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人才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基本养老服务、优抚安置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基本公共安全服务、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市政管理、三农服务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2. 社会管理服务事项。社会组织管理、社区事务、社工服务、法律援助、慈善救济、公益服务、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司法鉴定、公共公益宣传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3. 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行业规划、行业规范、行业职业资格认定、行业调查、行业统计分析、贸易纠纷诉讼、处理行业投诉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4. 中介技术服务事项。项目评估、项目评审、检验检疫检测、技术服务、业务咨询、资产评估、审计服务、绩效评价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5. 其他公共服务事项。法律服务、决策咨询、课题研究、会议经贸活动、展览服务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力状况等因素，在准确把握公众需求的基础上，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动态调整，符合条件的项目应逐步纳入政府采购目录(服务类)。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要向社会公开。

（三）购买服务的程序和方式。

政府购买服务原则上按照部门预算和政府采购的程序和方式组织实施。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各项程序规定，建立以项目申报、项目评审、资质审核、组织采购、合同签订、项目监管、绩效评估、经费兑付等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购买流程，有序开展工作。购买方式主要有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也可根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特点，采用委托、承包等方式选择承接主体。严禁转包行为，杜绝违法分包，确保购买服务的质量。

（四）资金和绩效管理。

购买主体所需资金从其部门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或经批准使用的项目支出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在部门预决算中明细反映。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发展所需增加的资金，应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列入政府购买服务预算，逐年予以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由各部门依据购买服务合同按规定程序支付。

要加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价管理。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评价范围不仅要包括购买服务的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还要对承接项目的社会力量的服务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度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和选择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协调，立足本地实际，认真研究制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具体政策措施，按照“先易后难、积极稳妥”的原则，认真组织实施。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认真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积极推动相关制度建设。

（二）健全工作机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涉及面广，要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共同监督的要求，建立“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牵头，民政、工商行政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职能部门履职，监督部门保障”的工作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全省各级政府要在政策制定、资金扶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支持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发展；财政部门牵头负责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监督、指导各类购买主体依法开展购买服务工作，做好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管理、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机构编制部门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目录进行审核；民政、工商行政管理以及行业主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执法、评估等监管体系，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负责核实社会组织的资质及相关条件，向购买主体提供社会组织名录；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审计。购买主体负责购买服务的具体组织实施，在项目完成后组织考核评估和验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做到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三）严格监督管理。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不得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购买主体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承接主体应当健全财务报告制度，并由具有合法资质的注册会计

师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相关管理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分工加强监督，对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予以处罚、处分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做好宣传引导。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和相关要求，做好政策解读，加强舆论引导，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7月18日

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地址：<http://www.shaanxi.gov.cn/0/104/10546.htm>

[【返回目录】](#)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李毅中会长在“2014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尊敬的顾秀莲副委员长，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

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2014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在这里召开。本次论坛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及各主办单位，向出席论坛的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来宾，各行业协会代表以及媒体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形势下行业协会的转型与发展”，借此，我想谈几点想法。

一、把握社会组织改革方向，妥善处理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责权、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央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一系列论断和要求，积极献计献策，推动行业协会改革顺利进行。

（一）社会组织改革任务清楚，方向明确，已开始布局启动

一年多来，国务院共分批取消和下放了 416 项行政审批事项，对政府向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进行了制度设计。工信部把全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职能交给轻工联合会，委托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和中国船级社共同开展船舶企业评审；民政部取消了社会组织分支（代表）机构的登记审批制度，由社会组织自主设立；财政部印发了《2014 年政府采购工作要点》；人社部正在研究逐步建立由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开展水平评价的职业资格制度等。各地也先后出台了政府购买服务有关实施意见，部分省区市还制定了指导性目录。上海明确将行业评估论证、技能资质考核、行业调查、行业统计等事项转移或者委托给行业协会承担；深圳市已把六成职称评定交由行业组织承接，力争今年全部转移至行业组织。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于政府部门推进社会组织改革的布局，引起行业协会商会的普遍关注。大家希望政府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统筹考虑、全面论证、分类指导、科学决策。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下一步改革有必要、有条件、有基础制定行业协会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方案、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加强登记机关、行业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协同配合，要充分考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关切和诉求，防止改革中考虑不周。同时行业协会改革情况复杂，困难和阻力不小，仍需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要根据各类协会的不同特点，分类指导，稳步推进，不断总结提高。

在市场活动中，行业组织是连接企业和政府的纽带。行业协会通过给政府和企业搞服务、办实事，包括编制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技术推广与交流、质量管理和标准制修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开展服务，确立自己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

（二）深入调查研究，妥善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近两年来，有关部门制定行业协会改革的具体方案，也征求了行业协会的意见。大家反映，改革方案还存在一些不成熟的、或不大符合现状的问题，需要从行业协会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采取相应对策，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中的难点和问题。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实现人财物分离，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关系到行业协会定位和未来发展。脱钩不是简单地甩掉财政包袱，更重要的是去行政化，走市场化，让行业协会自主自立，成为市场主体。“脱钩”对行业协会来说是一个逐步稳妥“放生”的过程，不能简单处理，一放了之。推动改革要正视国情，慎重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

目前，“脱钩”存在的主要难点和问题：一是职能定位不清。对于如何准确定位行业协会商会的地位，厘清政会关系，还不清晰。对于脱钩的核心问题，行政管理和服务功能相分离缺乏探索。二

是行业协会产权不明晰。“脱钩”以后，行业协会的资产要合理界定，以给协会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三是政府培育扶持是现阶段行业协会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不可一脱了之。“脱钩”以后，政府如何做好行业协会的扶持工作，配套政策如何跟上，社会保障如何体现公平。四是如何处理全国性行业协会属地化以及和代管协会、直属事业单位的关系。1998年国务院撤销了10个工业管理部门，成立了相关行业协会，大量政府事务性、行业性工作交由行业协会承担，下属和代管单位是开展工作的基础力量。此外，如何看待和解决在职领导干部、离退休领导干部在协会任职的问题，如何保持长期积累付出代价形成的行业管理体系，也是改革的难题。

其次是不少同志反映重要行业应妥善处置“一业多会”。探索“一业多会”，目的是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增强其自主性和活力。探索“一业多会”，应该充分考虑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层面应该有不同解释。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一业多会”是不利于行业管理的，容易造成行业分散化；至于行业内部按照不同的业务成立多个协会是适当的。另一方面，探索“一业多会”并不意味着实行同质化的低水平无序竞争。如果在行业领域、业务范围、会员主体、活动地域等方面实行同质化的无序竞争，会使行业企业无所适从，容易给行业发展带来混乱。

再就是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有待完善。从近年来全国各地出台的关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实现“应买尽买”目标是重要指向，但是，实行中已经凸显出一些问题。大家反映，比如程序不够严密科学、过程不够透明公开、监督不够及时有力、购买标准不够市场化、有失公平等；一些地方是明转暗不转，大多数转给了下属事业单位，还是“内部循环”。需要进一步完善购买公共服务机制，规范购买流程与强化社会组织评估和服务。

二、行业协会地位重要，在助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近7万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800多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共参加国际组织403个，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有157家。行业协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主体和力量。

（一）行业协会地位独特，具有服务经济社会的明显优势

行业协会具有跨地区、跨所有制的组织优势和工作优势，突破了部门与地区界限，链接产业上中下游，对产业有深刻了解和把握，具有专业、信息、人才、管理等市场资源优势。目前全国有1500多万家企业，绝大部分规模以上企业都是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这赋予了行业协会动员和整合资源的独特优势，能够获得来自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信息与信赖。当前，行业协会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中，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国性的工业行业协会，大多是由原行业行政管理部门沿革产生的，队伍骨干大多有比较丰富

的行业管理的阅历和经验，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特别是近十年在为政府、为企业服务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进一步发挥这些协会的优势，对保障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业协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效果

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特别是在克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承接行业统计，发布行业信息，协助政府做好经济运行的监测预测。如，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加大行业统计和信息工作力度，实现了大型企业统计直报、行业信息快速报送。又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对产能产量价格指数的统计，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有色金属产业月度景气指数报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全国发电用电量及时准确的公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月度产销统计和分析报告，中国工经联正在策划发布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指数等。这些信息发布在协助政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应对危机、调整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引领行业健康发展。例如，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公共技术开发平台的服务工作，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行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行业发展纲要的制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电力体制改革方面中的研究等，对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行业性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制定发布《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石油和化工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研究报告》，指导了行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了扩大铝材应用，化解产能过剩、促进节能减排的重大措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引导行业企业推行绿色制造、低碳制造、柔性制造，促进了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研究行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行业企业发展服好务。例如，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动开展行业重大问题调查研究，提出政策解决方案，仅围绕棉花管理体制问题，联合会实地走访的棉纺企业就达到1500多户，形成了多份政策建议报告，在棉花政策调整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深入行业、企业调研，及时反映轻工行业运行特别是出口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扩大出口。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积极反映改进鼓励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特别是鼓励水泥质量升级的差别优惠退税政策。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整合多个行业协会，日前宣告成立，立即着手研究电子制造业和通信业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四，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企业走出去。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各种摩擦不断增多，按照国际惯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协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贸易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行业协会具有快速反应的组织优势。如，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行业

组织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协助企业开展损害诉讼。各行业协会主办了各种技术、装备、产品展览和论坛,支持企业开展国际交流、拓展国际市场。

第五,加强行业内部协调和自身建设,提升了企业文化和道德风尚。行业协会通过参与市场监管、市场诚信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攻关、慈善公益等行为和手段,增强了行业和企业内生动力和发展质量,营造了诚信经营、团结协作、行业自律、担当社会责任的现代企业文化和道德风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升。

三、行业协会要破解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发展

(一) 行业协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应该看到,协会发展还与整个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突出的困难和问题是:

一是行业协会立法滞后,行业协会的职能不明确。协会立法是协会实现自治的基础和保障。行业协会的立法酝酿多年,但是没有突破性进展。我国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属于程序性法规,侧重于登记管理,难以为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制度保障。对行业协会在法律定位、组织原则、社会地位和职能作用等方面没有明确的界定,与条例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制度尚未出台,这是制约行业协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二是协会税费负担过重,不少行业协会生存发展存在较大困难。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未能得到有效实施,行业协会义务承担了大量行业管理基础性工作。行业协会税收制度不完善,缺少对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资助和有偿服务收入的税收优惠政策,许多税收制度参照企业设计,无法体现行业协会公共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

三是行业协会面临人才困境。大多数行业协会的经费不足,难以留住人才,专职人员数量较少。作为行业代表性组织,行业协会对人才的要求较高,而现实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行业协会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和保障制度,许多行业协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待遇较低。“引不来”和“留不住”的问题日益突出。

(二) 行业协会要自立生存、自强发展、自律共进

行业协会正面临一个重大发展机遇期,能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勇于担当,释放活力,发挥作用,是一次生存与发展能力的考验。

——坚持自立生存,拓展服务路径。全面融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全局,自主探寻市场化的服务路径,自主开拓生存发展空间;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管理制度改革,摆脱依附政府的观念和体制束缚,增强发展活力;自主开展内部管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

行业协会和政府脱钩是势在必行,职能上去行政化,财政上取消事业费,协会面临的问题自然

是解决经费来源。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立足服务宗旨，为政府、社会、行业、企业服务，为会员服务，以自身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满足服务对象的要求，取得良好的成果，以付出辛勤劳动的价值换回合法合理公平的回报。市场是广阔的，需求是存在的，竞争也是激烈的。不能等、靠、要，不能企盼恩赐过日子，只有自立，才能生存。

——**坚持自强发展，增强内生动力。**行业协会不但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发展得好，就要做到努力提升“三种能力”：一是提升自身建设能力。要建立健全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协会的自我管理、自我运作和自我发展能力。二是提升服务会员能力。坚持“四个服务”，突出做好为会员的服务。不断丰富服务会员内容，创新服务方式，为会员维权提供制度保障，为会员交流合作搭建平台，真正把协会办成会员之家。三是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要不断增强创新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凝聚行业力量，创新工作思路，打造品牌项目，提升专业管理水平，引领企业开拓市场。

——**坚持自律共进，守法诚信，健康发展。**行业协会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设立和运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依法进行自我治理，严格遵守国家劳动关系、财税管理等制度要求；自主规范会员行为和协会自身行为。要建立健全行业自律性管理制度，制定并组织实施行业职业道德准则，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建立完善行规行约，规范会员企业行为，主动协调会员企业关系，为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促进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 **加快行业协会立法进程，以满足当前行业协会发展的紧迫需要。**推进改革要依法行事，行业协会法应该是呼之欲出了。建议将行业协会立法工作列入国家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如果近期出台法律有难度，应先期修订出台相关国务院法规，保障行业协会规范化运作。建议立法关注以下内容：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明确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范围、事项、时限和要求，明确行业协会的运行机制。建议有关政策出台前广泛听取行业协会意见，反映行业协会的真实诉求，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要让行业协会更多参与立法过程，集中表达行业或领域内的共同意愿，提高立法质量。

(二) **改革的有效实施应当做到保障在先。**政社分开要实现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必要的外部监管和服务保障必须同时跟上，社会的配套改革要相应协调进行，要慎重把握关键问题。如针对产业体系的系统维护要慎重处理好协会间的代管关系，重视事业单位在产业体系中的作用；保持政策延续，处理好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资产的界定和处置上要考虑协会生存发展和事业贡献的实际需要等。

(三) **加大扶持力度，培育行业协会发展壮大。**建议建立财政支持行业协会发展的政策体系，

通过建立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制度、公共财政资助和奖励机制、行业协会发展专项基金和培育孵化基地等措施，多渠道扶持行业协会发展。完善行业协会税收优惠政策，简化税收减免程序，扩大税收优惠种类和范围，逐步建立统一、合理、普惠的行业协会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四）落实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加快落实政府转变职能，把适宜于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行业协会，进一步拓展行业协会有关标准制定及测定评估的功能。建立政府委托行业协会工作目录并动态调整，经费应公平公开按时给付，购买服务的资金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购买服务的资金由行业协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支配和使用，不以专款专用的方式管理。

（五）推进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健全行业协会人事管理、社会保障、人才交流、职称评定等政策，逐步推进职业资格制度，着力培养一支了解国情，熟悉行业，洞悉市场，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管理能力的协会管理职业化队伍，促进协会工作人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优化。配套研究建立行业协会工作人员薪酬制度，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促进行业协会可持续发展。

（六）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参与协商民主的机制体制，确立行业协会协商民主的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首次把社会组织列入国家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形式和渠道之一。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要认真研究建立健全保障行业协会参与协商民主建设的体制机制，提高协商的能力与水平。建议在人大、政协增设行业协会代表名额，使行业协会参与协商民主制度化、机制化。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我们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主动适应，自觉转型提高，按照现代社会组织的功能要求，不断加强协会的自身建设，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协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网站

地址：<http://www.cfie.org.cn/2710757099819/2710757099826/14727/2807716724737.html>

[【返回目录】](#)

◎专家视野

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

作者简介：王浦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

内容摘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总部署的关键性范畴。基于中国国情、政情、社情，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范畴的内在含义，辨析其间相互关系，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设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基础。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和中国的国情，分析解释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分析阐发了其间的包容性关系、交集性关系和区别性联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本含义；相互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①。为此，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历史进程的定向南针。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治理”是关键性概念，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到事业单位法人治理、公司法人治理、学校内部治理、社区治理，“治理”概念在《决定》中被明确直接提及24次之多。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不同层次上的“治理”概念，主要涉及治理活动的三个基本概念，即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被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则成为《决定》所确定和阐发的重要改革内容。因此，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及其相互关系，实是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和内容的关键环节。

然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作为21世纪初在我国学术界兴起的学术概念，其学术定义和内涵认识呈现多样性，迄今尚未形成普遍认同和共识。在全面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历史进程中，基本认知的歧意却可能成为改革共识的思想困结，从而使得全面深化改革实践面临路径选择和实施方案的分歧或阻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清我国与西方学术界关于治理实际具有两套不同的话语，基于我国国情政情社情，科学解析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

内在含义，分辨和厘清其间的联系与差异，对于我们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在国家治理和深化改革的基本范畴上达成共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实施，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基础意义。

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展了治理理论和实践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化发展，西方治理理论与中国本土治理理论的错位现象逐步凸显，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实践表明，治理理论只有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理想的重塑。^②因此，基于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运行治权以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扬弃性地批判吸收西方治理方式的有益内容，确定我国国家治理和发展话语语境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是把握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认知任务。

（一）国家治理的基本含义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家治理通常是指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实际上，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研究，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命题和内容，比如老子所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他所形容国家社会长期安定太平的“长治久安”，就是针对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活动而言的。

西方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原为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20世纪末，西方学者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发展至今，西方治理理论已经形成多个流派，尽管如此，立足于社会中心主义，主张去除或者弱化政府权威，取向于多中心社会自我治理，却是其基本政治主张和倾向。在此基础上，西方治理理论提出“善治”的理念，即以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为标准和规范，缓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③因此，在今天的西方学术话语语境中，“治理”一词主要意味着政府分权和社会自治。

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治理，既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统治者的治理国家，又在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上区别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及其主张。它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即国家的职能由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有机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新中国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治理”和“国家治理”概念的运用，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积极探索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科学民主有效性和有机结合性，探索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治理战略下，两者之间以及两者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组合方式和实现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

确，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在党的文献中持续表达的“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即是国家治理战略和根本要求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典型体现和凝炼表达。

根据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运用和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尤其根据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治理”理论运用和政治实践可知，国家治理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

（二）政府治理的基本含义

从一般意义上讲，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其治理对象和基本内容而言，其包含着政府对于自身、对于市场及对于社会实施的公共管理活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活动和运行机制的复杂化，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多样化，要求政府治理合理化和高效化，由此要求政府治理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予以定位，构建政府与公民合作的共同治理机制。

西方的政府治理理论源于其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基本含义在于强调政府的企业化和政府管理的市场化，尤其主张实现政府管理网络化和扁平化。经过多年流变，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分化形成多种学术流派，从多中心治理、网络化治理，到协同性政府治理，再到整体性政府治理，如此等等。^④尽管如此，西方政府治理的核心命题，在于政府治理社会的权力的分散与集中、政府与社会的冲突与合作、政府机构运行的碎片与协同，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对于政府管理方式和机制变革的要求。

在狭义上，我国的政府体系即是行政体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行政体系是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治权体系，也是承接、遵循和实施人民主权、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有效治理的执行机制。与此同时，行政体系又是在政府治理意义上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达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起建设重要任务的运行平台。由此可见，我国的行政体系是执政党与人民、国家与社会、民主与法治辩证互动的联系结点，而行政体制改革则是推进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和深化实现的重要纽带和实施枢机。

在中国政治话语和语境中，政府治理概念是一个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概念，^⑤其基本含义逻辑地基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含义而形成。在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话语和理论意义上，“政府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行政体制和治权体系遵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规定性，基于党和人民

根本利益一致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供给多种制度规则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和发展公共利益。

按照这一基本含义，我国的政府治理通常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政府通过对自身的内部管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改进政府运行方式和流程，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使得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自身的治理优化，就是要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⑥

二是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有形之手”，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经济和市场治理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⑦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活动和市场活动的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基本格局下，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

（三）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

从运行意义上，“社会治理”实际是指“治理社会”。或者换言之，所谓“社会治理”，就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管理。

社会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奉行社会中心主义和公民个人本位，因此，理性经济人的社会自我治理，在理论逻辑上构成了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本质上即是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社会自我治理理论。“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机构的话，那么21世纪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是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复兴实验过程。”^⑧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⑨按照十八大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⑩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上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治理主要关节点在于“四个坚持”，即“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

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由此体现了社会治理中党和政府的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和谐平衡。

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相互联系

解析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可见，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下，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治国理政。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这一本质联系，规定了它们具有质性的共相，主要在于：

第一，治理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都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确立和巩固的前提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治理活动，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行为的实际体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体格局中运行治权的活动。因此，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都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二，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人民属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规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都是在运行和发展过程意义上稳步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政治的政道本质，由此达成人民民主政治与国家有效治理的辩证统一。如同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时所指出的那样，“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第三，治理共同遵循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实际途径，因此也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要求以法治思维运行治权，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显然，这其中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恰恰分别对应着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鲜明地显示了多种治理共同遵循的基本方略。

第四，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在价值层面，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都在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培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

在制度层面，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都指向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破除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生产力和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国家发展层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共同发展目标。三中全会《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的内容，使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改革目标理性价值。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必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向而行，走向政府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需要说明的是，实现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国家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奋斗目标。早在1954年，党就把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确立四个现代化为国家发展目标。改革开放的主导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四个现代化是根本目标，而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相对于国家发展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实际上是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方式，具有工具理性意义。

在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共同质性的同时，在贯彻和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实践和具体操作中，有必要正确把握三者的外延及其相互关系，以便明确确定三者实施的现实范围和路径。

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外延来看，三者之间又实际呈现不同的联系状况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包容关系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因此，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把国家国体和根本制度内含的价值内涵、巨大能量和潜在活力发挥出来，“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这一根本任务，涉及的领域、事务、规则、制度和价值广及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三中全会《决定》把国家治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作为国家国体和根本制度实现的途径，国家治理显然包含着其他方面的治理，因此，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国家治理体系时指出的那样，“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是总体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分支范畴和子领域。

2.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的交集关系

第一，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之间具有交集联系。国家治理，是实现国家性质、国家发展和国家根本制度要求的治理，是国家共同体的总体治理。在国家政治的权力运行意义上，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和领导国家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体系的整体运行来实现的，而在这其中，国家治理又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体系为代表的治权体系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治理即是国家治权的运行，是国家治理的具体实施和行政实现。

第二，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具有交集联系。从广义上讲，在共和国的人民性和人民的政治共同体意义上，国家治理几乎等同于社会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几乎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从狭义上讲，国家治理是整个国家的治理，而社会治理只是社会领域的治理，为此，国家治理不仅包含社会治理，而且规定和引领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则在社会领域实现国家治理要求和价值取向，体现国家治理的状况和水平。

第三，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具有交集联系。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执政党领导，政府组织和主导负责，吸纳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在这其中，政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而维护保障公民社会权利，完善社会福利，改善社会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则是政府治理的社会职能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治理呈现三种基本状态，即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作共同治理、社会自治。在这其中，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实则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形态和主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论及的社会治理创新，无论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还是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都是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内容。而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作共治、社会自治，在广义上，也是政府治理的紧密相关内容，需要政府在改革进程中，“正确处

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加强对于社会组织的领导和引导。

3.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区别性联系

在外延意义上，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在包容联系、交集联系之外，还具有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性，由此形成了其间的区别性联系。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

(1) 治理主体的区别性联系

首先，国家治理的主体是人民，执政党代表全体人民实施治理国家的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学说，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此明确了国家主权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为此，在人民主权意义上，全体人民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国家权力主体。人民以选举民主的机制选举人民代表作为治理国家的权力主体，实施对于国家的治理。

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国家主权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掌握政权，运行治权，领导人民实施各项国家治理活动。

在国家治理领域，除了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主体和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执政党之外，还有参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有序参与政治和治理的主体。在本质意义上，这些主体是公民的权利主体，他们常常以协商民主方式，参与国家治理，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

其次，区别于国家治理活动，政府治理的主体是指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权力体系意义上的政府。从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来看，政府治理是狭义的政府即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展开的公共治理活动。在政府治理中，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和部门。与此同时，随着行政民主和民主行政的发展，公民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政府治理过程，也在特定意义上构成政府治理的权利主体。

再次，在社会治理中，作为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除了党和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外，还包含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主体。因此，社会治理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合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治理还包含社会自治，在社会自治的组织和体制结构中，党和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指导者，而基层社会的公民则是社会治理的具体运行主体，因此使得社会治理既在直接主体意义上区别于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又在自治主体意义上区别于政府作为主体对于社会的直接治理，区别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民对于社会的合作共同治理。

(2) 治理活动涉及社会关系的区别性联系

国家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治理，因此，在治国理政意义上，国家治理涉及国家的各方面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军事、生态建设等等方面的社会联系。在特定范围和公共事务上，还涉及国际关系和全球关系，涉及人类的共同事务，因此，国家治理是具有最为广泛深厚容量社会关系的治理形态。

由于政府治理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机关为主体的行政治理活动，因此，其涉及的主要是行政关系，或者换言之，政府治理活动涉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本质上主要是政府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政府治理实践中，其具体体现为政府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相形之下，社会治理涉及的社会关系相对复杂。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社会治理主要涉及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关系，比如社会阶层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社会安全关系、人口与血缘血亲关系、社会公共服务关系，如此等等；作为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社会治理涉及的主要是政府行政部门管理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在行政管理意义上，其范围要小于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治理；作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其涉及的社会关系，常常会在政府对于社会进行治理

而发生的社会联系基础上，加上政府与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治理主体与准主体的社会联系；在基层社会的社会自治中，其治理活动和过程中主要发生的社会关系，是公民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联系，当然，党和政府对于基层民主自治的指导和引导作用，也在指导和引导意义上与社会治理发生特定社会联系。

（3）治理活动涉及的内容的区别性联系

国家治理涉及国家安全、稳定、发展、改革和治理的方方面面，涉及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涉及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明确提出，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治国理政的探索中，不断掌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制定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战略方针，决定治理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构成国家治理的主体内容。

政府治理涉及人民意志的贯彻执行，因此，政府治理的内容涉及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同样具有治理范围的广泛性。尽管如此，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政府治理实际涉及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安全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和事业治理。一般来说，政府治理的内容相对具体，在日常的政府运行和治理活动中，多体现为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治理大都以公共政策作为治理工具，在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上，形成相关法律和制度，从而实现制度治理和政府法治。

另一方面，政府治理具有治理政府自身的特点，因此，政府治理涉及到政府自身的机构部门、职位职务、人事财务、程序流程、伦理规范等方面的优化，涉及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的优化，因此，政府治理的内容涉及政府自身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和高效化。

社会治理涉及的通常是公民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一般来说，其涉及内容主要是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安全和秩序、社会保障和福利、社会组织、社区管理等等。所以，社会治理涉及的基本是社会领域的内容。当然，随着社会治理趋向于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社会治理常常涉及国家相关法律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创新。

（4）治理活动采用机制的区别性联系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治理国家和社会，通常采用的基本机制包括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机制、市场经济的权利机会规则意义上的自主平等交换机制、社会自主协商管理的自治机制以及服务特定公益和慈善目的的志愿者服务机制。

一般来说，国家治理凭借、采用的是国家政治权力或者说公共权力机制，这一机制的基本特点在于基于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威强制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和共同意志主张，其强制性来自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实力。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国家权力的权威强制机制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意义，而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或者受权于国家政权，或者依靠国家政权。

在政府行政管理意义上，政府治理通常凭借和采用的是国家权力机制。不过，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政府治理凭借和采用的通常是国家权力或者公共权力中的治权，或者换言之，是国家的行政执行权。一般来说，政府治理需要得到国家权力的授权，其运行的仅仅是国家权力中的治权，其执行的是国家权力的政权意志。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政府向社会成员供给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常常采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施运行，在这一实施运行方式中，包含着政府权威机制、市场交换机制与社会组织机制的组合，尽管如此，这一实施方式中的市场交换与社会组织机制，也都是以政府权力和权威为制度和规则保障基础，在政府授权的条件下得以有效运行的。

在我国社会治理的不同形态中，包含着多种机制。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形态中，运行的是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机制，这一机制本质上是国家政治权力和政府治理权力的运用，这一机制中的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治理，运行的是社会组织机制，参与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运行的是公民权利机制。尽管如此，它们也都是在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基础上运行的。在政府对于社会的直接行政管理中，运行的则是政府的行政权力机制。而在社会自治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则是在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主导下的公民自我管理机制。

注释：

①⑥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11-16。

② 吴家庆、王毅：《中国与西方治理理论之比较》，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③ 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④ 曾维和：《当代西方政府治理的理论化系谱——整体政府改革时代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解析及启示》，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1）。

⑤ 包国宪、郎玫：《治理、政府治理概念的演变与发展》，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⑧ [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⑨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1）。

⑩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参见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09/c1001-19529890.html>。

1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参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7463.htm。

1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参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15/content_1367387_1.htm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自社会学评论

地址：http://www.cssn.cn/shx/shx_zzshx_578/201407/t20140715_1255204.shtml

[【返回目录】](#)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谁在治理中国乡村？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乡村是美好的，农民是纯朴的，当上流社会礼坏乐崩的时候，还可以到乡村、到民间去寻求丰厚的道德积淀。然而，近日以来，乡村治理问题频发，一些地方黑恶势力介入基层治理，性侵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时有发生。当前，乡村治理遭遇何种困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乡村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就此，光明网记者采访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研究员，以下是访谈实录。

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不可或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政府不下县，乡村治理以乡绅治理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乡村治理是人民公社体系，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以行政手段指挥生产、以经济组织形式代替政权组织形式的模式。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经济体制的这一变化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不能再沿用“人民公社”的模式来管理，因此实行了战略化接应。

1983年在农村重新恢复乡政府，198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于1987年开始试行，逐步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用“乡政村治”的模式代替了人民公社模式。

所谓“乡政村治”，包含“乡政”和“村治”两个层面的内容，“乡政”即国家在乡镇设置最低一级政府，代表国家对乡村进行管理；“村治”即村民自治，在农村成立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乡政体现的是国家权力，而村治则是社会权力的化身，乡是政府，村是自治组织，以乡村治理、家庭经营为基础。

从这个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治理体系还是治理结构来看，乡村治理都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础而且又是重要组成部分。

城镇化巨轮下的农村与国家、城市、市场啮合艰难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推进城镇化建设以来，我国乡村在空间状态、人口格局、社会结构以及利益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传统的乡村社区、村庄整合的乡村新社区和融入城镇的新社区的并存格局。

乡（镇）一级的单位，1990年的最高时期有5.6万个，到2012年已经减少到了3.3万个。村民委员会在1990年最高的时候是74万个，2012年是59万个，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此外，随着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过去的农村人口比较多，到了2012年，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在此情境下，劳动力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当前，我国农民工2亿多，但是在农民工里面有62.2%的比例是到县城以上就业的，还有37.8%的是在县以下，而且农民工群体的20%已经迁入城市。此外，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谁来种地，谁来养殖困扰着乡村。

此外，乡村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部分村庄本身有丰富的资源，谁来掌握和支配这些资源就会存在纷争；另一方面，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工程项目的实施会涉及到各种资源，比如水电气等建设工程，教育、卫生等民生工程，这些资源如何分配？有了经济利益，乡村的各个主体都要争夺这些资源和利益的支配权。如此种种，都涉及到乡村利益结构的变革。

这样的结构变化带来了什么问题？即国家其他方面的变化都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该如何适应其他体系现代化的发展？如何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如何解决基层组织和政府的干预和寻租问题？

中国农村转型、村庄转型的巨大困难固然是由于农村地区广大、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基础薄弱，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这种转型具有特殊的社会内容和性质：即在地理、生产、文化与治理上都具有特殊性的农村，一方面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乃至社会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被日益纳入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与农村这三组基本关系的重新整理安排。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从未经历的巨大转变。其转变方式、过程与前景，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观察村庄转型也可以被视为观察村庄关系的转型。

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架构尚存颇多缺憾

在当前“乡政村治”的结构下，乡（镇）与村之间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村民小组作为村民进行自治活动的具体组织，接受村民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但由于村民小组不具有法人实体性质，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不能独立发挥作用。从实践层面上看，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一个是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难处理好，另一个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赋予农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未能真正落实，农民利益受侵犯的情形仍比较普遍。

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存在较严重的摩擦。有些农村党支部书记认为党支部书记天然的就是村中的第一把手，就应该决定村里的大小事情，不少地方是“支部书记定盘子，主任领着干”，民主决策流于形式。也有相当部分主任认为村委会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大部分村民拥护我，而支部书记不过是几个党员选出来的，甚至是乡镇党委任命的，既然搞村民自治那么就应该是主任说了算。于是在工作中不服从村党支部的领导，导致“两委”关系紧张。目前农村中“两委关系”紧张的村庄为数不少。为了消解“两委”关系矛盾，有的地方正在探索村支部书记、主任“两职一担挑”交叉任职的做法。

此外，“乡政村治”因种种因素削弱了村民自治的民主程度，村民失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目前村民自治中除了民主选举落实的比较好之外，“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落实。村务公开作为民主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公开中的种种不真实性而使村民失去热情，目前不少地方的农村几乎连个村民大会也无法召开。在集体经济空壳的情况下，村民们会认识到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不仅不会得到什么收益，很可能还需要为村里的种种事务掏钱，倒不如不参加而搞自己的生产为好。这也因此给村党支部、村委会争权夺利创造了空间。甚至，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的支配权，甚至出现贿选事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治理何去何从？

当前，我们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到底何去何从？

用制度来保障治理水平的提高

在结构转变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使得乡村人际关系的认同条件发生变化或遭受破坏。人口的流动，社区边界的调整，家庭模式的变化等等，都使违反道德和礼仪所产生的羞耻感的惩罚力下降，道德权威和宗法领袖不再成为能有效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力量。此外，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增大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内涵与以往大不相同。在这些变化之下，乡村社会已经很难通过对道德、宗法和财富的认同来产生稳定的政治权威结构，而政府的任命也已经很难与乡村居民的认同保持一致。因此，为了产生较为稳定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并使这种结构保持一种强制力，就需要用制度设计来保证权力获取的认同度，比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就是如此。

多元自治促进村级自治的完善

当前，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延续了改革之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所以在有的地方，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主要是在过去的生产小队，也就是现在的村民小组。但是，也有一部分地区不是这样，人民公社时期就是土地所有权就是在过去的生产大队，就是现在的行政村、村委会这一级。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有的地方为了方便发展，几个村民委员会合并，集中建一个新型社区，形成新的自治单元。这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我国存在着大、中、小三

级不同的自治单元。

能否考虑在土地所有权属于经济小组的地方适用村民自治？集中设施建设的地区是不是也可以实行村民自治？可喜的是，面对上面的问题，一号文件给出了答案。文件指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可开展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如此，三类单元、多元化的自治模式使得村级自治的完善迈出了重要一步。

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从而匹配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再者，要大力推进农村改革，完善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农村改革要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为目的，深入推进城乡改革联动。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一方面，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改革创新城镇户籍、住房、就业、就学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拉力。另一方面，以落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为重点，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

此外，要大力培养和发展公益性的、社会性的、服务性的农村民间组织，如文化活动协会、专业经济协会、志愿者服务组织等，在条件适当的时候恢复农会。可以让这些组织替代相当一部分政府的功能，通过这个办法减少政府的开支。同时，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健全农民权益维护机制，建立农村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增强新农村建设对城镇化的推力，提高乡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

来源：光明网

地址：http://www.gmw.cn/content/2014-07/30/content_12256133.htm

[【返回目录】](#)

徐永光、金锦萍：基金会不应为个体救助发起募款

公民行善不该法律禁止

公益众筹把私益公益已经模糊化了，将来，对于这样一个模糊地界我们是不是应该立法？我认为宁可不要写，不写还能让中国公民有一个抒发自己爱心的空间。

徐永光：如今，众筹越来越发达，美国的一个众筹网2009年成立到现在发布了17万个项目，筹到了3亿多美元，美国全国的众筹大概50亿美元，其中30%是公益众筹，而这些公益众筹里面很

多是私益的人，比如帮助一个生病的人筹款，这是公益吗？这其实是私益。

目前，中国众筹网做的项目更多的是公益众筹，因此，世界银行做出了一个判断，到2025年，中国的众筹市场达到500亿美元，按照中国目前试水的情况，在所有众筹当中，公益的部分可能会达到30%，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判断，2025年，全中国500亿众筹可能有100亿是公益性的。

实际上，公益众筹把私益公益已经模糊化了，将来，对于这样一个模糊地界我们是不是应该立法？我认为宁可不要写，不写还能让中国公民有一个抒发自己爱心的空间。

众筹私益是慈善吗？它绝对是慈善，这里有个最根本的准则是我个人的判断，我个人想献出爱心，而且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判断，因为互联网众筹特别公开透明，全流程我都可以监控，我知道他钱怎么用。

“杨六斤事件”也反映了人们对机构的不信任，所以我认为私益这条路不能给堵死，宁可不要写。

金锦萍：个体在网上求助时，从法律上讲，就是公开募捐行为，资金来源，一种直接进入受助人个人账户里，另一种是某个公募基金会介入，这其实没有区别，后者可能更规范一些，能够勉强被解释为公益募捐，但实际上，这是存在风险的。

第一，当大量资金都集中在个体时，比如杨六斤，但他的个案并不是最悲惨的，比他处于更悲惨境地的人，由于没有这种关注度，得不到救助，所以这样的方式不妥当；第二，在救助中，受助人治好了，或者去世了都可能有善款剩余，剩余善款归属就成了问题，家属认为这个钱就是人家捐给我们的，应该自用？也存在不妥当性。

从立法上讲，法律不应禁止个体在网络上发布信息。但基金会是为公益事业而服务的，不能为个体募款。当你为某个特定人提供账号时已违背初衷，而且导致了公益资源的不公平使用。比如白血病救助，某个人可能因为某个众筹公益组织提供平台，一下获得百万以上善款，但是如果作为白血病项目的公益组织，他在设计项目时，对每个个体救助不会超过5万块钱。

那么，基金会救助特殊个体可以作为一个故事个案去进行救助，但是救助过程是在项目里面进行的，他是受助主体之一，而不是唯一，要符合公益程序。

个体救助不是公益募捐行为，而是私益的求助程序，所有的捐款可以被认为是捐赠，但不是公益捐赠。所以像“杨六斤事件”的个体募捐我是反对基金会提供渠道的。

在慈善立法里，我们要规范的是公益募捐？谁有资格进行公益募捐？主体是谁？进行公益募捐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公益募捐可以享受税收抵扣的资格，权利义务对等。

同时，行善是一种权利和自由。立法首先保障这种权利和自由，无须法律规范，一定要交给社会自主调整，因为除法律外，社会还会有道德、文化、风俗习惯等提供秩序，要相信社会有自我调

节能力。

从广西贫困少年杨六斤的个人救助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之乱象……近日，在一场由慈善蓝皮书编委会、中国公益研究院等单位发起的慈善立法研讨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and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剖析了当前从公众行善到政府购买服务等热点事件。

专家认为，行善是公众的权利和自由，立法应保障这种权利和自由，但无须进行法律规范。

法律应规范公共服务购买行为

每一条规范的出台，我们都要不断地问自己，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切下去了，是促进了慈善的权利和自由，还是禁止了慈善的权利和自由。

徐永光：最近，我也注意到有媒体刊发了一篇题为《政府购买服务不能成为腐败新灾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记者到了河北、江苏等地了解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暗箱操作等现象频发，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回扣高达4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将成为寻租与腐败的新灾区。

这个我在两次慈展会上都说过政府购买服务更容易寻租，各地的草根组织也都反映，返点回扣受不了，如果你不给回扣就拿不到政府的购买。

一家非常优秀、完全公益的教育学院负责人曾跟我说，有一次招标，政府找他来陪标，明确跟他说，这个项目是给下属事业单位的，但是必须走程序招标，让他去陪标。他说如果不去，不是跟政府对着干吗？最后他还是去陪标了。

遇到这种情况，你能不能守得住？坚守底线，“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选择。但不是说你自己甘愿清苦就行了，你需要生存，因此，还有一个选择是有限的妥协，给你一点小好处，送点小礼，喝点小酒。

为了自己活下来，为了生存，到底是坚守底线还是有限地妥协？这是需要我们这个行业讨论和选择的。我基本上倾向于活下来是第一位的，死了啥都没有了，道德都没了。

而且，这也需要基金会们帮助“草根组织”，无论是公募的，非公募的，应该成为资金的供应者和草根组织合作。

金锦萍：其实，类似的问题还很多。慈善是多元的，比如宗旨和目的多元，这就意味着慈善要广普化，组织的多元意味着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公益为目的慈善单位都在慈善组织概念里面，我们会考虑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所以我们不能光关注捐赠，我们还要考虑其他资源，包括慈善组织自身的活动带来的收入，我们是不是在立法里面也可以予以接受？我们也应考虑行为方式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在解决社会问题方式上，不能简单地只是给受助人财物，能不能给服务等等。

立法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问题？这个法我们到底做什么？他不会禁止所有慈善行为，把慈善变为垄断，不可能，也做不大，但是他要做的可能是怎么去建立一个慈善组织，怎么去建立一个慈善

事业，怎么去确保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能够达到自身善款目的，怎么去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包括从事公益项目的行为，可能会要考虑到慈善募捐的规范问题，就是公益募捐的确定，捐赠关系的调整，公益信托的落地，志愿服务等其他法律不能调整的关系，培育扶持政策，也包括税收，公共服务的购买、政府资助等，及其监督管理和承担的法律责任。

慈善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立法不可能是事事问津，法律只做法律的事情，而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习惯的，风俗的这些我们不做。

但是每一条规范的出台，我们都要不断地问自己，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切下去了，是促进了慈善的权利和自由，还是禁止了慈善的权利和自由。

来源：京华网

地址：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4-07/28/content_108953.htm

[【返回目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培峰：中国基金会仍处于初级阶段 公信力建设等存不足

中国基金会发展的目标与使命

在领域分化、专业分化、功能分化的发展背景下，基金会更需合理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与使命。当前，中国基金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截至2012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共有2961家，同比增长15.89%；资产总额为923.09亿元，同比增长17.61%。其中有24家基金会资产超过5亿元，这些基金会中，除基础慈善类外，还出现了教育、文化、体育、环保等类型的基金会，多元发展态势初显。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法人。可见，基金会是一种公益组织，它的目标是达成某种公益目的，如扶危救困、养老助残，以及教育、文化、环保、人权保护等社会发展事业。同时，基金会也是一种非营利组织，主要依靠捐赠资金来开展公益活动。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利用民间资金进行慈善事业和其他社会事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关注他人、慈善仁爱的传统。对于个人而言，这既是自我确证之道，也是自我提升之道。

在现代的法律框架下，以“公益”和“非营利”为核心要素的基金会，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发展方式。而在领域分化、专业分化、功能分化的发展背景下，基金会更需合理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与使命。

中国基金会发展历程

中国当代基金会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调整的背景下出现的。1981年成立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基金会。此后，中国的基金会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其一，初创和摸索时期(1981~1988年)。这一时期，基金会法律地位不明确，社会活动能力不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基金会的公益目标简单，运作大多凭借设立人和参与人的个人魅力。基金会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特征不明显，定位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摇摆不定，组织运转在营利与非营利之间存在错位。

其二，迅速发展时期(1988~1996年)。此时，基金会增值快速，全国性的基金会每年增加10家左右。基金会涉及领域有了拓展，延伸到环保、教育、妇女发展等领域。一些有影响的公益项目开始出现，比如青基会的“希望工程”，儿基会的“春蕾计划”，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幸福工程”等。

这一时期，基金会的活动解决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也拓展了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影响力。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管理不规范，一些基金会沦为某些人圈钱的工具，基金会资金安全引发社会关注，成为此后基金会清理整顿的直接动因。

其三，涌动时期(1996~2004年)。为规范基金会发展，政府部门在1996年开展了基金会清理整顿活动。这一时期，基金会生长较为缓慢，但也为正规基金会进行积淀、调整、制定发展规划提供了机会。此后，这些厚积薄发的基金会活动领域不断拓宽，社会影响扩大，内部的治理机制也逐步完善。

其四，快速规范发展期(2004年至今)。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形式、内部治理、基金的保值增值、政府对基金会的规范管理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为基金会的规范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条例首次提出了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此后非公募基金会增长势头迅猛。全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资产规模，从2010年末的216.78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42.07亿元，仅用2年时间就实现了资产规模翻番，目前已与公募基金会相当。非公募基金会，已成为中国基金会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等举世瞩目的社会事件和公共活动，更激发了人们慈善捐赠和参与公益的热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基金会进入一个快速规范发展时期。

2004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成立基金会37家；2004年后，平均每年成立的基金会数量是238家，后者是前者的6.43倍。如今，中国基金会的数量以平均每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基金会数量

已超过 3000 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接近 60%。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接近 230 亿元，基金会资产总额接近 1000 亿元，基金会每年向社会投入的公益资金在 350 亿元左右。

“内涵”与“外延”双向发展

身处基金会快速规范发展时期，各界更应以冷静的目光看待基金会的健康发展。虽然中国的基金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内部治理、组织建设、资金筹集、项目运作、公益资源使用效率和公信力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说，发展问题依然是中国基金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基金会“外延式”发展不足。目前，中国基金会数量依然较少，资金规模不大，有影响的组织不多。从活动领域来看，基金会依然集中在教育、扶贫、灾害救济等领域，立足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组织不多。基金会分布也不甚平衡，目前基金会发展较好的地区仍集中于北京、东部沿海省份、四川和湖南等地，中西部地区的基金会数量较少。

城乡分布不均是另一个关键问题。由于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较易吸取企业和海外资金，也容易吸引媒体的关注，城市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也为基金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长环境，因此大量基金会集中在城市。很多基金会即使服务对象、开展活动都在乡村，但主要办公地点仍设在城市，成为“浮在空中的社会组织”。基金会“上浮”，对其理念的弘扬和开展活动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此外，目前立足解决总体性问题的基金会较多，专业性、社区基金会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金会的发展空间和社会影响。

其次，基金会“内涵式”发展不足。专业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基金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中国基金会的专业化能力建设堪忧。一些基金会专业性需要提升，职业团队需要构建。

这一点从专业人才的匮乏就可以看出。2012 年中国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 10345 人，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专职人员 3.72 名。拥有 3 名及以下专职工作人员的基金会比例为 66.41%；拥有 5 人以上专职工作人员的基金会仅占 18.59%。专业化人才的“供求不平衡”显然已成为基金会快速发展的重大瓶颈。

毫无疑问，推动任何公益事业都需要一定的献身精神和巨大的热情，但是长期的事业发展却不能仅靠献身精神和慈善热情去推动。社会组织要获得长久的规模发展，必须依靠制度化的运作机制，否则难免出现公益精神的变异或人走政息的现象。近几年一系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益热点事件，正是这些问题和不足的集中体现。从长远来看，每一个基金会都需从自身的价值使命出发，进入一个专业化的运作轨道。

其三，基金会的网络化水平低。基金会还没有形成社会组织网络，共同发声、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较为薄弱。基金会的支持组织数量较少，还没有成为一支完整的社会力量。

以宽松环境促基金会发展

总体来看，基金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类型，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也产生了广泛的辐射作用，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应该看到，中国的基金会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不断改革开放和寻求制度创新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基金会未来的发展也应当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中寻找方向。

首先，为社会组织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是促进基金会发展的前提。具体到当前，通过法律制度确立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赋予社会组织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和空间，依然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的慈善法正在制定中，基金会条例也正在修订，其中重要内容就是社会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问题。

政府部门一方面应放宽社会组织的生成条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空间，努力完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帮助基金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在推进相关事业时，为基金会预留空间，提供资源，支持其在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领域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基金会监督体系，规范基金会行为，引导其提高自律性、诚信度和公信力。

其次，基金会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分工中寻找自己的合理定位。具体而言，基金会需要拓宽自身的活动领域，规范内部治理，不断走向专业化和精细化，以更加公开和透明的管理和运作，赢得社会认同。

目前，中国的基金会主要以运作型为主，资助类基金会较少。很多基金会都由其他行业的从业者转行而来开展工作，发起者和工作人员不知道应如何对接其他社会组织，也不知以何种方式资助社会组织开展项目。未来，基金会应从自己运作公益项目，逐渐向资助型和联合运作型转变。这既需要基金会设计出更多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前瞻性的公益项目，也需要一个权威、统一的平台，帮助基金会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实现对接，逐步完善公益事业的生态链条。

在发展方向上，基金会应实现功能的逐步“下沉”，立足社区、依托基层，掌握动员公众参与、获取社会资源并实施有效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化能力。此外，基金的保值增值也需拓展新渠道——基金会既要致力于开创“新店”，也要有打造“百年老店”的雄心和准备。

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转自瞭望新闻周刊

地址：<http://www.chinanpo.gov.cn/1940/78847/index.html>

[【返回目录】](#)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政府购买服务“一笔过”，广州取错了经吗？

过去数年来，广州及其他许多城市在基层建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使用财政资源“购买社会服务”。这种做法有一个很明显的参照模板，就是香港发展社工制度的经验。但是，香港社工界却有不少人批评内地政府是学了不好的经验，取错了经。

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因为他们一直在批评香港政府的一些做法对社工发展不利，特别批评其中一项基本的制度，即“整笔拨款津助制度”（也叫“一笔过”拨款）。在批评者看来，内地政府的“购买社会服务”，就是“一笔过”拨款的翻版。他们尖锐批评并且努力想要改革的一项制度，我们怎么会当宝贝拿回去呢？

这就需要我们多少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简单来说，香港政府一直用财政来支持社会福利界的非政府机构去提供服务。具体的做法是根据确定的编制支付社工的薪酬，并对实际发生的服务开销给予实报实销。从 2001 年 1 月开始，港府推行新的做法即“一笔过”拨款：按照一个基准定额将所有费用打包，整笔拨付，不再实报实销。对于一些明确的服务项目还实行竞标，让服务机构相互竞争，价低者得。

不难明白，这是政府压缩开支的方案，它使服务机构面对相当大的财政压力。机构为了维持服务水准，需要压缩内部行政开支，还需要采用更灵活的用人方式，压缩社工的薪酬。结果是，社会福利界与港府之间发生持续的纷争，有时候还很激烈。

这当中出现了不少负面现象。最重要的是社工士气受打击，人员流失率持续攀升，导致断层。由于拨款只覆盖一两年的费用，导致机构行为短期化，难以规划长期服务。此外还有，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青年就业困难等等。

2008 年，香港政府授权成立“整笔拨款独立检讨委员会”，发表了《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检讨报告》。报告提出了 30 多条改善建议，但认为制度没有大问题，应予维持。可是这引发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不少资深社工公开要求社会福利署改变“一笔过”拨款制度。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取错了经吗？我觉得，由于发展背景不同，内地的“政府购买服务”有利于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民生福利，本身是好事。但同时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在学习境外经验时，不要只听人家的政府怎么说，还要多听人家的 NGO 怎么说，兼听则明。这历来是我们在认知上的短板。第二，“政府购买服务”框架下的内地社工，与“一笔过”拨款制度下的香港社工，出现了同样的病征：激励不足、人员流失率高、拨款导致的机构行为短期化。第三，相比之下我们

要更加警惕，不要产生新的腐败。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

http://epaper.nandu.com/epaper/G/html/2014-07/29/content_3286692.htm?div=-1&from=timeline&isappin_stalled=0

[【返回目录】](#)

刘洲鸿：公益专业人士的长江求学之路

以下为发言实录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

我是24期EMBA1班的刘洲鸿。我来自一家公益组织——南都公益基金会。

记得5月入长江，参加拓展活动。我与一位叫刘涛的同学住在一起。刘涛同学说，他已经20年没有和太太以外的人同居一室了，晚上睡不着，半夜拉我聊天，问我是做什么的。听我讲了半天公益后问，你也不是做企业，到长江商学院来干嘛？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公益组织与企业不同，企业要挣钱，或者是聚财，产生经济效益；而公益组织是花钱，是散财，产生的是社会效益。但是，公益组织与企业一样，都是机构，都需要经营、管理、品牌和营销。特别是近年来，公益行业兴起了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实现公益事业的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我萌生了来商学院学习的想法，申请了长江商学院EMBA。但是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从业者，我们收入较低，无法支付EMBA高昂的学费，公益组织的钱是捐款，属于社会财产，也不能用来支持我的学费。怎么办呢？很幸运，长江商学院给了我奖学金，免除了我绝大部分的学费，让我加入了长江这个大家庭。作为得到长江商学院公益界别奖学金的人，感到非常幸运和荣幸。长江商学院招收来自公益组织的从业者，这是对公益事业的极大支持。在此，我代表我个人以及公益行业，向长江商学院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除了给予来自公益行业从业者奖学金，我们知道，长江商学院一贯重视公益事业，鼓励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每位EMBA同学，必须完成6天公益学时才能毕业。来到长江后，我也感受到了长江同学的社会担当和公益情怀。前几天，我们1班的同学讨论班级口号，最后确定为“乐知、精进、有

容、善行”，其中善行就体现了我们要担当、奉献社会的精神。

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同学们对于公益组织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我在班上分享我的工作后，有很多同学跟我交流说，你做的事情很值得尊敬，但是我还是不相信公益组织。我想很多同学也多有这个想法。因此，我也想在这多讲几句，专业的、职业的公益组织，是有其价值的，能够帮助我们瞄准需求，择优资助，更好地使用社会捐款，创新地解决社会问题。

比如前几天，我们24期5班的柯钰同学，上完7月份的课后回到海南，正好赶上威尔逊风灾。她马上动员同学和朋友，1天时间就筹集了10多万元，为偏远地区的灾民送去了生活的必需品。她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非常累，发帖劝停大家捐款。为什么呢？因为她又要筹款，又要去了解需求，然后去花钱，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实际上，她应该寻求与当地专业的公益机构合作，通过公益机构把钱用好。

李嘉诚先生很早就明白了应该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专门的团队来花钱。他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他说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正因为有了李嘉诚基金会，才有了伟大的长江商学院，我们大家才能够聚在一起。

今天刚看到新闻，说中国1%的人占有了25%的财富，25%的人只占有1%的财富。我想，在座的很多都是属于那1%的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作为财富的拥有者，我们如何对待财富？就在我们开迎新会的同时，在离我们不到3公里远的国贸大酒店，“首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正在举行，企业家们在探讨如何通过慈善的方式散财。

李嘉诚先生在长江商学院10周年所作的《行动英雄》的演讲中说：“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历史上有很多具有创意、有抱负的人和群体，同心合力，在追求无我中，推动社会改革进步。”

如何散财，李嘉诚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卡耐基、洛克菲勒、福特、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亿万富豪，都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基金会，在出钱的同时，还出力、出思想，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公益事业上，他们也因此为世人所敬重。

我相信，未来，我们长江校友，不仅会产生大量的商业巨子，也一定会涌现出公益巨人。那时，母校一定会为我们而骄傲。

最后，作为一位从事公益多年的专业人士，大家如果在公益方面有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义不容辞。

谢谢大家。

来源：长江商学院校友官微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Y4ODQyMA==&mid=200394152&idx=3&sn=660f352efc19331438fa9c700bc8d893&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 [【返回目录】](#)

◎行业观点

人民日报：几乎每一次慈善捐献都有行政命令参与

在一些地方，自愿原则被行政强制取代，志愿服务也从政府推动变成政府组织

前不久，台风“威马逊”“麦德姆”先后袭击我国海南、福建等地，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人们纷纷解囊相助，为灾区捐款捐物。然而在爱心活动中，还是传来些许不和谐的音符：有些地方、单位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甚至动用了“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奉献爱心。

其实，几乎在每一次慈善捐献中，都有行政命令参与。有人抱怨，人们的“爱心”成为一些政府部门政绩的垫脚石。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总喜欢用行政强制推动慈善或志愿服务？这与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脱不开关系。志愿服务强调的是公众为他人着想的高尚道德情操，以自愿为最高原则。然而在当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将志愿服务纳入政绩考核的范畴，比如“每个社区都必须成立一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每个街道都必须有品牌志愿者活动”等等。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志愿服务有足够的认识和参与热情。当人们兴致寥寥、政府却火急火燎的时候，便是行政命令发挥优势的时候：一声令下，原本冷清寂寞的场面顿时热火朝天；一纸文件，原本数量尴尬的捐款顿时盆满钵满。行政强制手段能够卓有成效地推动志愿服务出亮点、见成效，立竿见影地展示成绩。只是这样一来，自愿原则被行政强制取代，志愿服务也从政府推动变成政府组织。

促进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离不开厘清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在志愿服务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应该是“园丁”，比如逐步培养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利用评优评先、奖励模范、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公益、热心公益的风气；再比如，搭建合适的平台，成立公益组织发展基金、建设公益组织孵化器等，为有潜力的公益组织提供资金、人才，帮助他们尽快发展壮大，促进公益组织自身建设。倘若政府越俎代庖，一味将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大包大揽，无异于拔苗助长，长期发展下去，公益组织也将日益萎缩，最终成为一块牌子、一个符号，成为政府的附庸。

在我国志愿服务发展之初，行政手段曾经起到过决定性的积极作用，帮助志愿者走出了第一步。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公益组织和众多志愿者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如果政府仍然以行政强制手段来推动志愿服务，只会适得其反。“娇养儿不能成大器”，面对已经逐渐长大的公益组织，政府可以放手了。

来源：人民日报

地址: <http://ccn.people.com.cn/n/2014/0730/c366510-25372092.html>

[【返回目录】](#)

人民政协报：应对“威马逊”凸显公益组织老难题：信息不透明 缺乏良性互动平台

受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逊”及其残留云系影响，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狂风暴雨天气，引发洪涝、风雹、泥石流等灾害，造成144个县（市、区）近千万人受灾，威胁生命与财产安全。

在政府发布社会募捐呼吁后，大型基金会纷纷与公益组织联手，在灾区开展救援工作，行动迅速，物资调配顺畅。业内人士认为，这有赖于近年来多次自然灾害救助的训练，公益组织的行动能力提升很快。

不过，救灾过程中“三伏天发棉被”、救灾打“口水仗”等现象一度引起舆论关注，甚至影响了公众救灾捐献的热情。虽然事件最终得以澄清，及时消除了公众疑虑，但其中暴露的问题仍然引发了广泛思考：“如何整合公益资源”、“如何精准把握受灾群众需求”等“老难题”到底该如何破解？

现场

公益组织灾区一线开展救援

“灾区急需防雨布！”7月2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官方微博发布这样一条信息。

这条信息来自于海南省救灾第一线。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蓝天救援队的“威马逊”风灾救援行动启动后，7月22日，救援队在海南省文昌市走访，当地昌洒镇塘教村房屋受损比较严重，村民们正在想尽办法修补，预防大雨损坏自家粮食。

蓝天救援队的官方微博表示：“房屋重建或购买瓦片都需要很长时间，房屋漏雨会淋湿被褥和粮食，那样村民就没法生活和自救了。”当天，救援队紧急协调了7500平方米的雨布送到村里。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介绍，与基金会合作的公益组织有很多家，包括印象文昌志愿工作站、海口民间义务“危急”救援队、恒大志愿者服务队等机构。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也采用与公益组织合作的方式救援灾区。

7月24日，“思源工程”联合绿舟应急及“微公益”的爱心网友向海南“威马逊”受灾严重的地区运送物资。其中，向昌洒镇运送6万斤大米、800桶食用油，向文教镇运送1.5万斤大米、256桶食用油。

绿舟应急按照受灾程度及家庭困难程度，协助“思源工程”向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另外，也有爱心企业表示愿意捐赠防雨篷布。

“除了大米、食用油和防雨篷布，受灾群众还需要柴油发电机（抽水、照明）、蜡烛、防暑药品、感冒药品、蚊香等紧急救灾物资和生活物资。”来自绿舟应急的救灾简报发出救援呼吁。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涠洲岛遭遇较严重的灾害。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威马逊”造成岛上1.4万人受灾，受损房屋8514间，岛上居民遭遇停水停电。

据广西民间联合救灾小组在涠洲岛实地调研情况，壹基金援助广西涠洲岛的第一批物资——420个洪灾“温暖包”和4.2万瓶矿泉水于7月22日上午8点从南宁备灾仓库转运至北海码头，7月23日一早运抵涠洲岛，发放给受灾严重的村民及儿童。这批物资首先保障了灾后的群众饮水安全，也及时缓解了洪灾后儿童的需求，带去了一份关怀。

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崇左市也遭受重创。7月22日上午，壹基金救援联盟的伙伴广西山地救援队，抵达崇左市江州区和平中学，协助该市江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撤离群众。

截至7月25日，基金会中心网的网络平台上，汇聚了12家基金会的救灾信息，并实时更新。

视点

“救灾发棉被”引发的探讨

在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的救灾物资中，出现了棉被，这引起广泛的质疑。正值夏天，遭遇台风灾害的地区，温度都不低，发放棉被有何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棉被在夏季救援物资当中很常见。

“我们依据红十字会几十年的经验和政府的救灾经验，最后确定了物资品种。一年四季的救灾工作中，包括夏天都有可能要向灾区提供棉被。”杨绪生说，“‘威马逊’非常强悍，不少灾民房屋受损，临时安置点又都在户外，棉被既能铺又能盖，在潮湿寒冷的夜晚非常实用。”

青岛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延照也表示，发放物资的任务有时比救援任务更艰难。

“物资分发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信息核查，我们必须把有效的资金发放给最需要的人群，要对受灾区域内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比如这一户有几口人、人员有无伤亡、房屋及其他物资的损伤情况如何等，再把这些信息反馈回去，根据实际情况调配物资对他们进行发放，过程比较烦琐。”李延照说，“在争分夺秒的救灾工作现场，由于信息不透明、不准确，重复的用工、混乱的发放时有发生。”

“救灾本是救急，首先是要确保灾民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面对灾区民众还有如此之多的应急需要，纠缠于‘口水仗’的各方也该休兵了。与其猜度灾民的需要，还不如直接请教灾民。建立并维持一个开放式的、保持良性互动的救灾平台。”时评作者王灏军表示。

实际上,近年来,每次灾害救援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类似的争论。“口水仗”的背后,实际上是公众对公益组织专业救援能力的质疑,如何破解从精准了解需求到高效发放物资的难题,不仅需要单个的公益组织提升能力,也需要公益组织之间的协作,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营造成熟理性、客观公正、理解包容的良好舆论氛围。

以2013年雅安地震为例,前往当地救灾的公益组织不计其数,雅安市芦山县的街道上一度挂满了各种公益机构的牌子,琳琅满目。尽管机构多、项目多、物资多,但在具体的救灾层面,出现了不少李延照所说的“重复”、“浪费”的情况,比如募捐奶粉过剩。究其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缺乏一个良性互动的救灾平台。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乔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参与救灾的公益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对公益资源进行统筹。同时,政府的减防灾部门在平时会议与决策过程中,可以尝试与公益组织对接,交换信息、咨询意见,形成良好的互动,使救灾工作更有效率。

来源: 人民政协报

地址: <http://www.rmzxb.com.cn/sy/csgy/2014/07/29/356582.shtml>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威马逊”救援：期待社会组织定位更准确

7月18日,2014年第9号超强台风“威马逊”,先后三次登陆华南沿海,成为自1973年以来登陆华南沿海的最强台风。海南省文昌市、广东省徐闻县、广西防城港一带沿海均为登陆点。面对几十年来最强台风,社会组织也迎来了又一次挑战。

简格民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蓝豹救援队执行队长。22日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判断灾情后决定启动紧急预案,当晚第一批5名救援队队员就飞往海口。“但到了之后,发现当时的情况比预估的要严重得多。”简格民说。

台风过后,停电造成一切通讯中断,成为最大的问题。蓝豹救援队在到达后的第二天调运两部卫星电话,才把情况反馈出去。

当记者拨通电话时已是晚上8点,简格民和队员们还在运送物资的路上,“这几天每天都得忙活到凌晨一两点。”

属地救援还是外界进入?

台风后停电,是台风过后消息不畅通、前期外界对此次台风造成的危害预判不足的主要原因,

社会组织对灾害也是陆续知晓。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表示，台风登陆后救援力量的时间顺序大体上由近及远陆续到达，24小时之内是属地救援，受灾省份以及邻近省份的就近救援成为主要力量，24小时之后大部分外省社会组织才陆续对灾情有所了解，72小时之内采取行动。“就这次台风来讲，由于道路抢修、机场恢复等原因，全国的外来救援力量大规模进入灾区可能是从21号开始。”他说。

“实际上所有的灾后救援里，起主要作用的是本地的救援力量，而不是外来的救援力量。从5·12汶川地震之后，靠外来力量救援出来的人是非常少的，大部分救援出来的人都是由本地的消防、厂矿救援队与社区里面的村民邻居等救出来的。”郝南说，军队系统是最迅速的，接下来就是全国范围里更有经验的专业救援队，他们到达灾区的时间往往是24小时以后。

“威马逊”登录后，海南成美基金会、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以及海南交通广播志愿者联盟等海南社会组织迅速发出需求和灾情消息，并组织志愿者展开救灾。这也能体现出当地社会组织的优点，反应比较快、资源就近，对当地的条件环境很熟悉，但很多志愿者是当地自发集结的公众，缺乏专业性的引导指挥。“外地的团队能进来的人少，但是参加过多次全国各地的救援相对更加有经验、有秩序，相对来说专业性更高，如果两者结合起来就更好了。”郝南说。

事实上，这也正是其他地区对台风了解不足的表现之一。“一般地震发生后半个小时内，消息就会传出来，社会组织就能对灾情迅速做出判断。比如说地震5级、8级，大家会有个概念，但除了沿海居民之外内陆公众对台风更是知道很少，什么样的台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危害，大家没有概念，所以要等报道、等核实灾情。”郝南对记者说。

统一协作机制如何扩大？

小范围内几家社会组织的协同作战、互通信息的模式在芦山地震后就有所体现。

此次台风过后，壹基金、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天涯社区、海南省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联合会(筹)、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等7家机构通过电话会议共同决议，成立“海南7·18台风公益赈灾联络处”，借助天涯社区平台，联络处的“台风灾情信息中心”自23日起正式对外发布信息，主要由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将每天的相关灾情信息整理发布，提供了经由信息核查小组向政府、NGO、村落等具体对象核实后的灾情信息，包括物资需求、联络人及电话、救援进展等。

虽然经历过多次救灾，但社会组织之间大范围内的合作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统一协作机制。“像四川、云南这些地方灾害频发，政府和民间遇到灾害后的沟通相对顺畅了，但换了一个地方，老问题依旧存在，外界资源来了之后找不到人，政府对于民间力量能发挥多大作用、能有什么样的预期也不知道。”郝南坦言。

社会组织的位置在哪？

“面对不同的灾害，社会组织在第一时间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上还是有很大共性的，饮食饮水、保暖、医疗卫生以及心理安抚，这些都是必须的。”郝南说。

灾难发生后，从抢险救援、过渡安置到灾后重建，社会组织发挥所长，更多起到的是细致、人性化的补充作用。

比如24日，壹基金的第三批物资运抵海口并开始发放，包括80顶帐篷、500个洪灾温暖包，在广西灾区发放42000瓶饮用水等；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放的物品中还有蚊香、卫生纸等日常用品，并在逐村考察中注意家禽等消毒处理情况；海南交通广播志愿者联盟有专门的小分队进行道路清障……

与壹基金等救援队多次参与洪水、风灾救援不同，蓝豹救援队是第一次参与台风救援。简格民发现，实地探访后，灾情比想象的严重得多。“台风的破坏力某种程度上比地震严重，地震的灾害主要集中在震中、断裂带附近，但是台风扫过的地方成带状，破坏力是区域性的，很多房子都片瓦不留。”简格民说。

与地震的灾后重建不同，台风离开后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海水倒灌情况，而海水撤离后农民的土地就变成了盐碱地，四五年内都不能种庄稼，对当地损失很大。“这会严重影响老百姓三至五年内的生产生活，所以社会组织在介入灾后重建时可以因地制宜地考虑。”简格民表示。

据悉，在台风到来前，海南政府有关部门提前6个小时下达台风紧急避险的通知，通知范围包括了现在海南岛受灾的重点乡镇，这对减少人员伤亡起到了很大作用。“说到底，要想最大程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防灾减灾的能力要落实到具体的社区并制定长期机制，才是最有效的。我们不能每次都靠救灾来弥补防灾减灾上的欠缺，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总是要好过亡羊补牢。”郝南表示，而社区日常减防灾教育也是社会组织可以介入的重要环节。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791.html>

[【返回目录】](#)

京华时报：近八成受访者认为捐赠人有权收回捐款

6月26日，汶川抗震英雄沈远奎因伤势过重离世。

此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发起筹款行动，共筹得近50万元善款为其治疗。

然而，他离世后的剩余捐款如何处置，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两家基金会随即通过网络平台向近万名捐赠网友征求善款处置意见。

针对基金会的做法，近日，京华时报联合清研灵智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发起了一项题为“抗震英雄离世，剩余捐款该怎么办”的调查。调查显示，过半网友愿意将剩余善款留给其家属，近八成网友认为捐赠人有权把捐款收回。对此，专家表示，主要缘于中国公众对现代公益理念缺乏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施舍行为上。

超四成人反对将善款给家属

此次共有1006人参与了调查。样本显示，男女比例为1:1;参与调查的人群以大专以上学历为主，大部分受访者收入在2000元~8000元之间。

调查显示，在被救助人去逝后，剩余捐款该如何使用的问题上，受访者分歧较大。57.4%的人支持将捐款留给受助人家属继续使用，而42.6%的人认为，救急不救穷，应该将捐款用于救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对基金会在网络上向捐赠人征求剩余捐款使用意见的做法，71%的受访者肯定这种做法，认为体现了基金会对捐赠人的尊重;仅有6.5%的人认为没必要征求意见。

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对于捐赠人要求基金会返还剩余善款的诉求，近八成受访者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应尊重捐赠人的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

关于如何明确剩余善款处置方式的问题，高达75.6%的受访者赞同基金会在捐款前以捐赠协议的方式进行明确。

如果基金会在捐款前就明确约定剩余捐款归救助人家属，约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表示将不会继续捐款。

善款捐出不得收回

针对过半受访者支持将剩余善款用于被救助人家人的生活，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褚莹认为，捐赠人把受助人和家人视为一体，而不是单独的受助体。这反映出捐赠人捐赠的心理基础是基于同情心，更像是传统慈善中的施舍行为。

在他看来，这并不是现代公益的捐赠行为，他们只是将基金会看作是一个中介，而不是视基金

会为一个管理方，能妥善运用好这笔资金，创造更大价值。

对于近八成的网友认为，捐赠人可以把捐款收回。褚莹分析，这说明人们把捐赠财产视为捐赠人个人财产可以收回，但“按主流公益观念，捐赠人把钱捐赠出来后，就是社会公益财产，是没有条件收回的。”

另也表明，公众还不理解现代公益是什么，他们认为救助就是一种公益行为，而且多是传统的基于眼泪攻势的同情心劝募行为。

公益组织不应替捐赠人作决定

对于基金会向捐赠人征求剩余善款使用意见的做法，褚莹认为，在公益领域，这种做法比较创新，也尊重了捐赠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个做法值得鼓励。

但他也不无担忧，这会给基金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从法律上讲，如果征集意见不能超过 50%的话，在无法获得捐赠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就要将这笔善款用于捐赠人之前指定类似的目的上。“比如沈远奎的事情，就要放在其他类似烧伤人群的救助上”。

对于基金会给出的征集意见期限的问题，褚莹说，这在法律上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基金会没有权利设置这种“到期不回复即为默认”的反向条件，来代替捐赠人作出决定。

尽管存在法律风险，褚莹也坦言，基金会目前很难有好的方法规避这个风险，但这个做法是值得鼓励的，只能在探索中慢慢完善和改进。

新闻事件

被救助者离世善款考验基金会

6月18日，汶川抗震英雄沈远奎意外跌入沸腾的饲料锅中，全身98%烫伤，生命垂危。为抢救沈远奎，一场紧急爱心救助在全国多地展开，很快，包括两家基金会和直接捐赠给家属的近70万元的善款汇集而来。

但6月26日凌晨，沈远奎因伤势不治离世，随即，后续善款的处置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面对突发状况，公益组织如何应对，合理分配资源让更多人受益，仍值得思考。

多方联动急救抗震英雄

6月24日，一则“抗震救灾英雄跌入饲料锅，全身90%以上烫伤，生命垂危，急需救助”的消息在网上迅速传开，沈远奎的战友、朋友和当地志愿者率先找到当地媒体进行报道，并公布了沈远奎妻子谢龙梅的个人账号，向社会募款，很快募集到了20余万元善款。

当天晚上，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当地5家社会组织发起了“救助沈远奎行动”。25日下午沈远

奎救助项目上线筹款，截至 27 日 12 时，项目通过腾讯乐捐、腾讯人人公益微信筹款平台，已接收爱心善款 3631 笔，共计 234968.48 元，银行到账捐款 5 笔，共 2280 元，合计接收到 237248.48 元。

由于沈远奎所需治疗费用高达 100 万，且事发紧急，6 月 25 日晚上 9 点 32 分，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下称“思源工程”)联合央视新闻、新浪微公益发起“昔日抗震英雄 90% 烫伤，急需援手”救助项目。截至项目结束，共有 7044 人次网友捐赠 231436 元。

受助人离世家属冻结账户

就在筹款进行四个多小时后，6 月 26 日凌晨 1 时 35 分，沈远奎因伤势过重离世。

顾不上躺在殡仪馆的丈夫，妻子谢龙梅第一时间打电话挂失账户，但发现捐款还是能进来，于是，她去银行冻结了捐款账户。

但来自各方的追问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让这个刚刚承受丧夫之痛的女人几近崩溃。事情过去了近一个月，回想起来，谢龙梅虽然遗憾未能陪伴丈夫最后一程，但她也表示很理解，大家都是好心，希望钱真正用到受助人身上。

沈远奎的离世，也让近 70 万元的善款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基金会公开征集善款使用意见

沈远奎离世后，两大基金会也及时关闭了募款通道，在跟家属协商后，对剩余善款给出处理意见，并通过网络向捐赠人进行公开意见征集。

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其官方微博、官方网站、微信群等方式，征求了善款使用意向，收到了上百条网友回复，汇总后并于 6 月 27 日公布了剩余善款使用方向：7 万元用于支付沈远奎生前住院的治疗费用；15 万元用于沈远奎 3 岁孩子至 18 岁的抚养费；其余捐赠资金设立“沈远奎爱心基金”用于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合作部主任助理王毅表示，如有网友不同意善款用途，可申请退款。截至项目结束，未收到网友退款申请。

6 月 26 日上午，“思源工程”就第一时间将网友捐赠的 3 万元善款送至沈远奎家属手中。经过协商，沈远奎家属希望“思源工程”将剩余网友捐款，以 1：1：1 的比例，分别用于谢龙梅及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沈远奎父母及岳父岳母的赡养费用。为此，7 月 2 日，“思源工程”通过机构网站和微博，公布《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救助沈远奎的善款使用用途征求意见函》，并通过新浪微公益的私信功能每天告知所有捐赠网友。在征求意见函中，“思源工程”也写明如果 7 月 11 日 17 时前未回复，视为默认同意该用途。

截至征求意见结束时，超过 300 名网友捐赠人给予回复，其中 11 名捐赠网友不同意使用用途，要求退捐或转捐的善款 845 元。“思源工程”在核实完毕后即根据网友提供的银行账户予以退款并公

示。

名为“KEN”的广州网友也表示第一次遇到可退捐的情况，“退捐是个好事，这也是基金会对捐赠人的尊重，也遵循了自愿原则。”因此，他看到沈远奎离世后，之前募集的善款已经够了，就申请了退款。

应多平台联动避免资源浪费

7月16日，“思源工程”将善款全额拨付完毕。

陶鸣表示，当善款的用途发生变化时，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一定要征求捐赠人意愿，这也是“思源工程”基本的工作原则。而且合作方新浪微公益，可以及时把征求意见的信息推送到网友的私信里。

对于征求意见过程，微公益产品运营经理张茹玮也坦言存在风险。

她表示，面对受助人突然去世，更多人愿意持续支持，而个别人要求退款，到底哪种善款的处理方式是最好的，需要大家去讨论。

对于此次救助，多家公益组织都在进行救助的情况。张茹玮认为，多平台筹款如何避免重复性和资源的浪费，如何搭建一个更好的沟通渠道，让各大平台联动起来，也是下一步应该思考的问题。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652&extra=page%3D1>

[【返回目录】](#)

文汇报：谁为社会组织人力成本埋单

海布社工师事务所成立仅三年半，就拥有了由60多名专家、10余名全职专业社工和心理咨询师以及100余名核心志愿者构成的团队，社会服务项目涵盖安老、扶幼、帮教、优抚等领域，因此成为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研究社会组织发展要素的样本。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样本型社会组织，每年全职员工的流动率仍然高达40%。创始人马世婧坦言，不少员工有服务社会的热情，也拥有专业资质，但仍然不得不因为工资待遇过低而放弃社工这个职业，“职业高尚、地位低微，角色重要、收入微薄”的困局急需打破。

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徐汇区委与文汇报社日前以海布为主要研究对象，邀请了活跃于上海6个区的7家社会组织，共同研讨社会组织如何留住人才、实现信息公开。包括海布在内的8家社会

组织，其负责人有的年过六旬，有的正当盛年，也有的青涩尚未褪尽，但都对于人才的高速流失表达了担忧。虹口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负责人柳梅秀现场求援：“我们的老财务重病，我动员了周围所有领导、朋友帮忙找财务，但是社会组织拿不出市场价工资啊。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财务信息向社会公开，怎么办到？”

专业组织留不住专业人才

来自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的调研发现，运营得比较成功的社会组织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以海布为例，它的全职队伍中近半数具有社工师和心理咨询师双重资质。“心理咨询师提供服务的前提是对象自己寻求帮助，而社工师则要主动提供服务，甚至是在服务对象抗拒的情况下。”马世婧花费大量心血培训具备“叠加专业能力”的团队，正是这支团队，在2012年至2013年感化112名误信邪教人员，还帮助一些上访女性基本恢复了社会关系、重新回复正常生活。

但这些手持双证的专业人才的收入却长期处于偏低状态。马世婧告诉记者，海布在社会组织中属于承接项目较多的机构，但项目主管的月收入一般也就在4500元左右，“比一般社会组织高一点。但是，具备心理咨询师资质的人才去企业做HR，收入至少在1万元左右。不少曾经在海布工作过的专业人才都跳槽去了企业。”

旗下有50家团体会员、1600多名个人会员的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去年对130名社工专业学生进行了调研，有60%的受访者表示毕业后不愿意进这个行业。秘书长国云丹表示，收入正是削减从事社会服务行业意愿的主要因素。

缺乏制度保障令资金流不稳

和海布相比，由社区居民生活服务需求而诞生的静安区南西社区金钥匙服务业发展中心显得更加“弱小”，尽管它每年的服务人次高达600万。掌管“金钥匙”的区露琪年届六旬，她毫不讳言：“我这个社会组织人员也留不住，还谈什么留人才。成立10年，我们没有招过一个本科生，只招过一个电大专科生，也已经走了。”

区露琪告诉记者，“金钥匙”根据政府要求提供社区生活服务和困难家庭综合帮扶，经费全部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每年给我做一个预算，从最初的10万元到20万元再到60万元，总额根据服务项目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能中标就生存下去，不能中标就没有工作经费。”大约一年前，有一名本科毕业生很想加入“金钥匙”，薪资要求也只有3500元。但是，区露琪仍然咬咬牙告诉对方：“3500元现在是可以，但是我这些都是公益项目，如果有一天项目没有中标，一元钱工资也发不出怎么办？”

区露琪的担心并非无源之水。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陆晓春坦言：“政府购买服务需要‘清单管理’—服务项目和资金预算应当有制度性保障，不是你拍拍脑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没有制度保障，没

有确定性，社会组织很难发展。”他还表示，市社会工作党委与徐汇区签订了合作协议，目的就是鼓励区县在财政管理趋于严格的背景下，创新探索科学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市级层面的相关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从机制入手让社工看到未来

陆晓春的积极回应令在场的社会组织颇为兴奋，一些来自实践的建议迅速被摆上研讨会。

马世婧直言，海布在承接公益项目后，专业人员的人力成本一般超过总成本的 80%，但按照目前各区县都参照执行的《关于规范上海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投）项目财务核算管理的通知》，管理费支出不能超过业务活动费的 10%，“这条规定不符合社会服务‘轻硬件重软件’的实际，能不能调整？”

对政府购买服务已经相当熟悉的区露琪则对公益项目评估标准提出了异议：“公益项目主要以受益人群为评估标准，具体内容包括实施时间、地点、范围和资金使用效率，唯独不评估工作人员在单一项目中的‘人头费’。我们同时从几个部门承接项目，工作人员的收入就来源于项目经费，但怎么精确评估每个人在每个项目中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财务信息的公开透明又怎么做到？”

“我们对 380 名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在目前的收入状况下留下人才的主要因素在于行业的价值感——认可我们是专业人才，是有舞台和空间的。”国云丹说，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去年发布了社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薪酬设置的指导方案，对社工从业人员制定了专业职务序列，包括一线社工、督导、行政管理等各个工作种类都划定了初级、中级、高级，“希望上海能从机制入手，让社会服务人才看到成长前景。”

来源：文汇报

地址：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4-07/27/content_4.htm

[【返回目录】](#)

CSR 环球网：麦田计划的 4 个 100 万故事：善款难得，更要善选 善用

2005 年 6 月始于深圳的麦田计划，默默坚持至今，已是国内草根 NGO 中的传奇，“那些年跟我们一起做的机构很多都不存在了，我们应该是中国公益史上改革开放的那批人，是探路者”现在依旧四处宣讲麦田计划的创始人莫凡略带自豪地告诉记者。估计圈内很多人都听说过麦田计划，但它如何辛勤耕耘至今，你又知道多少？且看 CSR 环球网的独家专访。

让志愿者在好玩中参与和成长

麦田计划这个名字有种温暖的天然属性:金黄色、耕耘、丰收,还有“守望”。作为一个公益助学机构,麦田的温暖不仅给予孩子,连参与其中的志愿者都能分享麦子的芬芳。莫凡说,99%的人认为麦田是一家助学机构,但他们更希望麦田 51%的职能是帮助孩子,49%是帮助志愿者。“我希望,麦田成为大众参与公益的平台,志愿者在帮助孩子的同时,也能收获快乐、体现自我价值”。

麦田计划的组织文化前期是莫凡搭的基础架构,现在则是大家一起雕琢的。这块麦田不像一个人的自留地,更像是一个大家庭的责任田。在社交软件风行的今天,麦田计划的官方论坛活跃度依旧很高,每天都会出现一两千的新帖子,这在国内的NGO中是极其罕见的。来自全国70个分社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热衷在论坛查找公益信息、讨论公益、工作和生活。诚如莫凡所说,麦田的氛围是一种家庭式温暖,“虽然论坛上大家常吵架,但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分裂,因为大家都觉得麦田是属于自己的”。

这些年来,麦田计划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理念:统一的服装和口号;不接受雷锋式的伙伴,认为做公益不应影响生活和学习;快乐公益,给小孩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份快乐。麦田还建立了强烈的视觉系统,让成员有自豪感和归属感。倡导低门槛公益,以捐一支笔、一本字典的形式,让公益走近普通人。同时,麦田还倡导成员的平等,“大家已经给我起了很多绰号”对于公鸡、老才这样的称呼,莫凡丝毫不介意。

在莫凡看来,现在很多NGO效仿企业进行制度管理,其实很难管好。麦田计划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培育机构的文化、以文化彰显自我价值、以价值增强凝聚力,以凝聚力加强自身管理的这套模式很有效。他也毫不忌讳地谈到,这两年机构忙于项目,自身建设也需要再加强。麦田内部还成立了自律委员会,让参会者佩戴各色手环提醒自己遵守道德,例如不闯红灯、不说脏话。“每个人一年有10次违规机会,但超过了就要自动从头再来”在他看来,自律很好玩,好玩也是麦田的文化、是公益的文化,这也恰恰是他带着麦田一直坚守的。

用现代传播理念推广麦田文化

随着项目的推进和机构的成长,很多NGO在传播推广上的弱势非常明显。logo不大气、不懂讲故事、不会自我传播等都是NGO的“常见病”,但麦田计划凭借莫凡的优势一直遥遥领先。

作为一名专业设计师,莫凡在机构成立前就设计了现在彩旗飘扬的机构logo,“只是设计着玩,没想到会用在麦田”对于这个意外他看的很平淡,但对于自己做公益传播的优势,他也毫不谦虚“麦田的发展得益于传播,特别是讲故事”。国内的NGO很多都缺乏讲故事的能力,通过把摄影、设计、绘画、文字几个兴趣特长结合,莫凡让照片和故事变成设计,进而让更多人了解麦田、支持麦田。

至今,麦田计划已经举办学校联展和城市联展近两千场,通过校园宣讲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麦田

计划、了解公益，“现在有不少公益人都听过麦田的宣讲，我们是在埋种子”莫凡对此很开心。

看四个 100 万的故事取麦田真经

对于草根 NGO 而言，筹款并非易事，捐款更是翘首以盼。但对于麦田，捐款不仅要认真对待，而且并非来者不拒。莫凡告诉记者，每笔善款都源自麦田长期默默地坚守，善款难得，更要善选善用，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送上门的 100 万

两三年前的一天，莫凡收到了一封来自著名企业家、投资人何伯权的邮件，表示关注麦田计划很久了，愿意支持麦田的发展。

“有不少人会在我们论坛潜水，花一段时间了解我们的机构和团队再进行捐助”莫凡对此习以为常，但对于何伯权主动送上门的近百万捐款，他至今谈起依然很兴奋，“很多公益人总是想着筹款，但关键还在于用心做好机构本身，其实很多人在关注着你。做好自己很重要”。

拒绝商业化的 100 万

“麦田不赞同商业化，但不等同我们不与商业合作”莫凡认为，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麦田的坚持。曾经有一家知名的纸巾企业找上门，希望在纸巾包装上印麦田计划的 logo，并采取每卖一包直接给麦田计划捐赠一分钱的方式合作。

“思考了没有 10 分钟，我就拒绝了”谈起这个有机会带来 100 万元捐赠的项目，莫凡语气坚定。他随后解释，我担心之后会出现捆绑效应，消费者会相互联想，不希望公益品牌与商业品牌等同。

不为 100 万影响初衷

在 2008 年的时候，有一位捐款人给麦田捐了 100 万元，并希望善款用在孩子的大病救助项目，但大病救助并非麦田的核心。麦田会因为这部插曲而转型吗？

如今，麦田依旧是助学为乐的麦田，这笔善款一直用在麦田走访时遇到的大病孩子身上。既要传递爱心，又要保持本我，麦田在如何平衡创办初衷与新的担子上做好了选择。莫凡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不起捐款人。但做公益也要时刻记着机构的创办初衷，要坚持。”

因财务透明斩获 100 万

2010 年，莫凡带着麦苗班项目参加公益大赛“天使助学”，从全国海选披荆斩棘杀入决赛，莫凡的项目在最后的 PK 中表现并不突出，但因为财务精细获得评委赞赏，并斩获 100 万元。“做公益，财务透明很重要”这是他的最大收获。也正是这笔奖金，让麦田计划的基金会顺利成立。

从扶贫助学到深度助学，麦田在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的情况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很多公益项目也面临着饱和，甚至过剩的情况。2010 年前，麦田都在做扶贫助学项目，但随着近几年国家投入的增加，项目需求正

在萎缩，尽管预计这类项目还可以发展二三十年，并且对技能要求不高，便于维系志愿者团队，在坚持做到国家不需要为止的同时，麦田正在进行项目转型。

麦田少年社、麦苗班都属于麦田专心发展的项目——深度助学，通过多媒体教室、第二课堂的形式，让山区孩子、城市流动儿童都能更快乐地读书。麦田依旧坚持，不做支教，只是帮助改善教学设施，提供硬件和软件支持。

至于由莫凡亲自负责的同行计划，则是专门为草根 NGO 设计的机构文化建设项目。形象系统和文化系统两大板块的重新塑造，充分运用了莫凡的设计才能和麦田的团队文化建设经验，项目希望帮助更多 NGO 走的更远，走的更好。但他也强调“真正的文化，还是得靠组织内部”。

莫凡常说，今天所有镜头和闪光灯都落在我的头上，其实真正成就今天麦田的是所有的麦田志愿者的付出和努力，我们的麦客！或许，对于所有的 NGO 也适用，个人主义、品牌代言并非机构持续运营的根本，唯有凝聚各方力量，真心付出、不断努力，方能抵达理想的远方。

来源：CSR 环球网

地址：http://www.csrworld.cn/portal_mobile-p_mobile_view.html?aid=2496#rd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解析我国儿童大病救助的慈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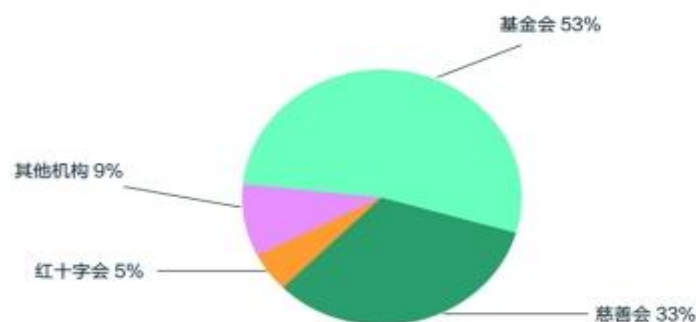


图 21 儿童大病救助慈善组织性质分布

儿童大病救助慈善组织性质分布

对大病儿童进行救助的慈善组织中，基金会 51 家，慈善会 32 家，红十字会及其他机构共 14 家主要集中在北上广地区，其中北京地区的儿童大病救助慈善组织数量占比将近四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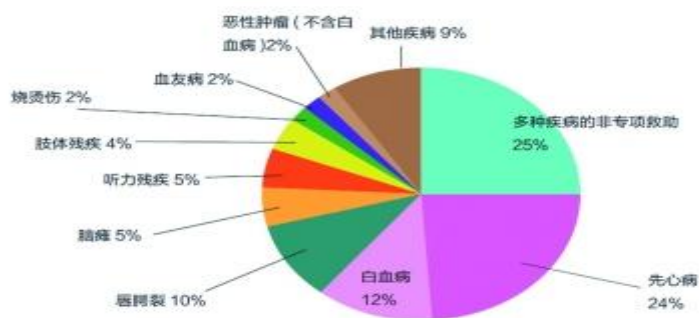


图 17 儿童大病救助项目数量分布（按病种）

儿童大病救助项目数量分布（按病种）

目前，慈善组织对十几种医疗费用高昂的重大疾病患儿进行医疗救助。其中，对不区分病种的多种疾病的综合救助项目数量最多，专项救助项目中，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唇腭裂的救助项目数量最多。

慈善组织利用政府与民间各方资源，开展儿童大病救助工作，与社会保险形成补充与配合机制，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儿童大病救助的慈善力量大体可分为六种模式。

财政出资

政府出资支持慈善组织开展儿童大病救助的项目通常覆盖范围广，救助人数多，社会影响力大。这类项目中较为突出的项目有国家彩票公益金出资 3 亿多元支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儿童白血病救助项目、福建省财政拨款 1 亿元支持该省的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项目、江苏省财政出资上千万开展儿童重大疾病慈善救助项目。

比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是我国首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对白血病患儿进行资助的项目。在成立之初的头三年，每年所募集的社会资金都在五六百万左右，资金规模的限制使得每年的白血病患儿救助人数也都限制在 100 多人。自 2009 年，国家彩票公益金开始向小天使基金注资，到 2012 年，小天使基金共获得注资将近 2 亿元。2014 年 2 月，彩票公益金又对中国红基会小天使基金追加了 1.44 亿元资金，解决了 4000 多名白血病排队患儿的救助问题。

由于救助量大且救助的患儿遍布全国，红十字会要求进行申请资料的递交、审核和资助款的拨付。患儿需通过各级红十字会的层层审核递交申请，评审通过后提交《资助告知书》回执、病情材料和医疗票据，红十字会对资助材料进行审核后提交中国红基会终审。中国红基会根据救助人数拨付资助款至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再将资助款拨付至患儿账户或救治定点医院。平均而言，患儿从申请到最终获得资助至少需要 6 个月的时间。与其他的基金会比较而言，小天使基金的资金申请和审批程序都较长。未来还需对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简化申请程序，以加强救助的实效性。

政府协助

慈善组织和政府具备不同的优势，具体到儿童大病救助领域，某些慈善组织具备资金方面的优势，但缺少相应的资源去筛选需要救助的患儿并实施救助，政府可以利用相应资源提供支持。而在另外一些需要较多专业服务的领域，慈善组织比政府更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则能更容易发挥各自的特长。

目前，政府支持慈善组织开展儿童大病救助工作或与慈善组织共同开展儿童大病救助的情况已越来越多。政府一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与慈善组织共同开展儿童大病救助工作：政府购买慈善组织服务开展儿童大病救助；对慈善组织大病救助提供患儿筛选等各项便利，一些地方政府帮助甄选需救助的患儿名单，减少慈善组织筛选救助患儿的成本；慈善组织出资、政府实施儿童大病救助，如“西部贫困家庭疝气儿童手术康复计划”就是李嘉诚基金会与民政部共同实施的项目。

慈善组织为大病儿童提供形式多样的医疗救助，已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民政部在2013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衔接的指导意见》中，要求积极探索建立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的衔接机制。

儿童大病公益保险

通过为儿童购买一份公益的补充商业保险，在儿童患病时，可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的方式，大病公益保险为儿童提供一份额外的保障。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

与其他救助方式所不同的是，通过为困境儿童购买大病保险，在患儿生病前给予保障，一旦患病能及时得到救助，这种事前救助的方式能够比事中救助和事后救助更能减轻患儿家庭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是通过为项目试点地区儿童购买一份商业医疗补充保险的方式对大病儿童进行救助，该医疗补充保险的参保基金由社会募款而来。通过为项目区的新农合参保儿童提供50至75元的参保费用（不同项目点有所不同），儿童一旦患病，可获得最高20万元的保险赔付。

从2012年7月首个试点项目启动到2013年7月，“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项目已覆盖了4个试点县，受益儿童数量达到了11.6万人。2013年，该项目共对637名大病儿童进行了保险赔付，赔付资金为120.8万元。

公益项目式救助

更多慈善组织采取的是民间筹资、民间运作的的项目式救助模式对大病儿童进行救助，病种主要集中在先心病、白血病、唇腭裂等十几个病种。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共有36个项目进行儿童先心病的专项救助(此处专项救助是指仅对儿童先心病进行救助,非专项的先心病救助列为“综合”疾病救助项目的分析中,下同)。从这些慈善组织的救助人数分布来看,中等救助规模的项目较多,救助人数在200至300人的占多数。这主要与先心病救助较为简单、单个病例救助所需资金量少、较容易规模化运作有关。目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阳光基金、西部儿童救助基金会、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上海儿童健康基金会、上海慈善基金会、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救助规模较大。此外,河南省、广东省、湖北省、海南省、山西省、辽宁省等地的慈善总会救助的先心病患儿人数也都在200人以上。

2013年共有18个慈善项目涉及白血病患儿的救助。救助白血病患儿的慈善项目规模偏小,大部分白血病专项救助项目的救助人数集中在50人以下,这主要与白血病患者所需资金量大、救助实施难度大、较难规模化运作有关。在对白血病患者进行救助的项目中,救助规模最大的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旗下的小天使基金,救助人数为1800多人。此外,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神华公益基金会、辽宁省红十字少儿白血病救助基金、爱佑慈善基金会2013年救助的白血病大病患者人数也在200人以上。神华公益基金会从2011年开始救助白血病患者以来,已累计救助了1700多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共有15家慈善组织参与到唇腭裂患儿的救助,其中微笑列车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为进行唇腭裂患儿救助的两大公益主体。此外,有13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慈善总会参与到“微笑列车”唇腭裂患者援助项目的执行。

其他患病领域中,2013年共有8家慈善组织参与到脑瘫儿童的救助,救助脑瘫患儿的慈善项目数量较少且规模小,这主要与脑瘫患儿所需康复费用高、救助效果短时间内不明显有关;2013年共有3家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天津市慈善协会)开展了对血友病患者进行专项救助的项目;此外,还有13个项目为其他病种的专项救助,救助的疾病种类包括脑积水、肝病、疝气、自闭症、癫痫、再生障碍性贫血、结核病、苯丙酮尿症等。

利用新媒体平台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公益组织也陆续通过新媒体平台宣传、筹款。目前主要的新媒体公益平台有:新浪微公益、支付宝E公益平台、腾讯乐捐等。

新媒体公益平台具有灵活性强、成本低、积少成多和筹款迅速的优势。首先,新媒体准入门槛低、使用频率高等特点,使其拥有广泛的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需求信息进入新媒体平台之后,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的转发和评论,尤其是名人的转发和评论,可以迅速引起公众关注。

其次,新媒体的使用方便,公众运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客户端,能够快速获取救助信息,同时以较低的时间成本进行小额捐赠。据新浪微公益测算,自2012年2月上线到2013年9月,就

有将近 20 万爱心网友参与过捐款、转发及关注公益项目。由于包括新媒体等在内的救助平台在公益救助方面的优势，不少慈善组织通过儿童大病救助信息平台的方式对患儿进行救助，如北京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儿童大病救助项目、中华儿童少年慈善救助基金会 9958 儿童紧急救助项目，以及施乐会等网络爱心互助平台。这些项目都善于运用热线、网络等方式进行资金筹集，对患儿的救助需求进行快速响应。

儿童大病救助的互助金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家医疗保险缺失的情况下，多地探索建立了儿童医疗互助金模式，其中以上海市中小學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建立时间最早，运作最为成功。即使在各项保障制度都较为健全的今天，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仍在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6 年 8 月 13 日，上海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市卫生局等部门共同建立了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基金与保险公司分离，并于 9 月 1 日正式实施。上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当时全国唯一在省市范围内统一推行的、公益性的、互助共济的少儿医疗保障形式，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覆盖近 220 万少年儿童，其中非上海户籍的占 1/3，这在当时，对解决全市少年儿童大病、重病住院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17 年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累计为 132.2 万少儿支付医疗费用，支出费用 137374 万元，人均次报销 1039 元，为 6.2 万人次大病患儿提供住院和大病专科门诊报销，大病患儿人均次报销约在 2300 元左右。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796.html>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儿童大病救助机构怎样合纵连横

编者按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共有 96 家慈善组织开展了 149 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其中，慈善组织救助唇腭裂患儿 4 万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3 万多名，脑瘫患儿将近 9,000 名，白血病患者 4,300 名，肢体残疾儿童 1,600 多名，听力残疾儿童 900 多名，救助了烧烫伤患儿 140 多名，其他疾病患儿 30 万名，加上其他未披露信息进入统计的儿童大病救助项目，2013 年，慈善组织共对将近 40 万名大病患儿进行了救助。如果不将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和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为其购买了大病医保但并未获得保险理赔的儿童计算在内，2013 年慈善组织共救助了 10 多万大病患儿。

社会力量的介入，无疑弥补了部分疾病尚未被国家政策覆盖的不足，与政府医疗救助的救助力度相比，慈善组织的救助力度更大，除了医疗费用外，慈善救助的内容更为丰富。这些都是社会组织所展示出的优势。

然而，社会组织也会在救助过程中，依然暴露出诸多不足和问题，儿童大病慈善救助也面临着资金募集难度大、专业人员缺乏、为患儿提供专业服务能力不足、慈善组织之间缺乏互动与衔接等基本挑战。

目前的慈善组织大部分都独立运作，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就不同疾病的大病救助而言，缺乏统筹会导致救助资源集中于某几种病种，造成一些疾病救助资源不足，另一些疾病的救助资源过剩；就同一种疾病患儿的救助而言，缺乏统筹会存在过度救助的可能性，而患儿及家长在了解不同慈善组织的救助标准以及准备申请资料的过程也需要时间。

7月22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发布了《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分析》报告，并就加大儿童大病救助扶持力度、打造儿童大病救助联合平台等进行了探讨。

现状：异地就医普遍

流动儿童医保问题突出

《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当前全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基本医保对重大疾病的实际报销比例有限。数据显示，基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在20%-45%，超过20万元以上医疗费用的疾病实际报销比例还会更低，有超过70%的参保农民和参合居民仍未被可以提供大病医疗费用二次报销的城乡大病医疗保险覆盖。其次，儿科医疗资源短缺且不均衡导致儿童大病异地就医非常普遍，而医疗保险县级统筹与异地就医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导致报销比例进一步降低，且就医和报销流程非常复杂。第三，流动人口参保制度建设滞后，上千万流动儿童医保问题突出。据统计，2012年我国0-17岁城乡流动儿童约有3581万人，其中跨省市流动儿童有1078万名，流动人口的参保率仅44%。

国家卫计委基层卫生司副司长聂春雷在论坛上介绍，2010年，原卫生部会同财政等部门，从儿童先心病、白血病两个病种入手，开展了重大疾病保障工作，实际医疗费用报销70%，符合救助条件的，再由医疗救助补偿20%。2013年纳入大病保障病种已经扩至22种，包括多种与儿童有关的重大疾病。部分省市还探索将儿童神经性耳聋、人工耳蜗植入纳入大病保障范围。

从2012年起，卫计委指导各地，利用新农合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在参合大病患者中，发生高额医药费用情况下，新农合报销结束以后，由大病保险基金对家庭难以负担的部分还给予一定的补偿。截至2014年5月底，全国50%以上的县市区已启动大病保险工作，覆盖

人口 2.97 亿，大病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在新农合原报销的基础上，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

政策：

公益救助怎样与体系结合

在政府搭建的医保体系尚难以全面保障的背景下，以社会资源为主的公益慈善救助成为解决儿童大病医疗难题的一个重要补充资源。《报告》显示，2013 年，全国 90 多家慈善组织共开展了将近 150 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对 10 多万各类重大疾病患儿进行了专业有效的救助，弥补了部分疾病尚未被国家政策覆盖的不足；其中，对不区分病种的多种疾病的综合救助项目数量最多，占 25%。专项救助项目中，先心病、白血病、唇腭裂的救助项目数量最多，分别占比 24%、12%和 10%；从项目的救助规模来看，针对白血病、脑瘫、残疾儿童的项目规模大部分集中在 0~50 人，规模较小，而针对先心病患儿的救助项目，已有部分项目达到中等规模。慈善救助具有及时性、多样化的优势，同时能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国家近年来彩票公益金对儿童大病救助项目的支持，已经发挥了较好的推动示范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说，现在的医保、医疗、医药、民政，还有公益机构，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体现在儿童方面，一个家里的孩子得病了，得四面去求救，跪在路上的也有，网络上的也有。

对于公益慈善怎样与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相结合，爱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昭华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在 2009 年之前，爱佑一直都是在做独立资助，没有办法和政策相结合。“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困扰。”蒋昭华说，“2010 年之后，我们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他们支持 55%-60%的治疗费用，爱佑承担剩余部分，所以这些儿童的大病治疗全部由公益组织和政府来承担。江西省也是，我们和革命老区基金会还有他们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几方联合。”

现在的新政策每个省的做法都不一样，这对公益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有的地方省一级、市一级的政策都有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想推进全省的及时结算，目前黑龙江、安徽等几个省和我们签订了大的合作协议，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合作。安徽省现在是新农合定额报销 70%，这个定额是全省范围内都可以直接结算 70%，爱佑承担剩余的 30%，所以安徽省的孩子手术费用也是全额结算。”蒋昭华说，“爱佑希望能够探索资源整合，多方联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底，我们是政策的补充，希望补剩余的部分给补上。”

挑战：

公益机构之间如何协作

公益机构之间怎样整合儿童救助资源？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表示，同一病种的救助机构有很多，在这些组织里边，大家真的能够联合起来的其实少之又少。每一家都在审核，每

一家都在筛查，大家是否能联合起来？“每家基金会特点不一，有的基金会资金比较雄厚，他们希望给孩子直接的资金资助。春苗资金非常薄弱，但我们依然可以帮助孩子，我们可以跟其他基金会联合，我资助的孩子，如果别人再资助了，我的资金就撤回来，投入到其他有需要的孩子身上。”

没有共同的想法和观念，就会产生机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样反而产生很多内耗，降低了救助效率。崔澜馨说：“其实对于复杂的病种，通常是需要几家基金会联合资助的。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形成一个规范，大家的联合就不难了。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政府、基金会、医疗机构之间的横向、纵向联合，包括媒体的联合。”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795.html>

[【返回目录】](#)

善达网：别把公益众筹做成“化缘”

当年唐僧师徒的一路化缘，其实就是一种众筹，施主们帮他完成了西天取经的梦想。而唐太宗，不过就是那个大股东。有创意有项目缺少资金怎么办？不求朋友不去银行，众筹让梦想变成现实。许多人将时下流行的众筹模式当作筹资乃至创业的“神器”，然而往往被人忽略的是，众筹模式在公益活动中同样具有着“魔力”。

有众多的公益人士和公益组织看中了众筹的模式，想利用众筹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但是互联网众筹不等于是在互联网中募捐更不是在互联网中化缘，众筹网站的共同鼻祖是美国的Kickstarter，该网站致力于支持和激励创新性、创造性、创意性的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众集资，让有创造力的人可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以便使他们的梦想有可能实现。

近年来国内众筹网站如雨后春笋一样的萌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众筹网站上线，就连BAT这种互联网巨头也开始涉足众筹这种模式。追梦网的联合创始人陈卫邦告诉善达网有很多单纯于筹款的项目因为缺少创新性，在他们选择项目的初期就被筛选下去了，公益众筹是获得资金支持继而完成创新项目的资金募集途径，不要让其变成化缘的一种工具，更不能成了满足某个人的私欲的工具。

用互联网思维区规划公益众筹项目

翻阅在各大众筹网站能够脱颖而出，很快众筹成功的项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项目比较创新，不仅仅是说我需要多少钱，你们必须给我多少钱，都是项目有一定的创新度，能使参与众筹的用户有参与感和代入感，众筹不等同于化缘，因此不能仅仅是因为筹款而发起众筹，而是更多的要公众了

解和参与公益项目。“我们希望能上线的公益项目，有创新性，有社会价值，最好有后期自我造血功能，这样的才能称之为社会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去筹款，去支教，去建设，这样只是短期且没有创新性的项目。”陈卫邦告诉记者。

众筹是互联网思维下的产品，公益要想利用好众筹这个工具就一定要学会用互联网思维去考虑公益项目，公益在互联网时代的已经不再是单独的为开展公益项目而筹款，而是要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让公众更了解公益，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公益中来。

公益众筹也要合理设置回报

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在互联网时代，化缘的叫众筹，算命的叫分析师，八卦小报叫自媒体，统计叫大数据分析，忽悠叫互联网思维。那化缘的真的能叫众筹吗？当然不能！众筹是在互联网思维下的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按照这种互联网思维，我们需要发散出各种 Idea 和提供期望回报的。

公益众筹的目标是为了达成一个具有创新性和公众参与性的项目，而非满足筹款的一种形式。众筹不是一个捐赠平台，支持者需要有回报，这也是众筹模式得以运转的一大基础。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媒体平台，把这么多项目集中在一起展示，可以影响到你不认识的人，适合草根 NGO 和公益项目的小额募款。设置好合理的回报更容易让参与众筹的公众更好的参与到项目中来，使得公众更有参与感。

来源：善达网

地址：http://hope.huanqiu.com/exclusivetopic/2014-07/5090456_2.html

[【返回目录】](#)

【十问资助者】伍松：如果我们做到 35 万所学校的 10%，也许改变就会发生

伍松，心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该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少年儿童享有阅读的机会，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伍松最近参加了“新教育实验”年会，看到“艺术教育”这一不那么主流的话题竟吸引了近 1800 位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与，觉得很有趣。他讨厌“课外阅读”的说法，认为阅读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他从不担心基金会专注于阅读领域会“太窄”，他相信“10%”定律，即如果希望一个社会变革普遍地成为事实的话，至少要改变其中的“10%”

1. 过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伍松：过去一周有一半时间在做案头工作，比如看新的合作伙伴的项目建议书，制定和签署一些捐赠协议，回复运行中项目的反馈报告等。剩下一半天时间，参加了几个合作伙伴组织的活动，比如真爱梦想的梦想教练培训。不过这一周不太典型，因为我们主要做教育项目，有一些周期性。目前是暑假，很多项目处于暂停阶段。学期中的话，会多一些出差，比如去合作伙伴所在地和项目所在地，或者去参加一些论坛、聚会去认识人。

我们基金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采用的是“邀请制”，就是自己主动去寻找那些可能合适的组织，找他们谈。而很多基金会的一般做法是“招标制”，就是把要做什么、什么要求公布出来，大家来申请。招标呢，有点像“征婚”；邀请呢，更像“谈恋爱”。我们去认识那些合作伙伴，更多地是去认识这些组织的人。谈完之后，再进行“试婚”，就是小规模、小额度的合作。我们不在项目建议书上抠太多，而是希望先做起来——走着瞧，既是对合作伙伴的考察，也是让合作方有机会考察我们。

2. 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伍松：我之前去苏州参加了“新教育实验”的年会。新教育实验由朱永新教授发起，可以说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教育改革行动，已经有2400多所学校参与进来。新教育实验的口号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侧重点放在“营造书香校园”，也就是阅读，强调阅读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是对现有应试教育的一种补救和自我解放。朱永新教授在2000年写下《我的教育理想》一书，慢慢地从一个做学问的人变成一个行动者，开始做“新教育实验”，而一批相当有担当的教师、校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逐步参与进来。这一行动在民间，尤其是一线学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今年的年会近1800人参与，创下了历史新高。会议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住学生宿舍，吃得也很一般。而且因为人太多了，会场坐不下，就设置了两个分会场。分会场的人只能通过视频看到嘉宾。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依然愿意来参与。我觉得这很有趣。

另外一个有趣之处是本次年会的主题。以往选择的还是在教育领域比较主流的话题，今年的则是“共话艺术教育”。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学校里，艺术教育是被边缘化的，它与考试、学习成绩无关。在城市是根本不重视，在农村则几乎没有。原以为本次的主题可能吸引不了多少人，确实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很多人通过这次年会认识到艺术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也看到艺术教育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同时意识到艺术教育不单单是作为艺术的教育，其实是可以涵盖到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的。

新教育实验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之一，认识他们也是因为我们的领域比较“窄”、做得比较“专注”。几年来一直都在阅读领域，相关的机构我们几乎都比较了解，他们也都知道我们。（您会担心由于领域过窄，好的机构都合作过了，以后怎么办吗？）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定他们做

的事情，我们会一直支持下去，创新对我们来说没那么重要。这就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做阅读，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理解“应试教育”是最重要的，一切都围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当然解决方案也有很多，而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只能自下而上地推动，我们发现自由大量的阅读能产生一些相当积极的影响。单就阅读来讲，对于农村，没有资源；对于城市，有资源但是没时间。目前全国的小学和初中加起来有35万所左右，我们基金会支持了2000多所，再算上我知道的做阅读推广的，粗略算来覆盖到5000-6000所学校。这还是一个很低的比例，我们觉得做得还远远不够，所以还会持续扩大规模，而不是转去做别的一些事情。

(不少基金会会考虑做出一个模式，然后让政府去推广，您怎么看?)这种思路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现在做的还太少。有一个定律叫“10%”或者也有人说是“16%”，就是说如果你希望一个社会变革普遍地成为事实的话，你至少要改变其中的“10%—16%”。拿10%来说，就是3—4万所学校，也许到那个时候，改变就真的会发生了。

3. 最近做的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伍松：我们比较核心的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小学到初中阶段的阅读推广，另一个是大学生公益项目。还有一个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核心的方向是贫困儿童大病救助，其中有一个合作伙伴叫“天使妈妈”。这是由一群妈妈发起的民间组织，她们注意到很多家庭由于孩子得了大病，或出了大意外，会重返贫困，她们就为这些孩子募集医药费。这种做单个救助的项目非常非常辛苦，但也容易受瞩目，容易被人挑毛病。“天使妈妈”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挂了专项基金，之前“儿慈会小数点”事件时，周筱赟也把矛头指向了“天使妈妈”团队。

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公益组织，不能说“我身正不怕影子歪”，还是应该理智、冷静地去回应。于是我们就资助“天使妈妈”做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和第三方评估。不过审计机构(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不是我们、也不是“天使妈妈”选择的，而是由热心网友和捐赠人推荐并投票产生的。我也投了票，最后确定的不是我投的那家。审计和评估的结果，都表明天使妈妈4年来的财务和项目没有任何问题，并进行了公示。虽然这件事关注的人不多，不过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4. 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伍松：做我们这种工作经常有这种感觉。或者不叫“无意义”，而是“悲观”。我们做阅读，其实是想推动教育改革，而这种变化最重要的还不是学生，而是改变老师。很多人认为阅读是满足学生的需求，被称为“图书扶贫”。而我们认为如果老师的观念不改变，就算有了书，也不会让孩子去读书的。同时，我们比较反对“课外阅读”的说法，阅读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不应该分什么课内课外，一旦说课外，就意味着不重要。大多数老师、校长长期被框在应试教育中，观念是极难改变的。但参与例如上面说的“新教育实验”年会这样的活动，又会看到好多愿意改变的一线教育工作

者，在这样一种抱团取暖的特殊的“气场”中，我们会不断找到那些坚持理想的行动者，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鼓舞，让我们愿意坚持做下去。

5. 最近在集中琢磨什么问题？

伍松：这就说到大学生公益项目，我们支持的主要是暑期支教。“短期支教”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就受到很多质疑和指责，我每到各地的合作伙伴那里，都会鼓励他们要想清楚自己的选择，坚持做好自己的选择。我在思考应该把短期支教这个词改一下，叫“乡村夏令营”。因为其实我们做的也不是支持教学、支持教师，而主要是把乡村学生组织起来，做一些艺术活动、读书活动、看电影、文艺汇演等。

夏令营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像我自己的孩子也会参加夏令营，他会有很多收获。与平时上课不同，夏令营没有作业、没有考试，会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会有一些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冒险。可是农村的孩子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6. 最近一次出差去了哪里？遇到什么有趣的事？

伍松：6月初的时候去参加烟台大学一个公益社团“西望桥”组织的“半岛公益论坛”。这个活动从策划到邀请嘉宾、整个组织协调主要都是由大一、大二的学生做的。他们请到了“免费午餐”的邓飞，我们都知道邓飞很忙，但是这些学生锲而不舍地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他。邓飞在论坛当天本来有一个在广州的免费午餐万人筹款大会，他就调整了行程，参与完烟台的活动之后，再赶去广州。邓飞说“你们这么执着地邀请我，我哪儿都可以不去，这里必须要来”。这个论坛做的很纯粹、很干净。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很多人不看好90后，但我觉得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了，会做得非常好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

7. 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伍松：最近经常读老子的《道德经》。老子主要是讲“无为而治”，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相信别人”。他描绘了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情境，反映到教育上，其实就是“相信孩子”。不要过多地去“教”，哪怕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孩子，他也有无穷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力量。我觉得教育最根本的更多地是去“呵护”，呵护这些种子让他们自己发芽，不要去破坏。每个做教育的人都应该读读《道德经》。

另外，做资助也是一样，需要高度信任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没有很多繁琐的文案、监督、评估等等，但很多合作伙伴都说正是因为这样程度的信任，反倒觉得很有压力，觉得一定要做好。我也非常感谢心平基金会的创始人段永平先生和刘昕女士以及理事会一直以来对我的高度信任和放权，他们看上去似乎没有做什么，但实际上他们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正是这种信任，才让我有能量把信任传递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8. 最近最关注哪个行业话题/事件?

伍松: 没有。

9. 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伍松: 暂未想到。

10. 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 你会如何描述?

伍松: 用商业来类比的话, 比如你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 发现很多人都需要吃饭, 那么有两种做法, 一是直接开餐馆, 像麦当劳或者兰州拉面。但是开餐馆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很多人都做不好。还有一种是找那些开餐馆的人, 投资他们, 帮助他们做的更好、做的更大。我们基金会就类似于商业领域的投资人, 我们的长处是有资金和资源, 短处是缺乏公益的人和专业的人, 所以我们去资助那些拥有专业团队的 NGO 做得更好。

【资助者问资助者】你有什么想问下一个资助者?

伍松: 很多人说美国的 NGO 那么发达, 当然可以做资助型基金, 但是中国的 NGO 数量少、事情做的也不够漂亮、人也不专业, 把钱交给他们不放心, 你对这一观点有什么看法?

伍松本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请参见下期“十问资助者”。

来源: 公益慈善论坛转自社会资源研究所

地址: <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661>

[【返回目录】](#)

【鸿芷】阿里公益基金会 Q&A 四部曲（一）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是如何运作的

委员简介

凡真: 天猫产品运营专家。对大气污染防治感兴趣, 力推基于社区行动的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工作。

琉璃: 对自然教育感兴趣, 目前主导了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公众参与资助策略的制定并牵头该领域的项目评审

幼薇: 对创新性的公众参与项目感兴趣, 参与了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源创马拉松”项目的设计及管理, 通过“源创马拉松”来发现和培育创新的民间环保机构。

闻佳：作为母亲，闻佳对儿童环境教育感兴趣，并计划和实施了绿色社区的推广活动；

战哥：战哥参与了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水污染防治资助方向的项目策略制定，作为公益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位技术大牛，战哥还在思考如何帮助公益组织拥抱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机遇。

1. 为什么是环境方向？

问：我是一家企业的 CSR 负责人，今天来是很希望知道一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主要资助环境方面，请问这个方向是怎么确定的，我比较关注这个过程。

陈卓：我先来回答一下吧，其实是这样，阿里巴巴各个公益部分加在一起，我们可以统称为企业社会责任，而基金会其实是阿里巴巴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中一个延伸，它与社会接触的更紧密，对接我们社会公共利益的诉求。

我们企业社会责任做的事情偏重员工公益，偏重我们利益相关方的公益推动。而基金会，刚才说了，它是我们社会责任的其中一个外延。基金会之所以选定环保这个方向，其实也是有一段背景，这个请委员闻佳给讲一下。

闻佳：首先，马总（马云）现在是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理事会的主席，这个跟基金会的环境方向也有关系；第二，确实因为我们现在每天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正在一天一天地恶劣，尤其是我们的水。把环境比作人体的话，水就是我们的血液，血液出了问题整个人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任何问题都会来。我们觉得我们能力不多，只有把能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上，才能把那个东西做得更好。

因为有 TNC 这个支持，以及有很多外围支持，做环境方面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资源；第二确实也觉得水、空气现在有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这个方向。

另外基金会还有一个公众唤醒的方向，这是我们基金会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除了在做水和空气这些环境类的保护之外，我们觉得还有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

2. 公益委员接下来怎么换届？

问：咱们整个公益委员会是竞选出来的，所以会涉及到换届改选，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伙伴想要连任，或者你们想连任的话，连任的宣言有没有准备呢？如果你们觉得有些特别合适的人，你们又怎么去推荐那些人，让他们竞选到新一届委员会？

凡真：说实话，这个问题问的真及时，我们今天上午刚刚讨论过这个话题。换届的事情，我们已经准备半年了，这次我们不会像三年前那样，全公司花半年的时间大规模的竞选。

第一年我们考虑到理想性，但这次我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三年下来，我们希望积累的经验能够传承，通过目前这些委员以老带新的方式，让很多新人进来。

我们公司内有内网，什么事情都会在里面发声。通过内网，甚至我们推荐，可以发现很多人才。我们公司员工有组织幸福团，每个团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大家在公益上都非常积极，这是我们委员很好的来源。

就是说，这次不会一下子第一届全部退掉，让新人全部上，方式还是希望以老带新的方式。

我们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从刚开始的焦虑，到后面的慢慢熟悉，现在我们这些人形成默契是不容易的，也有很强的感情，所以希望能继续做些事情，不过不一定是以公益委员的方式。

3. 基金会如何保值增值？

问：我想问一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资金如何实现保值增值。

陈卓：这个问题很专业，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一定要保本。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公益委员今天在这里，他们都是经过阿里巴巴 2.5 万员工民主大选出来的，阿里巴巴承诺每年拿出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三来做公益投入，这些钱都是阿里巴巴的每一个员工赚出来的，他们有权决定这些钱如何去运作，投在哪些公益项目上，这是资金的使用。

而基金会保值增值，应该从机构治理上来说，这是属于我们理事会的权责范围，不属于委员会的权责范围。理事会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一定要保本。在做保值增值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损失，不能有任何的冒险。所以这块我们就采取比较保守的方式，我们相信这个决策目前来说还是正确的。

问：这个保守的理财方式是储蓄吗？

陈卓：我们有一个财资部，他们会来给我们做专业的分析，说实在的，我也看不太懂，不是专业的财务人员也看不太懂，但是我相信有几个不偏离的原则之后，这些钱肯定会非常稳健地去做保值增值。

4. 资助出的项目怎么监管？

问：你们资金投出去后，使用过程中的监管的方式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制度？

陈卓：因为阿里巴巴是企业，我们对于合作伙伴，就是被资助方的监管还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采用的是非营利机构这套治理加上企业的一套。所以他们在跟我们合作的时候，我们要申请诚信征集，首先机构是否合理合法，完全一套企业流程，结合到现在国家对非营利机构的一套要求，所以你可以到和我们资助过、合作过的这些伙伴们交流一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心得。

项目过程中，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我们会有严格的把控，会找第三方机构做一些额外的审计，其实这个双重标准是阿里巴巴基金会的特色。

对这些合作伙伴，我们当然希望要合理合法合规的做执行，也希望通过这种要求，我们共同成

长。我相信公益不是一个圈儿，我们自己做就好，自己搞一套标准互相认可就好了，不是的，肯定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现在商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样板，我们就是基本上借助企业那一套管理方法，对项目流程的监控、监管是这样的。

5. 现在对环保 NGO 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问：基于这两年多的工作，现在基金会对环保 NGO 的现状有什么看法，或者你们认为环保 NGO 在哪方面需要多做一些努力？

琉璃：我从个人感受谈起，第一，从各个 NGO 的形式来看，我觉得行动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没有看到太多的创新行动。

还有一个是，确实距离公众太远，大家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公益圈子里面玩。其实离开这个圈，没有太多人关心，或者说大家也不知道从何关心。就像杭州一个垃圾焚烧项目，这么严重垃圾焚烧的问题，闹得已经上千民众上街，但是那边没有一家 NGO 站出来说应该怎么样。就觉得我们 NGO 能给出的解决方案太少。

6. 有参与浙江的五水共治吗？

问：我想问一下，现在浙江省在推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编者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也偏重水保护，你们在这方面有做什么？在这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杨方义：在水这个事情上，因为阿里巴巴总部在杭州，所以我们特别关注浙江的水保护，所以五水共治起来以后，政府开始做很多事情，我们也在找我们的生态位，看做怎样的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和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 合作，引进国际专家资源，和“五水办”商量，看怎样能让污水控制做得更好，让决策更合理、更科学，这是和“五水办”合作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们也和浙江很多民间组织一块来参与，现在我们有些项目上的投入。浙江水污染上，有很多行业超标排放比较严重，我们和民间组织一块，用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政府部门一起促进这些非法排污企业的整改，过去一段时间来说比较有成效。

7. 阿里还有其它公益平台吗？

问：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目前主要关注环保领域，是否考虑用阿里平台为其他公益机构搭建更多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筹款？

杨方义：我们社会责任部门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公益基金会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淘宝公益，专门用我们自己的业务来服务于整个公益目标。比如说筹款是其中一个，另外就是其他一些业务，是能够为社会的福祉服务。像很多公益组织利用淘宝开网店销售一些生态产品，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现在公益委员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他能够把业务和公益结合起来，比如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淘

宝农业，做挑食栏目，栏目里销售很多跟生态有关的产品，价格还不错，未来生态保护区做的好产品，只要达到市场需求，是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来做贸易的。

今天有一个委员没来，我觉得特别值得讲一讲，她叫明明，是淘宝公益拍卖频道的，公益拍卖这个频道没有几个月，她是参加了公益委员会之后，发现公益组织除网络筹款以外，其实有可能用拍卖的方式获得一些资金支持和吸引公众参与，所以她开了一个公益拍卖频道，现在很多基金会、NGO都在上面用公益拍卖的方式来做。

另外我们还有淘宝众筹这样的品牌，其实接下来业务里面有很多服务公益行业的东西。未来在资助的同时可以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战哥：阿里业务平台很大，大家有公益的思想、商业的手法，上阿里就对了。这里面有公益网店，有公益拍卖，公益筹款、公益众筹，其实各种业务，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能帮到你们很多。

问：在做水污染防治案例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在我们项目书里的状况，有一些需要筹款，比如说身患癌症或者是他很年轻就会有一些病症。刚才听到阿里巴巴有一个叫做爱心筹款的环节，我想问一下，这个爱心筹款怎样提交与审核，它有什么样的要求。

琉璃：谢谢大家对支付宝钱包爱心捐赠这么关注，爱心捐赠针对机构，我们也在寻找好的项目，对公众有吸引力的项目，要求的话很简单，算是三个要求。

第一、你要有公募资格，其实就算你没有公募资格，你挂靠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也非常容易，包括像免费午餐就是。

第二、一定是财务公开透明，这个一定要做到。

第三、小有成绩。

我们是面向公众筹款，你如果曾经做出过成绩，有些证据证明你是靠谱的，这样更好。还有，你要有一个好故事，能够打动公众，差不多这样子，具体联系方式我们网站上有。

来源：鸿芷微信平台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xNTI0MQ==&mid=200291234&idx=1&sn=6ce9993a3d50123ca24cc86ce0f9354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鸿芷】阿里公益基金会 Q&A 四部曲（二）阿里员工做公益委员 如何确保专业性

问：我来自 NGO，也是做教育方面的，刚才听各位说参与的公益委员都是选出来的，相信各位在自己工作领域都是中国业界非常一流的，但是在资助方面，领域越细所需要的专业性就越强。

比如说像福特基金会，它在资助领域的资助官员虽然也有委员会，但最终主要负责决策的官员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在他所负责的领域里有非常深厚的背景。

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这样的结构下，资金是不是真的花在专业有效的项目上？怎么专业地抉择？

陈卓：如果你能给建议的话，你觉得如何是最专业、最有效的？

问者回复：我觉得如果是我个人的话，的确有一个委员会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委员会人数，可能五个、六个、七个，但是这里有一部分是民主投票选出来，另外还要有非常专业的，在环境甚至就是在水环境领域非常专业的人。

闻佳：我们是这么想这件事情的，在公益层面，我们这十多个，最早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我们最大的强项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业务有判断，这对我们分析项目的影响也是各有利弊，除了我们委员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专家团队，不管是垃圾处理、水项目，都有。

但是我们发觉，当一个项目要审批的时候，不仅仅是看它向你表述的东西专不专业。它做的事情专不专业，人很重要，我们相信我们对人会有很好的判断，这是我们优势的地方。但是专业的知识，因为我们不专业，我们请外面的专家补我们的短板。

第二个，你说我们投的那些项目是不是很成功，对公益上是否很有帮助，我也不这样觉得。但是至少我们批出去的项目，第一，不是一个砸的项目，多多少少对这块领域做出了它的贡献，虽然它贡献不一定大，这个有时也很难评估。但我相信只要每个地方做小的事情，一点一点发生，最后对整个大的环境一定有作用。

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在讨论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起争执，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够不够专业。最早时候确实不专业，但我们发现我们不专业，我们有专业人士，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强项，依据这些人的强项确定这个项目该做还是不该做。

最后就像刚才战哥说的，我们不能保证这个项目投出来一定有多大的丰功伟业，对环境有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它可以做，一定是某些方面是有效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资助的基本原则。

战哥：专业路上我们也经历了一些成长，怎么讲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选出来，选出来的时候确实问一些什么专业问题，什么地膜覆盖、水渗透，长江流域怎么分布的，我们不知道，这个项目要不要投？这些东西怎么办？

所以我们请 TNC 的专家来给我们讲，如果搞不懂的我们就会请专家。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委员，不敢说是专家，但对基本的一些环境问题都已经具备了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哪些项目他说的是对的，哪些项目他说的可能有问题。

说说我所遇到的事情，我是搞技术的。前段时间流行大数据，有个机构就说我要把什么流域的水数据全部收集起来，然后用阿里的大数据处理。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事情肯定不靠谱，为什么，你现在那点机构、那点人，你搜集的数据加起来有多大，也许一个 Excel 表格就搞定了。

还有别的，比如说湿地保护，问要投多少钱，十几二十万，一看这个东西明显不是很靠谱。有时一些人也摸惯了基金会的方向，他要的钱也不多，在你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他的故事包装的特别好，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的判断能力现在也逐步具有了。

说实在话，我们这些委员本身就有一些草根性，都是员工嘛，不是公司聘请的高级专家，我们的成长主要是凭自己的学习和咨询专家。

工作中，我们会到一线考察，感受 NGO 的工作，有些 NGO 确实不容易，他们的工作挺难的，可能项目这些钱对他们帮助非常大，这个项目投不投已经不重要了，关键让这个组织走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做这样的判断。这个时候专业性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不管他是对还是不对，他的科学论断是成还是不成，只要这个组织愿意往这个方向走，我们先支持他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专业性起多大作用，当然大的项目，比如说浙江省五水共治，那个东西我们肯定有专家的队伍在做。

杨方义：我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处的，和 NGO 接触最多，大家报的项目，第一手到我们秘书处这边，我们审核之后才给委员投票。

我们的公益委员确实有一个成长起步期，他们在各自工作里面是专业的，但是在公益上的了解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公益人可能完全不一样。

刚才那个朋友讲福特基金会，他们运作近 80 年才形成这样一个工作方式，靠资助官员的经验判断来做决策，后面的理事会在审批的时候的确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在中国，基金会快速发展也就这么几年的时间，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2011 年成立，今年刚好三年了，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一个投资策略。

今年下半年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把我们的投资策略做起来，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我们一方面咨

询专家，另一方面是对过去的一些资助情况做总结，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跟 NGO 一块来做资助策略。

资助策略对评审的帮助特别大，对 NGO 来讲也是一样，NGO 在报项目的时候也需要知道基金会的方向。有一个策略后，可以让 NGO 知道未来什么东西是可以申请的。

刚才战哥讲了，过去十万元的项目我们讨论上半天都有可能，现在是越来越顺了，因为我们的公益委员的确在成长，他们知道在水污染防治上什么事情是重要的，现在评审的时候，背景不需要讨论，事情本身重要我们就讨论，不重要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更多讨论的是事情怎么做，对于这个机构，未来我们除了提供资助外，是不是能提供更多的钱以外的支持。

另外，每个公益委员在每个行业上都有分工，比如说战哥他做的是技术，很多 NGO 在技术上有需求，完全就可以找他。另外琉璃现在在支付宝工作，在自然教育上有很多投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是，除了资助资金外，我们更多输出了我们的员工或者输出了我们的公益委员。

来源：鸿芷微信平台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xNTI0MQ==&mid=200293430&idx=1&sn=1d1598ecb66f3ac9df56579c1eff104f&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顾远：社会企业的品牌营销之道

做有理想的品牌

爱默生是 19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很多言论都以警句的形式流传至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比如这一句：“只要有人能比他的邻居做出更好的捕鼠器，人们就会踏破他家的门槛。”今天每一家成功的企业都会清醒地意识到，要想让顾客踏破自家门槛，除了要有过硬的产品，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必须考量，而品牌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品牌可不是商标和 Logo 组成的视觉形象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心理建构和情绪体验，简单的说就是顾客看到一个品牌会联想到什么。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优秀的企业都明白使自己独树一帜的并不只是产品和服务，而是理念、价值观、体验和身份感这些看起来很“务虚”的东西。一个有独特气质的品牌正是它们的集中体现。用世界著名广告公司奥美的话来说，品牌应该体现出超过产品和服务本身的“大理想(the Big Ideal)”，品牌的塑造不是在创意“某个点子(share of mind)”，

而是在创意“某种文化(share of culture)”。苹果公司或许是体现这种“品牌大理想”最好的例子。在1984年为Mackintosh电脑推出的那则著名广告中，没有一个镜头提及产品本身的卓越，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对“老大哥”(谁都知道那指的是IBM)形象的颠覆上，彰显出苹果的气质和野心。同样，在另一则名为“Think Different”的广告中，苹果公司向那些有着独特观念的行动者们致敬，在感人至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品牌定位牢牢地印在了顾客心中。

与商业企业纷纷打出“理想”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是因为理想而诞生的“社会企业”却似乎在品牌营销上乏善可陈。

社会企业通俗地说就是用商业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创办一家社会企业需要有“心”——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根本目的，有“脑”——懂得如何借助商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去运作，需要实现双重底线——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财务上的可持续，从而能够持久和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很显然，在任何一家社会企业的诞生之初，理想便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企业理应在品牌营销上具有先天的优势。社会企业无需在构建理想时刻意为之(奥美建议自己的客户在想不出理想是什么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填空题来帮助思考：“当我们/我们的产品XXX的时候，世界就变得更加美好。”)，它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已经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理想。从受众的角度，相比商业企业的CSR(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社会企业的顾客和支持者们也更容易相信它所表达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家社会企业的理想正是它最重要的资产。

社会企业如果想要经营好自己的“理想”资产，实现有效的品牌营销，不应该一味在技术层面上照搬商业企业品牌营销的手法技巧，而是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充分发挥和体现出社会企业所特有的优势。

知：社会企业的品牌理想

所谓“知”，指的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经营的事业所希望实现的社会效应(social impact)是什么，以及带给目标顾客的价值主张(value proposition)是什么，再用精准而直指人心的语言表达出来。乍一听，这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只要看一看现实中很多社会企业的所作所为，便会知道那些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往往做起来很不简单。

有些社会企业的“理想”要么太宏大，要么太模糊，比如一家助残类的社会企业，负责人声称自己的机构就是“帮助残疾人的”；另一家提供儿童关爱服务的社会企业，它的目标是“解决全国孩子的温饱问题”。这样空洞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机构并没有真地想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做现在的事情，又希望实现怎样的目标，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构成品牌理想的关键要素。还有一些社会企业在传递自己的理念价值观时单纯用说教的方式，有意无意地体现出一种道德优越感，仿佛在告诉顾客：我做的事情这么伟大，你不买我的东西好意思吗？与之异曲同工的一些社会企业一味地

打“悲情”牌，用受助者可怜的形象和凄惨的境遇博取同情和关注。殊不知，同情心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多的面对苦难，爱心也会变得日渐麻木和枯竭，最终只会使社会企业堕入一场展示“谁比谁更惨”的竞赛。与此相对比的是，另一些社会企业在进行营销时，不希望太突出自己的“社会性”，很少提及自己在社会变革理念上的追求，误以为只有这样才叫商业化运作，才能避免让人觉得自己的产品服务因为缺少利润动机而可能品质较差或者不够专业。

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都反映出了社会企业和社会理想与品牌营销上的严重脱节。一家名为 Working Today 的社会企业所发生的转变或许可以给这些困惑于“知”的社会企业带来一些深刻启示。

Working Today 是美国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社会企业，成立于 1997 年，致力于帮助个体工作者获得优惠的医疗保险服务。当时美国的企业界开始盛行外包工作(outsourcing)，很多原本受雇于企业的员工被解雇后转为外包人员来承接公司委托的工作，他们有收入但是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等公司福利。这些人如果想要获得医疗保障，只能选择以个人身份去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昂贵的医疗保险。Working Today 的创始人萨拉霍罗维茨女士家中三代都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她自己也是一个外包工作者，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霍罗维茨女士意识到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外包工作和自由职业已经是大势所趋，于是想到成立 Working Today 这样一家机构，通过它来把千千万万个体工作者的医疗保障需求整合成团购，然后从保险公司那里争取到远比个人价优惠的价格。

看起来社会需求很迫切，解决方案也很有效，可是 Working Today 在成立后的近 7 年时间里，只有区区 2000 名顾客，年收入 120 万美元。这样的业绩和大型保险公司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在咨询了专业机构之后，Working Today 意识到自己在品牌营销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在 Working Today 创立之初，霍罗维茨女士由于担心自己的小机构太不起眼会不受人重视，也担心如果高调提出个体工作者的“医疗保障权”的主张会让人感觉太过极端，于是在机构的品牌营销上完全采用了和主流的商业保险公司一样的方式。无论是 Working Today 这个名字，还是它的广告语“怎样工作都受益(benefiting the way you work)”以及毫无特色的矢量图 Logo，都在试图体现出与传统的职场环境一样的精神气质。它的网站上那些身着职业套装、面目模糊的公司人使 Working Today 看起来和一般的商业公司毫无二致。而与那些动辄有数千万营销预算的竞争对手相比，Working Today 每年的营销预算不足 10 万美元，而且也没有自己的销售团队。

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Working Today 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品牌。它首先分析了市场的变化，意识到与以往外包工作不同，现在主动选择自由职业的人大大增加。这些人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认同“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持有左派色彩的意识形态，对大公司嗤之以鼻，对大型医疗保险公司向他们收取高额保费的行为深恶痛绝。这些人宁愿挣钱不

多也要享受自由生活;他们独立工作,但是又渴望在同类人群中建立社交关系。

理解了这些变化和 demand 之后, Working Today 意识到不该再将自己定位成是一个个人医疗保险的团购服务商,而应该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权益倡导者和社区推动者。基于这样的定位, Working Today 在 2003 年正式更名为 Freelancers Union(自由职业者联盟)——在美国工会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在机构名称中明确使用 Union 一词不啻于一种旗帜鲜明的反叛(这一次“老大哥”变成了大公司)。Logo 也得到重新设计,模仿了 20 世纪初期工会主义盛行时期的典型设计风格,用 3 只蜜蜂代表自由职业者,中间一个蜂巢代表所归属的社区。在品牌推广方式上, Freelancers Union 设计了一系列让人过目不忘的口号。这些口号的重点并不在于宣传推广自己的品牌和服务,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自由职业人群医疗保障问题的重视,并倡导参与集体医保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医保,还是房租”、“欢迎来到中产而贫困的世界”等口号提醒公众意识到自由职业人群在面临高额医保时的窘境;“你的首席医生不该是个网站”揭示了当时很多自由职业者由于买不起医疗保险,只能在一些网站上做自检的处境。这些深具政治讽刺意味的口号完全是工运积极分子的调调,与大型医保公司在宣传产品时的口吻形成鲜明对比。整场广告宣传攻势的花费仅为 8.5 万美元,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 Freelancers Union 的网站风格也面目一新,从一个卖保险的公司华丽转身为一场权利运动的引领者。首页上用鲜明的标识号召访问者“加入这场运动(Join The Movement)”,同时与品牌的新定位相一致的是,网站上还新增了许多专门为自由职业人群提供的服务,比如他们可以在网站上发布工作信息、建立讨论组、为他们提供消费优惠卡(这原本是那些在大公司里工作的人才能够享有的福利)以及其他便利这个人群组织起来伸张自己权利的服务。

在 2003 年转型后的仅 5 个月里, Freelancers Union 的会员数就增加了三倍。仅 2003 年一年,它的收入便从原来的 120 万美元增长到 760 万美元。如今, Freelancers Union 已有超过 10 万名顾客,年收入超过 7000 万美元,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个人健康保险提供商,也成为近 10 年来美国最知名的社会创新之一。

从 Freelancers Union 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家社会企业是如何“知道”自己的社会理想并与品牌整合的,也看到了它是如何基于自己新的品牌理想重新设计自己业务的。

与此情况类似,国内第一家在线慈善商店“善淘网”则经历先有业务转变,因而重新认知自己品牌理想、重新做品牌定位的过程。善淘网的 Logo 中那个显著的数字 42,代表的是英文的谐音“Four Two”。在成立之初,善淘网的业务模式是接受捐赠的二手物品(主要是几乎全新的闲置衣物),通过网上销售,获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支付企业运营的成本,其余部分则流向一些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这样既通过二手物品循环利用而实现节能减排,也能够为公益机构筹集资金。那时善淘网在诠释“42”

时强调无论是捐赠者还是购物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简单的行动就能实现“快乐自己，帮助他人”的社会效应。

但是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善淘网意识到这样的品牌理想和定位与自己的使命和业务并不完全贴切。事实上，善淘网在运营过程中雇佣了许多全职或兼职的残障伙伴，他们参与了衣物的分拣熨烫、拍照上传和宣传文案设计等工作。善淘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直接为一些残障者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帮助残障者融入社会并倡导残健融合的理念。为此，善淘网开始主动设计一些倡导类的活动，并将资金支持的重点放在了残障者权益领域。如此一来，慈善商店其实只是作为一种有助于残健融合的手段而存在，本身并不是善淘网的品牌理想，而原来针对捐赠者和购买者的基于对“物品”处置方式所带来的社会意义的“42”诠释就不再符合实际情况，也无法给善淘网的品牌营销带来支持。

现在，善淘网将自己的品牌理想明确表述为“每一个不同，都有价值”。这里的“不同”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观念思想等。在一个多元平等的社会里，正是这些“参差不齐”的不同构成了社会幸福的本源。对善淘网 Logo 中的“42(For Two)”的诠释也相应地改成了“善淘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些与我们一样的人，也为了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这些转变帮助善淘网实现了品牌理想和业务层面的知行合一，也使得善淘网的品牌理想能够打动更为广泛的人群，从而为善淘网在品牌传播效果上的大幅提升打下了基础。

行：社会企业的品牌传播

社会企业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清晰有力的社会理想，那么它便已经有了很好的品牌传播基础，也更容易赢得大众传媒的青睐。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理想的存在，社会企业有条件去广泛动员商业企业一般难以获得的社会资本来帮助自己进行品牌传播。社会资本是一种信任和合作关系。在社会企业领域，人们出于对一家社会企业社会理想的认可，因而愿意无偿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智力和财力等资源。社会企业也因此有条件将这些热情并愿意付出的利益相关者们——顾客、支持者、捐赠者、志愿者、社区居民……——动员起来，成为四处扩散自己品牌理想的“福音传播者 (evangelist)”。

在动员社会资本参与社会企业的品牌传播方面，Divine 巧克力可谓经典案例。Divine 巧克力是世界上第一家由小农生产者控股、以“公平贸易 (faire trade)”理念生产巧克力的社会企业。Divine 的前身是非洲国家加纳的一个农村合作社，由一群生产可可的农民组织起来。他们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力求产品质量上乘，在销售过程中强调透明公正以保障农民利益，另一方面重视妇女的赋权参与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保育。1997 年合作社会员通过了生产自有品牌巧克力的决议，并决定进军英国的大众消费市场，与主流巧克力产品正面竞争。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英国人偏爱巧克

力,但在面积不大的英国,当时已经有超过一百家的巧克力生产商争夺着这个价值40亿英镑的市场。

于是合作社与英国本土的大型非营利组织Twin Trading、Christian Aid、Comic Relief以及著名的社会责任公司the Body Shop合作,联合发起成立了Divine巧克力公司。这几家合作机构的选择绝不是随意而为,其中Twin Trading长期支持公平贸易,Christian Aid仅在英国就有超过10万名支持者,Comic Relief在年轻人中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而the Body Shop则一直以坚持环保理念而著称。

1998年圣诞节,Divine巧克力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正式登陆英国,开始在超市发售。在此之前,Christian Aid动员了它的10万名支持者参与推广这个新品牌。这些支持者们举着“我们只要Divine(Stock the Cho)”的标语牌来到自家附近的Sainsbury超市(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要求店家进货。一夜之间,Sainsbury的全部350家店面都开始销售Divine巧克力,也使Divine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全国范围内销售的公平贸易巧克力。

Divine巧克力也没有令自己的支持者失望。它不断了解顾客口味,开发生产独特的产品,在销售的同时还配合一系列的教材和活动,向公众普及公平贸易理念。由于加纳的合作社占股33%,组成合作社的4.5万名小农在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有充分的发言权从而能够充分保障自己的权益,也能够分得相应的企业利润。与此同时,这家社会企业已经与英国超过1.5万家商店和超市建立的供货关系。

社会资本参与品牌传播在带给社会企业巨大优势的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企业在进行品牌管理时必须对传统商业企业的做法做出根本性的变革,采用“参与式”的品牌管理方式。与一般商业性公司的“品牌垄断”不同,这些社会企业不仅没有去监视和限制未经授权的品牌传播,反而鼓励和便利各类利益相关者自行发起各种各样的品牌传播活动。

同样是参与式,根据参与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在参与程度最低的推广中,社会企业的支持者们利用社会企业已经准备好的素材(故事、数据、图片、标语等),按照设计好的推广方式帮助社会企业进行品牌推广,比如上面Divine巧克力登陆英国时所出现的情形。

更深入一层的参与式则由社会企业提供模板、指南之类的工具,鼓励参与者按照这些工具自行设计传播的内容和方式。TOMS的参与式品牌推广便是这种类型中的典型。TOMS是一家生产轻便布鞋的社会企业,它的模式非常简单:买一捐一。只要消费者购买TOMS一双鞋,它就向有需要的贫困地区捐赠一双鞋。截止到2012年,TOMS已经累计销售了200万双鞋,也就意味着捐赠了同样数量的鞋。作为一家2006年才成立的公司,这样的业绩着实令人惊叹。然而在很多人将关注点聚焦在它的“买一捐一”模式上时,往往忽略了TOMS取得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让顾客参与传播。

TOMS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许多顾客上传的照片,拍的是自己穿着TOMS鞋的样子,还有人交流在

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鞋最合适这样的经验谈。在 YouTube 上也有很多顾客自拍了自己收到 TOMS 鞋包裹时的情景。这些照片和产品显然给 TOMS 带来了巨大的品牌推广作用。想象一下,有多少产品能让自己的顾客做出这样的举动?TOMS 的顾客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愿意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既是因为认可 TOMS 的品牌理想,当然也是因为对产品本身的喜爱。

不满足于这种“群众”自发活动,TOMS 在 2011 年又开发出了“捐赠派对指南(Guide to A Kick-off Party)”工具包,放在网上供免费下载,鼓励人们在举办各种派对时能够增加一个“公益性”环节,既传播捐赠的理念也进行实际的捐赠活动。有了这个指南,TOMS 的顾客和其他支持者们就有了新的传播利器,在让派对变得更酷更有“气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地传播了 TOMS 这个品牌 and 它所倡导的社会理想。

TOMS 的“半定制化”参与式传播鼓励人们参与传播的机制是为他们提供“便利”,而更深一层次的参与式传播方式则是将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方式都交给传播者自由决定。在这种方式中,鼓励人们参与传播的机制是通过参与创造的过程而增加人们参与传播的“意愿”。中国知名社会企业“多背一公斤”在 2011 年开发出了新产品“一公斤盒子”。它是一个包含有教具和指南的教学工具包,可以帮助偏远地区的教师很方便地组织各类互动式教学活动,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多背一公斤”并没有为盒子设计专门的传播计划,也没有提供标准模板去便利人们传播。产品的传播完全由用户自行完成。用户在借助盒子创作出了自己的“产品”后,自然乐于向他人分享,于是在传播自己的产品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盒子的传播。而当 TOMS 的顾客主动上传自己在不同场合穿 TOMS 鞋的照片时,他们所做的也正是这一类型的参与式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参与式传播方式无所谓优劣高下。社会企业需要综合考量自己的业务特点、所掌握的资源 and 成本-收益比等因素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知与行的良性循环

吉姆柯林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从优秀到卓越》及后来的“社会部门版”中曾提到过卓越企业在运营中都会产生“飞轮效应”——为了使静止的飞轮转动起来,起初得花很大气力,一圈一圈反复推却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一旦飞轮转速达到一个临界点,它就会在你无须再费更大的力气的情情况下保持飞速转动。在商业企业领域,推动飞轮前进的主要力量是财务上的成功和资本资源之间的连结;而在社会部门,产生“飞轮效应”的关键却在于组织的品牌声誉,也就是说以具体的成果和共通的情感为基础,潜在的支持者不只认同组织的使命,同时也相信组织有能力达成使命。

对社会企业而言,要想实现基于品牌声誉的飞轮效应,就必须做到品牌营销上的“知行合一”:明白无误地知道并阐明自己的社会理想,因而可以动员那些认可自己社会理想的社会资本,用“参与式”的品牌管理方式使各类支持者主动参与品牌及其社会理想的传播。这种传播本身又会有助于

社会企业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当社会企业能向更广大的人群证明自己实现社会理想的能力和实际成果时，便有了更多可以动员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品牌与社会理想的传播中。于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良性循环便开始了，社会企业的飞轮效应也因此而出现。

在创造这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中，社会企业所追求的社会效应和自身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得到了有效的整合，社会企业可以不必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取舍——而这正是优秀社会企业模式的标志之一。一旦实现这个良性循环，社会企业的品牌及其社会理想便可以成为能够为自己带来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核心资产，能够保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和规模扩张，因而有能力去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应。而如何实现品牌营销上的这种知与行的良性循环也就成了社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

地址：

<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718&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1>

[【返回目录】](#)

◎行业动态

2014 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行业协会发展须转型提质

在当前我国深化社会组织改革的大背景下，行业协会的发展何去何从？7月26日在京举行的2014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给出了答案：转型提质。

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近7万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800多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共参加国际组织403个，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有157家。有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14个社会组织的类别当中，我国行业协会和商会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指数和活跃度的指数都名列前茅。行业协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文斌指出，行业协会的改革和发展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要求是一致的，改革的实质是回归行业协会市场化性质，促进行业协会内部关键机制方式的市场化转变，要大力加强行业协会自身建设和转型发展，包括进一步推进品牌建设，品牌建设是协会向高水平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在协会改革和市场化发展中进一步推进品牌协会建设，结合行业特点，系统规划好主业，大力发展核心业务，以核心业务的品牌化实现协会服务能力和形象的品牌化；要进一步提高综合服务和自我发展能力，继续高质量的做好行业基础服务，在观念转变、战略规划、科技导向、标准制定、谋划建设、政策履行、国际合作方面发挥行业企业转型发展的服务和引领作用。

论坛上，专家和行业协会代表呼声较为强烈的仍然是加快行业协会立法进程，行业协会依法自主，要有法可依。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为加快立法提供了动力，因此协会商会法应尽快出台，促进行业协会转型提质。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表示，行业协会和政府脱钩势在必行，职能上去行政化，行业协会要破解发展瓶颈，提升自身服务质量，实现转型发展。他建议将行业协会立法工作列入国家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通过立法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明确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范围、事项、时限和要求，明确行业协会的运行机制。

协商民主是本次论坛提出的行业协会转型提质的又一方向。专家们指出，协商民主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要认真研究建立健全保障行业协会参与协商民主建设的体制机制，提高协商的能力与水平。建议在人大、政协增设行业协会代表名额，使行业协会参与协商民主制度化、机制化。

2014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16家行业协会共同主办。本届论坛以“新形势下行业协会的转型与发展”为主题。

来源：中国质量报

地址：http://epaper.cqn.com.cn/html/2014-07/30/content_213625.htm

[【返回目录】](#)

《现代慈善与社会治理——2013年度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报告》出版

由中国公益研究院编写的《现代慈善与社会治理——2013年度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报告》现已出版发行，欢迎同行购买阅读、交流指正。

内容简介

本书重现2013年中国公益行业内发生的标志性事件，梳理中国公益行业内影响全局的突破性进展，总结中国公益行业当前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并对中国慈善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有依据的判断。

2013年，中国公益行业在制度层面、参与层面和行业建设层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制度层面，《慈善事业法》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程序，陕西等地出台慈善相关地方规章。在参与层面，国内公益慈善组织数量实现大突破，全民的慈善捐赠热情被大型灾害激发。在行业建设层面，全国性行业枢纽组织逐步建立，政府与民间合力投入行业公信力建设。

2013年，中国公益领域最大进步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确立。政府回应社会需求，调整慈善宏观政策，社会力量迅速跟进，与政府改革形成基本默契。宏观政策与社会力量客观上正在开创一个善经济时代。

在善经济时代，现代慈善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愈发主动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为中国特色现代慈善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本结构。

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网

地址：<http://www.bnul.org/research/yjcg/2659.html>

[【返回目录】](#)

北京市认定新一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

记者从7月28日召开的北京市社会建设半年工作会议上获悉,北京正式认定新一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截止目前,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达到36家,已基本构建起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整体框架。

此次新认定的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共有9家,包括: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北京人民调解员协会、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北京市社会领域党建研究会、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据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本市认定了第一批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包括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2010年认定了市工商联、市志愿者联合会、市律师协会等12家单位;2012年认定了市对外友协、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协会等5家单位。到目前为止,前三批27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相应工作网络,共联系和管理各级各类社会组织2.6万多家,比认定之前增长了5倍多;与此同时,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发挥引领聚合作用、在日常服务管理上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了我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较好地发挥了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作用。

新一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认定后,将进一步扩大“分类”服务和联系范围,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独特优势。比如,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目前联系中关村高科技领域的协会商会64家,覆盖会员企业2万余家,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创业投资、技术交易等诸多领域;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已联系本市较大规模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协会200多家,在提高农民组织化、带领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具有优势。新认定的其他各单位,也都在各自领域具有相类似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些‘大个头’的联合性组织,在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背景下,联系和带动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开展工作、共同发展业务,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相关负责人这样解释。

据悉,区县、街道(乡镇)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建工作也同步进行。截至目前,区县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已有208家,街道级269家,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枢纽型”社会组织网络初步形成。

来源:人民网

地址: <http://bj.people.com.cn/n/2014/0728/c82840-21801334.html>

[【返回目录】](#)

深圳 1700 多家公益组织面临“断粮”危险

号称慈善之城的深圳，公益组织的生态并不乐观。据了解，目前深圳共有公益组织多达 1702 家，涵盖临时救助、大病救助等多个领域。

助人草根公益组织喊救助

深圳 1700 多家公益组织，不少因得不到基金会和政府持续支持，随时面临“断粮”危险

成立 5 年，共免费接听了 21998 个咨询电话，接待来访面询 1396 人次，成功避免了 30 起自杀、他杀危机事件。这就是关注市民情感护理问题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该中心先后获得 2013 年广东社会创新实验基地等多个奖项。然而，继 2012 年该中心曾一度资金告急之后，目前该中心再次面临“断粮”之困。

事实上，政府非常重视培育发展公益组织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从 2012 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拿出 2 亿元，作为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专项资金。但是，号称慈善之城的深圳，公益组织的生态并不乐观。据了解，目前深圳共有公益组织多达 1702 家，涵盖临时救助、大病救助、特殊人群关爱、助学助残、情感护理等多个领域。除部分组织可以通过政府、企业获得一定的资助，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转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公益组织在为了项目奔波的同时，还在为筹集经费而焦头烂额。

如何解决公益组织的集体资金困境？多名公益人士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加快职能转移的脚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并尽快推动落实，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腾”出一些空间。

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再“断粮”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马上又要‘断粮’了。”该中心主任徐景安告诉记者。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成立于 2008 年，是在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一家民办非企业性质非营利社会组织，重点关注深圳市民情感护理问题，开通热线解答市民的情感疑惑。

情感护理中心从 2009 年 4 月 28 日开通“市民情感热线”88851085（帮帮帮我一定帮我），从 1 条线增加到 3 条线，服务时间从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9 时到晚上 10 时，节假日不休息。2013 年起又增设了“长者关爱热线”88859185（帮帮帮我就要帮我）。

截至 7 月 20 日，情感护理中心共免费接听了 21998 个电话，接待来访面询 1396 人次，成功避免了 30 起自杀、他杀危机事件。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获得 2011 年深圳公益创新十佳项目、2012 年中国社会创新奖入围奖、2013 年广东社会创新实验基地。

然而，作为一家民间公益组织，经费一直是徐景安头疼的问题，2012 年该中心曾经一度“断粮”，

如今，中心筹集的资金又快要用光了。徐景安告诉记者，2009年市民政局拨付开办费24万元，2010年福彩公益金支持50万元、市民政局项目款43.2万元，此后中心先后向社会求助，获捐助360万元。中心每年支出约100万元，其中专职心理咨询师补贴与管理人员工资60万元，房租、办公经费等40万元。到今年底，情感中心又要面临“断粮”难题。

基金会、企业资助方向明确

深圳在改革浪潮中成长了一批优秀的企业，比如腾讯、万科、中航、华强集团等，他们壮大之后，为了回馈社会，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纷纷设立基金会，成为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遇到资金困境的公益组织，能否从他们那里获得资助呢？

以宣传公益理念、创新公益模式、培育公益文化、推动深圳关爱行动深入发展为宗旨的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是由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导的一家公募基金会。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郑英告诉记者，基金会目前主要是通过下设的四个分基金开展一些公益活动项目，比如深圳市首届公益金百万行活动。

“基金会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项目都会尝试一些，但是不会很多，等到资金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重点选择一些效果好的项目进行资助。”郑英说。她认为，基金会资助项目并不是什么项目都给钱，更多的时候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成立于1992年的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前身为老区建设基金会），是经省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其目标是资助优秀公益项目，为社会各界搭建公益平台。

该基金会秘书长李光明告诉记者，最近几年，随着慈展会的举行，除了原有的“深喀1+1”项目一直持续开展外，基金会的重点已经转为举办公益项目大赛，以公益创投的方式创新公益慈善项目竞赛模式，推动中国公益慈善项目标准和品质的提升。“我们作为一家功能性基金会，与资助型基金不一样，资金和资源有限，主要还是为公益组织搭建平台。”

在深圳成功转型为公募基金会的壹基金，一直被认为是公益界的“豪门”——不差钱。从成立到现在，壹基金也先后与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深圳市登山协会先后合作组织过多次公益活动，并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壹基金传播总监姚遥告诉记者，包括壹基金在内的绝大多数公募基金会、企业自己的私募基金会现在方向都很明确，在选择资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与基金会方向一致的项目，比如救灾项目，基金会方面会根据救灾项目的标准去评价筛选。其他非相关领域的相对都很难申请到，而情感护理的项目就应该找关注情感护理方面的基金会。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空间需扩大

“我们也去找一些企业寻求资助，不过目前社会对于情感护理总体的认知度不高，所以企业能

给的资金有限，比如一二十万元，而且不持续，它们没有持续资助的动力。”徐景安表示。他希望，政府能够将该中心纳入购买公共服务范畴，给予一定的订单，加上中心的社会筹款，就能继续运作下去了。

记者从深圳市民政局获悉，目前全市共有社会组织 7484 家，其中，公益组织多达 1702 家，包括临时救助、大病救助、特殊人群救助、助学助残、情感护理等多个领域。

它们为一些特殊人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和阳光，同时也弥补了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公共服务空白。然而，由于服务对象缺乏特定的政府主管部门，他们很难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只能自己去向社会筹款。

比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是国内首家民间反家暴社工援助中心，也是深圳市第一家家庭暴力及防护研究中心，社工以受暴者、施暴者或其家庭为服务对象，运用专业知识、方法、技巧，协助求助者走出困境，缓解问题，改善求助者以及家庭的现状，恢复家庭和谐。然而目前也只能靠机构的其他项目支撑运营。

记者了解到，从 2009 年开始，市民政局设立“深圳市福彩公益金种子基金”，对深圳一些比较优秀的公益组织项目进行资助，帮助他们快速发展。每个项目可获得 30 万—50 万元不等的资助，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金额。截至 2011 年底，共资助了五批几百个公益项目，然而，之后该种子基金中断。

多名公益组织从业人员向记者表示，深圳号称慈善之城，深圳人的确非常有爱心，公益组织数量也比其他地方多，要想做好公益项目，最好“傍大款”，得到一些企业、基金会的支持，否则生存发展常常面临无米之炊。

而纯民间、无背景的草根公益组织，既无法得到关注，又不能去公开筹款，从一出生就面临资金方面的掣肘，所以希望政府能够加快职能转移的脚步，推动并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力度，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腾”出一些空间。

记者了解到，从 2011 年底开始，深圳市就表示将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库，公布项目目录和预算，并对政府职能进行定期清理，然而至今仍没有结果。

29 日下午，记者致电市民政局局长凌冲，他表示，政府职能转移目录是市编办在负责制定，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库则是由市财政委具体在负责，目前这两项工作都在市政府审批之中。

记者手记

公益组织要壮大 唯有专业和透明

从 2012 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拿出 2 亿元，作为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专项资金。记者了解到，深圳市融雪盛平社工服务社的临终关怀项目已经连续三年申请到了这一专项资金资助。

该项目主管刘晓强告诉记者，只要是公益组织都可以去申请，不过中央专项资金的申请非常严格，而且主要偏向于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扶贫项目，广东相对比较少。同时，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公益组织的项目去申请，能够获批的寥寥无几。今年深圳只有三个项目通过审批获得资助，除了该项目继续获得50万元资助外，还有深圳书城的一个培训项目以及深圳市爱康之家大病关怀中心的一个项目，分别获得了30万、50万元的资助。

刘晓强认为，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央财政的资助以及社会的认可，专业非常重要，是社会组织生存的命脉。做公益现在慢慢的也要像做企业一样，只有你的项目做得专业，才能获得服务对象和政府的认可，才能申请到资助，继续做下去并发展壮大。

中国公益项目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每年都会有一批优秀的项目通过公益大赛脱颖而出，获得资助。李光明表示，现在深圳的公益组织数量很多，增长速度很快，每年都会新注册登记几百家，还不包括那些没有登记的。所以公益组织要想生存发展，首先要在前期对自己的服务项目做好设计。

同时，公益组织在后期要想筹集到资金壮大自己的发展，还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和制度方面的建设。一是加强理事会的建设，广泛吸纳诸如社区有名望企业家、专家、名人等加入理事会，提升理事会团队的影响力，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筹款能力。二是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只有社会组织自己公开透明了，你的公信力才能不断提高，获得更多的外界的信任，别人才愿意捐钱给你。现在很多基金会有钱，但是公益组织能够让他们放心资助很重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基金会和企业宁可自己组建团队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合适的公益项目。”李光明表示。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sz.southcn.com/s/2014-07/30/content_105480231.htm

[【返回目录】](#)

NGO 在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领域内的探索和实践

日前，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支持，芬芳文化书院主办的“转型背景下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变迁研讨会”在北京凤凰公社顺利召开。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NGO 及农民合作组织代表共计 40 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德教授、中国社科院的党国英教授、北京农研中心的张英洪教授、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的李津逵教授、深圳雅克兰德设计有限公司的吴文媛女士、芬芳文化书院的牛见春老师等 7 位专家围绕“转型背景下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变迁”的主题，从不同角度做了精彩的发言。

张鸣通过对百年乡村发展历史的回顾，分析了农村文化崩解的过程及成因，他认为农村的破败已无法避免，乡村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任务将异常艰巨，而农民进城将会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建议当下不如更多关注进城农民的组织建设、文化建设和人文关怀，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这个城市，而避免产生太多对城市有敌意的农民。

张孝德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而承载了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乡村在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将再度复兴。生态有机农业、乡村旅游业、乡村手工业、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乡村新能源产业、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总部经济、文化艺术产业将成为支撑乡村复兴的新型产业。

党国英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乡村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拨除了笼罩在文化讨论中经常容易产生的价值迷雾，即对文化优劣的判断与取舍，而从文化与人类交易行为的关系来理解其内涵。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共性，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亦有共同的趋势，具体到乡村文化，则其未来的发展当是朝向有利于保障个体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方向，核心问题就是乡村文化现代化。扩大私权，消除伪公共领域，改变公共领域的权力结构是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张英洪基于对乡村和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对改革以来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乡村价值（包括生态环境、农产品安全、家庭伦理、乡村居住方式、传统习俗、传统组织资源）的破坏及其根源进行了反思，并呼吁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应当重新认识和尊重乡村的价值，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尊严不受资本和公权力的侵犯，同时广泛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成果。

李津逵教授聚焦于村民自治的问题，他分析了影响其发展的三种力量：传统力量、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国家力量不断深入乡村体现的是控制，传统力量在村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团结村民的作用，而市场力量使村民获得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有助于推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村自治的现代转型，既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新型自治。

吴文媛女士以福建泉州惠安女文化传统保护规划的案例，展示了一位负责任的规划师在面对乡村面对传统时的反省、审慎与细致的态度及专业精神。吴女士的规划团队通过对文化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入考察，确立了以生态恢复、低密度及低扰动为特点的开发方式，来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可以选择保留传统服饰与生活方式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于当下许多乡村旅游将文化符号化、忽视对原住民生活及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做法，亦不同于当地政府所期待的建立惠安文化风情街之类的常规思路，吴女士的规划让政府看到未来三五年他们在生态环境、城市建设与市政设施方面需要做的工作。

牛见春基于多年来乡村田野调查中的观察及乡村工作经验，提炼了一个认识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内涵的框架，简言之，即伦理秩序、崇拜与信仰、审美与艺术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节庆习俗与生命礼仪是乡村文化的集中表现。透过此框架可以快速地对乡村文化有一整体及系统的把握。同时，牛见春对千百年来萦绕于中国人心中的桃花源梦想进行了审视，并结合对乡村文化在历史中的真实状况的分析，得出结论：一个和谐美好、远离强权、自我封闭的桃花源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因此唯有走出桃花源的梦想，直面传统价值瓦解、乡村文化衰败的现实，顺应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趋势，积极探寻文化转型之路，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为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开创出新的局面。牛见春认为：将原有乡村文化向合作社文化转移，促进伦理秩序逐步向契约关系演变，让新的价值观主张逐步融入民间崇拜活动之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贵州乡土文化社的李丽、贵州和仁乡村发展与治理研究所的万涛和吉家钦、香港社区伙伴四川办的 SALLY 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研究所的张浩良、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分享了他们在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领域内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乡土文化社：在传承中实现生计改善

贵州乡土文化社是一家致力于协助村庄自我发现和自主发展的 NGO。她们看到国家视角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常常屏蔽掉乡村的真实需求和真正价值，不仅没有给乡村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使乡村越来越低估自身的价值，丧失文化自信及自主发展的信心。而乡土文化社认为，那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村庄，尤其是许多少数民族村寨，如果能够充分发掘其乡土知识和价值，并融入村庄的生活与发展之中，再透过各种资源的整合、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城乡互动等策略的综合运用可以帮助村庄实现可持续的自主的发展，并逐步吸引部分年轻人返乡，使村庄重新焕发活力。以在白兴瑶寨开展的“少数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与生计改善”项目为例，李丽详细介绍了她们的具体行动策略。首先是乡土知识的发掘和利用，她们通过走访手艺人、建立艺人档案、举办手工艺品创意大赛、邀请公益设计师为妇女提供培训、恢复传统工艺如蓝靛印染等活动，使濒临灭绝的乡土手工艺获得新的市场价值。其次，她们重视村庄价值观的显化与选择。通过支持村民举办文化周活动，

搜集和整理传统刺绣纹样的故事，以订单生产为切入点协助村民建立订单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利用社区基金支持村庄公共事务，增强了村民对村庄文化的认同，提升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第三个方面是城乡互动，她们搭建了一些平等交流的平台，一方面给村寨提供自主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让城里人到村寨来做深度旅游，以增进城市人对乡村文化的理解。所有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增强村庄的自主性，使得村庄在面对各种变化、各种外部力量时，能够有自主选择的能力。最后李丽反思，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NGO 作为外部陪伴和支持机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开放的学习心态。

PCD：通过价值观的转化带动社区

香港社区伙伴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的分享，向与会者展现了一个有着鲜明价值主张的 NGO 如何探索通过价值观的转化带动社区对可持续生活的追求和行动的过程。社区伙伴对于主流发展及其导致的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她们认为主流发展模式背后有一整套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支撑，比如对消费和 GDP 的过度推崇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在这种文化与价值观主导下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她们认为有必要促进人们在价值观层面的思考，在实践中探索可持续生活的可能性，并由此带动社区及社会的改变。对于可持续生活，社区伙伴认为可以从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个维度来思考和实践。具体到实践，比如推动村民转向生态耕作，她们侧重于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让村民意识到农业与安全食品、与健康及环境的关系，然后为有兴趣尝试的村民提供技术支持与进一步的学习计划，协助生态农户建立合作机制，最后通过城乡互动帮助村民建立与城市消费者的联系，通过消费者的认可与购买使农户能够长期坚持。但是在工作中社区伙伴发现，真正选择生态耕作的只是一小部分农户，大部分村民似乎缺乏对幸福生活的想象，谈到未来，村民除了挣钱也似乎没有更多追求。于是，自 2011 年始，社区伙伴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携手在柏林湾探索从社区艺术和文化的视角切入乡村工作的路径。首先，她们强调用社区艺术的手法来滋养村民的心田，比如鼓励村民组建山歌队，希望由此带出村民对社区有关爱、对传统有坚守、对未来有期盼和承担的理想；然后她们通过节日文化的恢复来丰富村庄的精神生活，同时推动各类村民自组织的发育，迄今，柏林湾村民已自发成立 7 个组织，有文艺队，有合作社、有社区厨房等，社区生机重现；不仅如此，她们还为社区创造共同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重新发现乡村的资源价值，看到未来发展的愿景。这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故事，未来会怎样，仍需在回应乡村现实需求与应对各种内外部挑战中继续探索。在讨论中，有与会者指出社区伙伴作为外部机构有着过于强烈的价值主张，对社区是一种不小的压力，是否会制约了社区自主发展能力的生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任何外来机构进入社区都难免带有自身的价值追求与理念，而且也会带来一定的资源，因此如何构建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便成

为社区工作中的最大挑战。

贵州和仁：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到以生活为中心的建设

贵州和仁乡村治理与发展研究所分享了他们的一个项目点——贵州遵义狮山村发生的故事。和仁在当地的工作是从支持返乡农民集体创业入手，逐步涉及村庄的公共事务和文化建设。不同于一般 NGO 在讲述时往往侧重于介绍机构做了什么，或强调机构的使命和价值观，万涛的讲述更象是一个观察者在客观地描述一个乡村发生的变化。狮山村是一个汉族村寨，位于遵义和绥阳之间，有 6700 多人。08 年之前，村里将近一半的青壮年都在外打工，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村民返乡，如何创业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当时和仁在村里组织了很多培训和讨论，村民在一起商量后就决定成立生产小组，但由于技术和气候的原因没能坚持下来。之后村民受到永济和南塘农民合作社的启发，决定成立合作社，联合周边几个村庄共同发展养鹅产业，并投资建立了孵化场。第一年效益不错，合作社有了经济基础，在村里办了不少活动，如春节期间组织运动会、联欢会，支持妇女成立文艺队，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到珠三角探访在外打工的工友等。但第二年因为贵阳遭遇大面积零冻，青饲料短缺，社员担心亏损提前将蛋鹅以肉鹅出售了，以致后来合作社收不上鹅蛋导致严重亏损，村民合作的信心大受打击，村庄的活动也没法开展。在和仁的协助下，村民调整了思路，有的村庄开始搞农资合作，慢慢有所起色。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外部资本也在村里开展了不同的创业项目，同样遇到很多问题。一系列的创业失败和挫折，促使和仁与村民开始反思单纯做产业是不是有问题，以前虽然也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但关注点还是经济，能否调整一下秩序，从村庄生活的角度出发？除了经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都是与村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需要村民的合作。于是在反复的讨论中，就有了村民之家的构想。从和仁牵头做，到村民逐渐参与进来共同建设，村民之家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和公共的平台，吸引了不同年龄阶层的村民：妇女来跳舞，孩子来玩耍，年轻人来打台球，老人来聊天喝茶看电视，人人都很开心，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热心的村民成立了志愿者小组，制定了议事机制，将村民之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充满生机。志愿者小组成立之后又逐步开始关注村庄公共事务，在后来的抗旱、协调征地的过程中，志愿者小组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村民合作起来开始介入村庄公共事务，则不可避免面对与政府的博弈。尤其自 2010 年机场高速路修成，狮山村已成为政府遵义空港新城规划中的一部分，由政府 and 资本联手推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不可避免，村庄该如何应对？

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到以生活为中心的建设，和仁开始思考，传统文化对社区有什么作用，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重建社区认同，如何克服外部机构与社区之间的价值冲突，如何以社区的价值规范为基础形成行动共识？

阜阳南塘：文化如何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发生作用

安徽阜南塘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分享了两个小故事，让我们生动地看到文化如何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发生作用。一个故事是萝卜白菜规则。当初合作社由维权转入乡建，成立了团队之后马上遇到内部治理的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开会没有规则，动不动跑题，观点不同则争执不休，习惯一人说了算不给别人发言机会。这样开会不仅没有效率，而且隐含着一种危机，合作社以反对村干部的专制和不民主为起点，然而最后自己内部的治理也复制了当初所反对的模式。为解决这个问题，在老同学袁天鹏的建议下，杨云标尝试将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入合作社。引入的方式颇具乡土特色，先通过演小品来展现合作社日常开会的场景，然后引导社员发现和讨论小品中暴露的问题，激发大家制定议事规则的需求，接着再请袁天鹏介绍罗伯特规则，最后村民根据罗伯特规则的精神制定了南塘版的“萝卜白菜规则”。杨云标认为这个规则的制定过程和后来在团队中的应用强化，逐渐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习惯，多了些民主协商，少了些独断。但仅仅是有些改变，却不可期待马上有根本的改变，因为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上千年形成的文化习惯根深蒂固。

杨云标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合作社给团队中去世的老人开追悼会的故事。首先合作社会征求家人的意见，如果家人同意，就会去了解老人的生平，并为他撰写悼词。然后在追悼会上会有社员集体对老人遗体的敬拜、遗体告别、念诵悼词等仪式。虽是一个简单的追悼活动，但展示的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值得缅怀。又因为这是每个家庭都会经历的重大时刻，这样的追悼会不仅赋予了丧礼仪式以庄重感，更使逝者家人和参与丧礼的村民深受触动。

这个小案例给与会者也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贵州乡土文化社的李丽认为“透过这个仪式让村庄价值观得到显化，而且在心灵抚慰的同时，给村民有一个正能量。”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的郭虹教授认为“这个简单的追悼活动通过对逝者的社会价值的认同，来印证我们的价值、儿女的价值、邻里的价值、社区的价值，通过这个仪式的过程，来实现文化重建”。确实，这样的活动在村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杨云标提到办完追悼会后，老人儿女都成为合作社坚强的支持者，而原来这些年轻人很反对父母参加合作社，现在他们不但主动入股合作社，甚至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加入合作社。

越贴近乡村生活的视角，其实我们发现文化不再是或复杂或模糊的概念、定义、理论，而是呈现在一个一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如春风化雨般滋养着每一个生命，形塑着村庄生活的秩序，为生活赋予意义。

最后在郭虹教授的协作下，与会人员围绕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的内涵、乡村文化的历史变迁及未来走向、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与社区营造、乡村发展、村民自治、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乡村文化变迁中利益各方的关系及互动模式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虽然

观点各异，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与会者对乡村文化变迁的方向逐渐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乡村应当走出封闭自守的桃花源梦想，从“公为基础，私为目标”转变为“私为基础，公为目标”，进入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一个有着开放透明的协作机制和鼓励创新的社会，并有良好的制度来促进美德的培育、保证个体权利的社会，具体转型的路径则有赖于学者、NGO、社区、企业、政府各方的协力。

基于本次研讨会的成果，芬芳文化书院将于今年10月份在永济蒲韩乡村举办为期一周的“变迁中的乡村文化与人文价值探索”研习营，面向从事乡村发展工作的NGO及农民合作组织，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在乡村发展实践中融入文化视角。敬请关注。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4301

[【返回目录】](#)

重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联席会首届会员大会召开

重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经过前三次的筹备会议，于7月27日上午十时在重庆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会议室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会议主题为常务协调组织选举与轮值制度建设。共18家会员单位，15家与会，3家因事请假；与会机构19家，其中4家为列席机构；与会人数22人。

会员单位的列席代表有：重庆渝州公益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伟、培训助理周尊洪，重庆市南岸区益友公益发展中心主任胡承亮，重庆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郭小建，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滕长波、项目主管魏蒙，重庆市大渡口区联心公益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晓露，重庆公众河流环保文化中心主任余剑锋，重庆市渝中区扶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那崇翰，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甘璐，重庆市扬华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刘君，重庆市万州区相宜爱心书社副社长朱宏璐，重庆市渝中区阳光520爱心志愿者协会宣传部的苏义、项目部的殷红，重庆市渝中区益众社区发展中心项目主管蒋巧，重庆社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张世文、副主任杨勇彬，重庆山城志愿服务中心主任高建军，重庆市巫溪县大山义工协会秘书长田荣华。

而重庆永安自然灾害救援中心、重庆市大渡口区梅明社工服务中心和重庆市万州区薄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三家会员单位因事请假，未能与会。

列席机构的代表有：重庆市渝中区乐善公益发展中心主任李川，重庆市血友病康复协会会长彭

茂琳、北京市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重庆办公室负责人宋振华，新阳光义工主任付强。

会议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介于小部分组织为能参与前期的筹备会，一起重温了往届会议精神文字资料，并讨论通过了《重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联席会运行条例》、《重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联席会自律公约》，确定了联席会会员单位名单。

第二部分，联席会常务协调组织选举。秘书处四家常务协调组织职能为协调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协助召集人组织活动、联席会财务管理、制定联席会管理模式等。召集人职能则轮流负责当月联席会活动的召集和组织工作。参选组织要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有稳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有担当和责任心、愿意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选举方式为报名时书面申请、现场口头表述。选举规则为在自荐名单中各会员单位代表推选四家及以内的机构，前四名成为秘书处常务协调组织。

共有六家机构参与了常务自荐，分别编号为：渝州公益①、南岸益友公益②、渝中阳光 520③、万州青助会④、社区志愿⑤、仁爱社工⑥。

渝州公益从服务使命和发展历程都与联席会的功能定位相符，也有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经验，相信我们能够承担好联席会的协调和服务工作，同时也愿意为重庆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南岸益友公益的使命方向为行业发展和能力建设，也承接了重庆志愿服务组织公共空间 V 空间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在日常协调和会务硬件有一定的优势，希望能够在联席会承担更多的协调服务。

渝中阳光 520 拥有良好的办公场地，具有 1 万多名注册志愿者，服务体系相对完整和丰富，会员单位超过 200 家，为了更好地资源共享、一起发展，所以自荐参选常务协调组织。万州青助会主要是在库区儿童的助学支持服务，目前服务总部设在重庆主城，在万州和永川设立项目办公室，拥有 14 人的工作团队，有能力也有很好的心态来承担更多的服务工作。

社区志愿作为原志愿者总队的老服务志愿者，目前成立新机构主要关注的是环卫工人、烧伤病患和先心病儿童，还有良好的社会企业资源，也积极推动爱心企业参与社会服务，也乐意帮助新的民间机构成长和发展，立足社区，团结商会，希望未来能够更多为大家服务。

仁爱社工作为市属的专业社工机构，目前承担了多个社区发展和社区自治服务，并承担了部分社区人才和社工人才的培育服务，期望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推动社工服务和志愿服务的融合发展。

选举现场，15 家会员单位代表参与了不记名投票，由会员单位渝州公益周尊洪唱票，列席机构渝中乐善公益李川监票和北京参与行动宋振华写票。与会会员单位每家 4 票，总计 60 票，实际票数 58 票，2 票弃权。最终渝州公益以 15 票、仁爱社工以 15 票、南岸益友公益以 14 票、万州青助会以

9票成为了联席会首届常务协调组织，任期一年，服务时间从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

第三部分：十一家召集单位经过随机抽取1-12的编号，得出如下联席会轮值组织安排表：

编号	年月	召集单位	常务协调组织	联系方式
1	2014年8月	大渡口联心公益	渝州公益	联系人：周尊洪
2	9月	山城志愿		电话：13368023499、63626873
3	10月	扬华公益		邮箱：13368023499@163.com
4	11月	渝中扶苗社工	仁爱社工	联系人：郭小建
5	12月	巫溪大山义工		电话：18680798081
6	2015年1月	渝中益众社区		邮箱：cqguoxj@163.com
7	2月	渝中阳光520	万州青助会	联系人：滕长波
8	3月	永安救援/大渡口梅明 社工/万州薄荷社工		电话：18523420142
9	4月	社区志愿		邮箱：115075286@qq.com
10	5月	永安救援/大渡口梅明 社工/万州薄荷社工	南岸益友公益	联系人：胡承亮
11	6月	公众河流		电话：15902334468
12	7月	大渡口山城社工		邮箱：16609547@qq.com

第四部分，下次会议主题讨论与安排。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积极为联席会的发展建言献策，讨论热切，话题主要围绕联席会接下来的一系列事务上，包括完善常务协调组织的职责、联席会章程及运作模式、会员资源整合、会议级别、会议小板块时间的合理分配、会议话题的吸引力和参与度应在收集意见和讨论解决实际问题上、基本财务公示表、培训和专项支持不在常务会议中体现但可另行安排服务等。

根据话题的急迫程度，大家共同协商产生如下决议：8月的联席会会议由大渡口联心公益负责，主题主要是联席会的具体运行方式进行讨论，更多议题在会后我们通过邮件做需求调查来讨论确定。

联席会是基于促进本土民间公益组织透明、自律、发展、共享的自发性自组织，致力于通过能力建设、发展指导、资源整合、资源共享、行业自律等方式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旨在提供一个资源整合与分享、共同发声的平台，加强组织间的交流联系和凝聚力，促进行业自律、规范、发展，提高行业公信力，提升民间公益组织的整体战斗力。主要为会员单位提供培训学习、人才建设、发展咨询等能力建设；做宏观推动、战略指导、发展建议的协作发展；进行行业经验交流、联合发声、合作互补的资源整合；提供媒体、资助信息、人力资源、资料库的资源共享；进行行业标准建立、协调行业矛盾的行业自律；以及对会员权益的保护。

联席会秘书处
2014年7月

来源: NGOCN

地址: <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887>

[【返回目录】](#)

◎公益人

“背叛”商业之后，他们怎么活？

他们都曾将商业成功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因缘际会，他们相继“背叛”了商业，转身走进公益。运用之前在商业世界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试图给中国的公益行业带来新空气。

这是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张红岩，终于在北京后海的一家云南餐厅放松了下来。他在这里请同事和朋友们吃饭，犒劳连续多日在内蒙古、北京忙碌的团队。

作为公益咨询机构深德公益的创始人，张红岩在这一天带领团队在北京做公益咨询项目的前期访谈，上午，去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交流“慈善千人计划·老牛学院”项目。下午，到中国公益研究院交流儿童博物馆项目，为老牛基金会的项目咨询做准备。

这只是无数个忙碌日子中的一个。不过，相比5年前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做项目经理时，现在的张红岩对生活多了一些期待。2008年，他曾经有小半年的时间住在北京威斯汀酒店，几乎是那家酒店当年住店时间最长的客人。“那时候，每天清晨醒来，想到今天要早起去跟客户开会，虽然能挣不少钱，但始终感觉那是很无聊的事情。”张红岩说，“这两年来，每天早晨醒来都会对即将开始的一天充满期待，想到今天又要去与公益机构和公益领袖交流，顿时觉得生活很有盼头。”

有一次，胡广华参加一个公益助学活动，作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秘书长，他对活动发起者颇有微词。在助学金发放仪式上，看到受助学生拿着老师事先写好的稿子表态，说自己是离异家庭的孩子，拿到善款要如何如何努力，不乱买零食，不乱买衣服云云。胡广华有些看不下去。“做公益，不仅要尊重捐赠人，捐赠人是上帝。同时，要充分尊重被捐赠者，公益组织因他们的存在而价值彰显。”

作为中国商业教父柳传志早年的办公室主任，以及后来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胡广华具备约20年的商海搏击经验，这让他2011年3月从商业世界全身而退进入公益后，在管理基金会时，带上了浓郁的联想风格，以及柳传志个人的商业哲学。

现在，与张红岩的生活状态相似，胡广华觉得公益行业越来越有意思，他每天都在为探索公益新模式不停努力，制定基金会战略规划、用商业管理方法激活团队、加强基金会募款及项目执行能力。“现在，收入只有做商业时的五分之一，但是每天都跟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富有的公益人在一起，每天都很快快乐。”胡广华说。

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地发展了30多年、当代公益行业蜿蜒曲折地前行了30年后，多元价值、个体意识逐渐成为社会的潮流。一批像胡广华、张红岩一样的前商业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在生命的某个节点发现了自己的使命，随后“背叛”商业，一头扎进公益行业。彼得·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

心秘书长及总裁赵华、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春晖博爱”）首席执行官薛一心、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刘冰华等，莫不如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在商业世界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因缘际会，转身进入相对陌生的公益领域。

商海搏击

1990年底，青年胡广华辞去团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加入联想集团，成为柳传志的秘书。当他在20多年后进入公益行业时，联想集团的企业文化和柳传志的商业风格，在胡广华身上“潜伏”多年后开始发挥功效。

联想文化的核心是“求实进取，以人为本”，贯彻至每一个员工。胡广华记得很清楚，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前夕，一位投资人来北京考察联想，柳传志的司机将他从首都机场接到柳传志的办公室。投资人见到柳传志，第一句话就说，“我不用跟你了解什么了，这一路上，你的司机都在给我讲联想的战略目标、管理文化。我已经很熟悉了。”现在，胡广华正在借鉴“联想企业文化”，打造以“诚信、服务、合作、多赢”的基金会文化。

1995年，联想上市一年后，胡广华调任香港联想，负责进出口包装业务。从2000年到2011年，胡广华一直在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任职，担任总经理。

正是联想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那年，赵华从中央财经大学财务会计专业毕业了。那时，全球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进驻中国，普华永道和安永都给了赵华 offer。但按照当时的政策，非京籍高校毕业生一旦选择去外企工作，必须放弃北京户口。最后，赵华选择了可以解决户口的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技公司”）。

身在大型国企，赵华一年上一个台阶，第一年获得了出国学习的机会，第二年入了党，第三年被提拔为科长，第四年分到了房子。2002年，是赵华在中技公司工作的第8个年头。彼时，她已经是掌管总公司及24家分公司的总公司财务部的三个财务科长之一，并兼任一家分公司的财务经理。国企的臃肿和低效，让赵华决意离开。

很快，赵华离开了中技公司，联合一位原摩托罗拉中华区市场总监及另外一名合伙人，联手成立了一家手机公司，做贴牌手机制造和销售业务。不到半年，公司从初创时期的8个人扩张到80余人。赵华在市场化商业环境中找到了刺激和挑战，那是她之前一直渴望的生活状态。期间，赵华还在北大国际MBA读书。然而，一年后，由于在商业伦理上与其他两位合伙人有分歧，正当公司蒸蒸日上之际，赵华果断选择了离开。

很快SARS来了，赵华在家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妈妈。2004年，赵华又与一位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代理销售苹果公司的产品，做得很轻松。没多久，合伙人突然提出要去全职妈妈了，恰巧有读MBA时认识的朋友邀请赵华加入非营利组织“青年成就组织”（Junior Achievement，简

称“JA”)。于是,两人关闭了公司。令赵华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她最后一次在商业机构任职。

1998年,前百事(台湾)食品总经理、百事饮料大中华区特许经营高级总监薛一心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商学院毕业,进入美国宝洁公司工作。攻读MBA前,南加州大学毕业的薛一心在台湾有过几年的银行、房地产、广告公司工作经历。

2004年,宝洁公司将薛一心调到上海。一年后,薛一心加盟百事公司。2007年,薛一心被百事公司调到台湾担任百事(台湾)食品总经理。2011年,百事和康师傅结盟,薛一心又被调到上海负责百事饮料,担任百事饮料大中华区特许经营高级总监。继续做下去,在很多人看来,40岁出头的薛一心有望成为百事大中华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在薛一心从美国宝洁公司调到上海那一年,张红岩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进入美国一家公司任职。2005年底,张红岩进入BCG。当时,他同时面试了BCG和贝恩咨询公司(Bain),最后被BCG录取。事实上,张红岩更喜欢Bain,因其下面有一家名为“Bridge Span”的非营利咨询公司。当张红岩于2009年3月正式投身非营利机构咨询事业时,他才猛然想起3年半前自己的那个想法。“那时,我就对非营利机构的咨询充满了兴趣。冥冥之中,很多事情是注定的。”张红岩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与很多大学毕业之后即投身商业世界的公益人不同,刘冰华在传媒业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998年,刘冰华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做广播记者。

此后,刘冰华进入新浪集团工作,任公共关系总监。她一共为新浪服务了6年,主要负责提高品牌美誉度、推广产品、维护行业关系等工作。进新浪没多久,刘冰华认识了一位在新浪短暂工作的人,她叫周惟彦。好几年后,两人将再次成为同事。

转型之路

在新浪担任公关部负责人6年后,2006年3月,刘冰华加盟新浪原董事长姜丰年的创业团队,创建新传集团。两年后,公司宣布解散。2009年6月的一天,刘冰华接到了8年未联系的朋友周惟彦的电话。这个电话,改变了刘冰华之后的生命轨迹。

“我需要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财富,还是需要一段丰富的经历?”就在她举棋不定的时候,周惟彦约见了她,带她进入完全陌生的公益领域。

彼时,周惟彦担任壹基金执行主席。当刘冰华见到周惟彦时,壹基金正处于高速成长期,但也遭遇机构发展与人才供应失衡的窘境。当时壹基金紧缺面向公众进行公益倡导的公关总监。周惟彦想到了新浪时期的老同事刘冰华。刘冰华一想,这个职业恰好与自己“做有意义的事情”的理念相符,于是就答应了。

拿着只有商业机构三分之一的薪水,刘冰华走上了公益之路,担任壹基金公共关系和合作发展

高级总监。但是这个位子，刘冰华只坐了一年。

无巧不成书。张红岩在2009年3月正式离开BCG，从商业咨询转向公益咨询，也与壹基金紧密相关。

2008年底，BCG合伙人皮特给项目经理们发了一封邮件，告知BCG需要给壹基金做一次几近免费战略规划，需要一名项目经理自行报名带领团队。邮件发出不到10秒，张红岩就回复报名。“壹基金当时刚开始崭露头角，我的很多理念与它接近。其次，李连杰是我很喜欢的功夫明星。”张红岩回忆了当时的心态。最后，皮特从报名的20多人中，按照报名先后顺序挑选了4名项目经理与周惟彦见面。

在北京兆龙饭店2楼，张红岩见到了周惟彦，二人相谈甚欢，周惟彦当场决定启用张红岩担纲壹基金战略规划工作。张红岩进驻壹基金，与壹基金一起工作了3个月。进驻壹基金的第二天，张红岩就到了壹基金在汶川的项目基地。在那里，张红岩探访了老人院、地球村、羌绣基地。刚开始，他觉得这些事情真切地惠及到了灾民，价值斐然。在3个月的项目期限内，张红岩与李连杰开过好几次会，一起去与克林顿基金会、星巴克等机构建立联系，期间受李连杰很多观点的启发。

3个月的咨询项目结束时，张红岩决定自己做一个公益咨询机构。李连杰很支持张红岩的想法，告诉他“没法给你钱，但可以给你一些项目做。”很快，张红岩离开BCG，组建了5人团队，专攻公益咨询。当年，他就经手了三四十个第三方评估项目，但每个项目的咨询费平均下来只有8000元。

现在，赵华与张红岩算是同行，都致力于提升公益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同的是，张红岩更注重大客户，赵华则坚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草根公益组织上。在正式进入公益咨询领域前，赵华在JA打牢了公益咨询的基础。2005年正式加入JA后，赵华在工作风格和生活态度上都有了诸多转变。当时，JA的六七名全职员工在一栋民居里办公。赵华主要负责给大学生做职业生涯规划 and 财务规划。她接手这项业务时，JA覆盖的项目学校只有9所，当她两年后离开时，已经有20多所学校成了JA的合作伙伴。

从商业机构转向公益机构的赵华，遭遇了种种困窘。由于经费有限，赵华不得不自学影片制作，有时候，忙碌了一整天做出了一部短片，由于办公室陈旧的电脑突然死机，一天的工作付之东流。赵华只好咬紧牙关重头再来。加入JA的第一个星期，赵华就操办了一场有100多名志愿者参加的活动。筹备期间，有一天，她在办公室打了一整天电话，联络志愿者和合作伙伴。下班前，总监过来告诉赵华以后打电话声音要小一些。赵华当时很不高兴，认为这都是工作需要。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创业期间在独立办公室办公的生活。

在JA工作期间，赵华尽量做到专业。出去给公益机构和企业培训，她习惯穿着套装，带着笔记本电脑做PPT演示。去吉百利、摩托罗拉等企业培训时，连以职业化著称的外企员工都对赵华的专

业性给予高度肯定。

“这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公益也可以成为一项很职业的工作。慢慢地，我发现我的成就感来自做公益培训，而非把一个企业做大后获得更多财富。”2007年，赵华感觉自己在JA遇上了发展瓶颈。此外，她也希望为中国本土非营利机构做一些事情。她决定离开JA，成为一名专职培训师。恰好那时，她在《TIME》中文版上看到德鲁克管理学院的招聘广告。于是，她给德鲁克管理学院发送了一份简历，不到一个小时就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过后，赵华成为一名专职讲师，讲授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

在商业机构做管理工作时，薛一心就在留意公益机构的管理状况。她当时有一种感觉，“公益机构效率很低，我未来投身公益时，我将把自己在商业机构中获得的管理方法运用到公益机构。”

今年3月31日，薛一心离开服务了9年的百事公司，加盟春晖博爱，担任首席执行官。“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有人生目的的，人生短短数十寒暑，如果不做一些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那就没有多大意义。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人为何要来世间这么一趟。”薛一心这样阐述她“背叛”商业的初衷。

从2013年11月开始，不断有猎头公司找到薛一心，向她提供包括几家外企中国区总裁、春晖博爱筹资主任等职位。经过与春晖博爱创始人博珍妮详谈，了解了博珍妮“让每一个孤儿都有一个像家人一样的成年人陪伴他成长”的愿景后，薛一心决定出任春晖博爱筹资主任。博珍妮在与薛一心交流的过程中，对薛一心20年的商业管理经验甚为欣赏，便邀请薛一心出任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现在，薛一心已经在春晖博爱任职了3个月，主要工作是为春晖博爱建立品牌，下一步，她打算逐渐使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春晖博爱，使更多的国人关注、资助中国的弱势儿童群体。

2010年左右，在神州数码深圳分公司工作10年后，胡广华发现自己遇到了职业瓶颈。在他看来，以自己将近50岁的年龄，大公司流程化的工作已经激发不起更多的激情，继续做下去可能会陷入混日子的状态。年少时多得社会助力，从商20年间不断回馈社会的生命历程迫使他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而活，我是否可以通过帮助别人成就自己，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他动了投身公益的念头。之前家乡发生的两件事坚定了他的信念。

2007年，由于亲人都外出打工，生病了无人照料，胡广华的二奶奶和么奶奶在近90岁高龄时相继自杀。这给胡广华带来很大震动，引发了他对农村空巢老人问题的关注。2010年，胡广华的老家发生了一起三兄妹同时溺亡的悲剧。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留下年迈的爷爷奶奶照看小孩，爷爷奶奶扔下孩子去打麻将，三个小孩就跑出去玩水，结果悲剧发生。“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胡广华说，“通过公益的方式来帮助更多人，忽然成了我的新方向。”

2011年3月，胡广华离开神州数码，告别生活了10年的深圳，北上北京寻找公益梦想。这是

一段夹杂着梦想、激情、困厄和迷茫的追梦旅程。

探索前行

对2011年的胡广华来说，公益完全是个陌生的领域。刚来北京的两年里，他一直未找到适合自己的公益节奏。直到2013年3月，在一位老领导的引荐下，胡广华进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担任秘书长。基金会在做儿童、养老、抗战老兵救助等项目，这与学历史出身的胡广华的兴趣甚为契合，他开始踏实下来。

进入基金会后，胡广华发现基金会带有浓郁的机关作风，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他要求基金会员工必须把公益当作职业来做，制定了“无私、服务、创造价值”的工作理念，强化竞争意识，引入人员考评机制，大胆启用有能力的新人。他告诫员工不能“自我麻痹，自我陶醉”。呼吁社会“不必对公益人进行道德绑架”。试图让员工们做到“职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有尊严、体面、快乐地从事公益事业”。

为了让自己短时间内在公益领域有所造诣，胡广华争取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他报名参加了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的国际慈善管理EMP班，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员之一。班里组织学员去台湾考察社区营造期间，他每天都坚持写观察笔记。他坚信自己的所学未来必将有用武之地，“公益不仅仅是扶危济困，它是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胡广华说。

在壹基金任职一个月后，刘冰华萌生退意。刚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想到孩子未来的开销，刘冰华“闪了一下”，但很快就坚定了信念要继续做下去。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又有好几次决定要离开壹基金，她觉得当时的公益行业“太不正常了”，“政策法律、管理体系、人才构架等都很不健全，什么都是乱的”。

刘冰华在加入壹基金前，曾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不一定轻松，但至少应该是“在帮助别人过程中获得精神愉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汶川地震一年后，中国公益行业迎来一个发展高潮。公益人都宛若打了鸡血，激情饱满。

刘冰华很快体会到了公益人的苦楚。2009年是多灾之年，云南盈江地震、台湾莫克拉台风相继发生，灾害一发生，刘冰华就要进入紧急状态，每周末都要处理紧急事务。媒体的误解，也让刘冰华时常充满无力感。李连杰的精神感召当时给了刘冰华莫大鼓励。有一次，壹基金在开一个内部会议时，很多人都哭了，李连杰看大家哭了，很尴尬，走出会议室，但很快回来，跟大家开玩笑，并用坚毅的眼神鼓励大家。

在壹基金的一年，刘冰华把之前近10年的商业经验运用到工作中，“目标为导向、强调产出和绩效，设定目标，在目标之下制定计划，最后进行评估。”那一年，刘冰华帮助壹基金明确了推广目标，给壹基金制定了新媒体传播策略，将中小企业资源引入壹基金。期间，她还运营过一个白血

病救助基金。

2010年6月，刘冰华离开壹基金，加盟新成立的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后改名为中国公益研究院，主要负责机构的运营管理、战略规划、业务拓展、合作发展、行政人事和公益传播。现在，身为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刘冰华将机构视为一个“知识型企业”来管理，“我们强调机构产出，强调个人价值在机构中的贡献。”也学会了“用建设性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从壹基金到中国公益研究院，刘冰华逐渐找到了职业幸福感。与之相似，2007年，从JA转向德鲁克管理学院，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公益培训后，赵华如鱼得水。赵华进入德鲁克管理学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合本土实际，给中国非营利机构研发培训课程。在接下来的8个月，她访谈了近20家公益机构，将访谈整理成案例，建立了“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2008年12月，赵华第一次将“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推向社会，收取每位参训人员500元的培训费。这一举措当时在业内引发大量讨论。

没多久，在一场活动中，时任光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的杜绍基，在了解赵华曾有两年多的JA项目培训经历后，感觉赵华对中国的非营利行业有较深入的认识，遂邀请她出任光华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华犹豫了一段时间，“当时认为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非营利行业培训师。做管理是很操心的，战略、项目、沟通、资源拓展，事无巨细。我在创业时体会过那份苦。”最后还是杜绍基坚定了她的信心，“你亲自管理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你日后更好地讲授非营利组织管理的课程。”

从2009年3月到2012年底，赵华担任光华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为基金会做创业教育和NGO能力建设两大业务。2012年，由于基金会业务模式调整，杜绍基希望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的社会企业，邀请赵华出任总裁。想到丈夫经常派驻外地，孩子在两年后要参加中考，赵华犹豫了两个月，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赵华开始了第三次白手起家的创业，不过，这一次是在公益领域。成立彼得·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重新组建团队、搭建业务、寻找合作伙伴。

刚开始困难重重。由于经费有限，赵华不得不在行政、人力方面请求光华慈善基金会施以援手。由于成熟的培训师紧缺，机构的培训师规模增长缓慢。由于主要面向中小非营利组织，培训费用仅收取同等商业培训的三分之一，因此如何在保持公益理想的同时保持团队的稳定性，也是赵华一直在思考的。现在，已经有超过5000名公益人参加过彼得·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的培训。“经过培训，我们的学员会重新反思机构使命、客户需求，以及重新定位自己，并制定新的战略规划和员工管理制度。我做这件事，就是希望中国的中小非营利机构感觉到，这个行业还有人在帮助他们，与他们一起成长。”赵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与赵华相比，同样做公益咨询的张红岩，业务模式更加多元和新潮。现在，深德公益旗下业务

包括独立评估、管理资源和公益创投。在投身公益行业5年后，张红岩终于找到了清晰的定位，搭建了完整的人才构架，在收入上也与在BCG工作时持平。然而，这一切来之不易。

2009年，深德公益主要做了三四十个灾后重建项目咨询、评估，每个项目的费用都只在1万元左右。那时，张红岩经常行走在偏远地区，深入项目点调研，近距离看到了公益机构在管理咨询方面的需求。2008年底，深德公益给羌绣项目做了年度战略规划，2009年，羌绣的销售额即从去年的几十万跃升至1000万。“给公益项目带来了实在的成效，我很享受这种满足感。”张红岩说。

之后，深德公益每年都跃上一个台阶：2010年，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合作，拓展了除第三方评估之外的新业务；2011年，接受北京市民政局的邀请，为政府机构做战略规划。2011年底到2012年10月，张红岩一直在为成立一只公益创投基金奔波，试图用创投基金的模式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构建中国公益发展新模式。期间遭遇合作伙伴质疑、资金筹集不顺等困境。就在张红岩决定缩小基金规模，由深德公益全权出资之际，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听说了这件事，于是介绍浙江新潮集团与张红岩合作，一只规模达5000万的公益创投基金顺势而生。2012年，美国卡特中心、瑞尔环保等大型基金会和企业相继成为深德公益的客户。2013年，通用电气等大型企业开始与深德公益合作，深德公益开始发力企业CSR业务。

期间，张红岩曾遭遇他人质疑、客户拖欠尾款、自己垫付员工工资、团队不稳定等困难。起步时，自己的收入与在BCG时下降了很多，也曾感到过很大的心理落差。虽然如此，但张红岩始终认为公益咨询是公益行业未来的硬需求。“当时手里已经有一些细碎的活了，天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给我带来真正快乐的行业。但是多久能达到我的目标，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张红岩说。

由于全职投入公益行业才3个月，公益行业对薛一心而言，更多地意味着激情、好奇，以及迫切希望运用自己所学给机构带来变革的决心，她暂时还未与困难相遇。到了春晖博爱，她改变了之前所持的公益机构的专业性都太弱的想法，她发现春晖博爱的员工都很专业，去年还被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援引为中国公益机构专业性的典范。这给薛一心带领春晖博爱更上层楼的目标带来不小的挑战。

薛一心对此持良好的心态，“我现在还算年轻，我可以挽起袖子，真正深入基层了解公益行业，从而为基金会带来价值，而非等到退休后做个堂而皇之的机构董事。”薛一心说。为此，她决定让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基金会的使命更加匹配，她正在抓紧时间学习儿童教育、儿童福利体系等领域的知识。7月5日，她将带领春晖博爱团队奔赴云南昆明，在昆明福利院推广、运营春晖博爱经过实践获得成功的儿童教育、抚育项目，同时培训新同事。“以前，我做的事情是让消费者每天更开心一点。现在，我做的事情能够直接使孤残儿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我的成就感和满足度都会更高

一些。”薛一心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公益理想

胡广华也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快乐了。现在，他的孩子在北京上私立学校，每年花费几十万元，他自己每年的租房花费也不菲。但胡广华能安心做公益。之前20年的商业打拼，让他实现了相对财务自由，加之他还持有联想控股原始股，未来联想控股一旦上市，他的养老无忧。“公益之于我的家庭、个人、孩子的价值，金钱无法衡量。”胡广华说。

眼下，胡广华正在运用商业思维改造基金会，试图将公益与商业有效地连接，让机构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此外，他还考虑将机构升级为与互联网高度结合的基金会，全面展开与腾讯、新浪、搜狐等平台的合作，在微信、微博上发力，同时在公益众筹、公益信托等公益新模式上进行尝试，用双赢的思维去改造传统的专项基金管理模式。

“未来，我会更加注重骨干队伍的建设，将每位员工的发展与基金会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我们在公益行业里发展，我们不要在职业尊严、收入等方面输给商业组织。在中国的公益行业里，我们要做有尊严、快乐、专业的公益。”胡广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赵华也为公益给她的家庭带来的价值感到欣慰。赵华的儿子曾经对赵华从事的职业大惑不解，因为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企业高管或企业家。赵华告诉儿子，“很多企业家想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但不知道怎么做，妈妈可以帮他们做到。此外，妈妈是讲管理的，我能帮助他们借助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法将企业做得更好。”慢慢地，赵华的儿子知晓了她的工作价值，并引以为傲，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金钱观。看着儿子健康、朴素地成长，赵华不免感叹公益给家庭带来的无形价值。

赵华也试图对机构进行改造，她现在正在建立员工提成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她强调，“这仅是一个衡量的维度，还要综合考虑社会价值等，我们还会继续做一些免费培训。我会坚定地在这个领域走下去，致力于提高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社会效益。”

在中国公益研究院，刘冰华显示出企业管理的直接与“强势”。她正在中国公益研究院内着手打造鲜明的机构文化。“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价值观，让员工成为这个机构的长期雇员，与机构一起成长。”刘冰华强调，“这个阶段，重点将‘奖惩分明’落地，知识分子需要将知识活化。”

很多时候，刘冰华都在享受“知识活化”带给她的愉悦。“把掌握的最新行业知识和发展模式分享给公众，对我而言，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价值实现方式。”刘冰华说。

虽然投身公益行业仅3个月，薛一心却对之信心满满，“我希望通过我和机构的努力，能够推动中国的儿童福利系统，使之更加完善。甚至有朝一日，别的国家来向我们取经。”

张红岩一直希望在中国公益领域做一个小而美的机构，而非为了生存做一些背离自己事业理想的事情。“如果那样，我会觉得没意思。我希望，我所打造的这个机构，能够给行业带来价值倍增

的意义，同时让机构的每个人都能有一份公平的待遇。”张红岩说，“我希望我们一直都是做着有意义的的事情，拿着体面的工资，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有一个场景让张红岩至今记忆犹新。2013 年 10 月的一天，正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时候，他上午去奔驰公司与客户开会，11 点半走出会场去见杨澜，和她讨论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下午与英国大使馆的人员去拜访友成基金会，与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探讨公益评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何其多元化，比单纯做商业时更有价值、更快乐。”张红岩感叹。

来源：中国慈善家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E3MzgyMA==&mid=200490968&idx=1&sn=33c3292131e3db9e09fc7ef809dbf43d&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刘小钢，公益行业尊称她“小钢姐”

企业家投身公益事业，这种在西方世界早已不是新闻的事情，在中国却愈演愈烈。当越来越多的、被人们称作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们陆续退居二线、转而积极投身慈善行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曾经只在国外企业家身上出现的转型正在以中国的特色演绎着。中国企业家们开始了从追求“物质财富”到追求“精神财富”的实践。

转型意味着取舍，意味着痛苦，也意味着重新学习。如何去回应公众因还未适应这种过程而产生的诸多质问，如何去管理纷繁复杂的慈善事业，成为了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小钢，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秘书长、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就是一位这种转型的亲历者，也是这个时代浪潮的见证者。

2014 年 7 月 16 日，“应对气候变化反思发展模式共建公民伦理”中欧对话会议暨中欧社会危机与转型论坛第四届大会（简称 2014 巴黎气候大会）中国新闻发布会（广州站）在广州白云希尔顿酒店举行。刘小钢出席致辞并演讲。

2012 年 5 月 29 日阿拉善 SEE 基金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绿中心，携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以及万科、万通、溢达集团等 21 家中国企业，在北京宣布启动“绿色中国 竞跑未来”（China Going Green）为主题的系列活动，6 月中旬奔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展大会（里约+20）”，将中国的民间视角和实践经验，与世界交流分享，共同推动全球绿色经济转型。

以下内容整理自里约归来后，刘小钢接受“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采访。

怀抱希望坚定前行——刘小钢和她的里约

曾经是一名企业家的刘小钢，选择在47岁“高龄”进入哈佛大学进修“非营利组织管理”，似乎早已规划好了自己的新事业。2012年第一次参加里约地球峰会这样的国际性环境大会，对于她而言，“学习”和“感受”的成分更大于对会议产出的“预期”。

里约峰会是刘小钢第一次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会议，虽然没有全程参与，但是还是学习了很多新的东西，开阔了眼界，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青年组织的一些边会，让刘小钢觉得他们有想法、做的活动有意义，让她看到了很多未来的希望。

世界共识难达成

对于地球峰会的结果和成效都饱受质疑和争议的舆论现象，刘小钢提到，在现在这个世界要想达成某个共识是非常难的。

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诉求，对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诉求能够被这种国际性的会议出台的文件所包含。这样一看，这份文件就很难能够高度的协调好所有的声音，也就不可能不受到争议和质疑了。

青年NGO组织应有全球视野和学习心态

现在很多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如何站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上去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要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不断地去充实自己，不断地去向一些优秀的NGO组织和NGO工作者学习。这两点非常重要。

刘小钢在里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青年组织的边会，看到很多英语流畅、逻辑思维能力强的青年学生坐在上面，分享中国一些优秀的NGO组织在环境议题中所做的项目的时候，她特别有感触。包括她和一些自己筹款来到里约会场的青年学生交流的时候，刘小钢感受到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在不断的努力参与到这个话题之中，在用切实的行动改变这个世界的的环境。

环保公益行业和经济发展的不匹配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环保公益行业 and 经济发展完全不匹配。比如美国每年对于环保公益行业的投入大概是60亿美元，但中国只有5000万人民币，美国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10万，但中国只有3000-4000左右，所以在数量上是严重不对等的。

在质量上来说，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还比较初级，研究的能力和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所以这个行

业在质量上还达不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也就是民间环保生态系统还不够健康。

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做的事情涉及的范围还没有那么广，没有达到“百花齐放”，不够多元。所以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阿拉善SEE做的事情不是赞助一两个NGO，我们希望要做的是推动整个环保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

从商场到职业NGO的心路历程

刘小钢说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问过她，为什么要从商场转行去做NGO，在他们看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但她不这样认为。刘小钢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渡，也是听从内心召唤的结果。

在刘小钢看来，生命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要不断去尝试新的东西。她已经在商业圈工作了20年，希望用她的经验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就转行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当刘小钢真正在NGO圈子工作之后，觉得特别的充实、快乐。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经历的影响

2003年的时候刘小钢开始决定转行做公益事业，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是很懂，她也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就决定去美国学习相关的专业。她攻读非营利机构管理的硕士学位，学习了很多公共管理的课程，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她现在的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一点比较深刻的体会是，通过学习这样的课程，使刘小钢对于政府、市场、社会和NGO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多的认识，让她更多的去理解这种可持续的关系。

NGO行业与年轻人发展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NGO领域毕竟还年轻，没有其他行业发展得那么完善，资源也比较贫乏，所以青年人在选择进入NGO就业的时候首先就应该认识到这个现实情况，参与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领域还没有发展得这么好，所以她预留给青年人发展的机会更加多，空间也更加大，但是会比较艰苦，青年人应该借助现有的空间去好好的自我学习。

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资本，因为他们年轻，有时间，有活力和创造力。首先他们需要对未来抱有希望，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慢慢的改变世界。然后就是要坚持，这也是目前的年轻人缺乏的一点，很多人都是一时的热情来做环保公益，不能够坚持不懈，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先放弃了，非常可惜。

目前的世界上没有哪个问题像环境问题这样复杂，涉及各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跟环境有关。所以真的需要青年人的力量。

刘小钢相信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满怀希望，然后就去勇敢的、坚持的去做吧！

来源：阿拉善SEE公益机构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zMDQzNw==&mid=201311188&idx=1&sn=61fff46f8028d18169ef0f323914576d&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国际观察

联合国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减灾需贯穿始终 救灾应依托本地 重建至少需十年

2014年7月23日至24日，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北亚和东南亚分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峰会是2016年世界人道主义峰会的预备会议，主要探讨人道主义救援系统如何有效回应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及挑战。壹基金作为中国唯一的民间组织代表受邀参会，并与联合国组织、国际机构、亚洲其他国家的专业机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共同分享和探讨了壹基金在支持民间机构、企业、公众如何参与救灾与减灾的工作经验。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多国的代表就救灾、减灾和重建工作达成了共识并提出建议。峰会总结认为：

救灾应依托本地

本地力量包括本地公益机构在内的力量是救援的主力，他们对灾难的响应比外来力量更加高效和精准，因此支持本地力量的成长至关重要；

壹基金从2011年就开始支持各省民间救灾网络的成长，形成全国范围的联合救灾网络。在刚刚过去的台风“威马逊”赈灾行动中，壹基金第一时间联合海南、广西的救援队及公益组织，依托壹基金备灾体系快速开展救援，并同时与7家机构组成7.18台风海南赈灾联络处，实施应对本次台风公益力量联合赈灾工作。

减灾可降低风险

减灾同样是救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前对儿童、学生等弱势群体提供减灾知识技能，帮助他们掌握判断灾害的能力，共同分析并制定出应对灾害风险的行动计划，可以在灾害来临之时大大降低风险；

壹基金从2013年6月启动儿童平安计划，在全国10个省46所学校推广减灾小课堂项目，为14992名儿童提供了减灾教育。在雅安灾后援建规划中，壹基金以防灾减灾为中心开展工作，包括建设抗震农房、避灾运动场、抗震减灾学校建设以及在雅安100所学校开展以减灾教育为中心的校园综合减灾项目等。

重建至少需十年

灾害管理的系统分4个阶段，从最初的紧急救援开始到恢复重建，再到社区发展及对未来的灾害预防。救助儿童会驻日本的CEO表示：“这几个环节往往持续10至15年不等”。亚洲发展银行代

表强调：“需要合理分配这四个阶段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在后三个阶段内。”

壹基金在历次大灾，尤其是雅安和岷县地震赈灾工作中遵循国际灾害管理的科学规律采取赈灾工作的规划和实施，例如在雅安，壹基金规划了五年的实施计划，从紧急救援、安置重建以及将未来发展同防灾减灾结合起来等方面开展救援及重建工作，以使处在龙门山地震带活跃期的当地人更好的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

尊严超越一切

此次峰会还特别邀请了一位菲律宾的海燕风灾居民代表分享观点，她说道：“灾害发生后，我们确实最需要水和食物，以及一个安全的住所。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受灾的人，家都没了，在那一刻更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是知道有人正在保护我们，关心我们，惦记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未来还抱有希望。”

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副秘书长 Ms Valerie Amos 女士表示：“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简言之就是恢复人的尊严。尊严应作为超越一切界限的主旨，成为我们各方准则和行动的主流。”

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在纽约和日内瓦设有总部，虽然距离中国很遥远，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令副秘书长 Valerie Amos 女士对壹基金在 2013 年雅安地震救援行动已有所了解。Amos 女士说道：“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会提到壹基金，你们做的工作非常棒！”

壹基金参会代表王凯向 Amos 女士更详细地介绍了推动当地力量成为当地灾害应对主体的灾害管理工作，如壹基金联合救灾、壹基金救援联盟、企业联合救灾平台的工作模式，以及人人来减灾、救灾温暖包、净水计划、避灾运动场、轻钢房等创新项目如何解决不同灾害风险下的需求和问题。

Amos 女士对于项目的创新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未来希望能介绍更多国际经验与壹基金交流合作。

来源：壹基金网

地址：<http://www.onefoundation.cn/html/06/n-2406.html>

[【返回目录】](#)

比特币捐赠在美国初现峥嵘

去年,当许多新兴网络货币的代表们和非营利组织“水计划”(Water Project)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不小的怀疑——“水计划”的创始人兼主席彼得·夏斯(Peter Chasse)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货币是如何运作的。

夏斯自诩为一名网络“极客”,于是他开始自行做起了研究。到今年一月份,“水计划”就在网络平台“货币基地”(Coinbase)上开设了一个账号,专门用来接收比特币,这种无需银行中转、完全基于因特网的虚拟货币。

至今,这家致力于在非洲偏远地区提供清洁水源的非营利组织,已经筹集了价值超过3万美元的比特币,这完全是一项全新的收入来源。据夏斯说,这些募集上来的比特币可以当即转换成美元,并且作为该组织的非现金捐赠收入,很像对于股票捐赠的处理方式。

“傻瓜都不会拒绝这种捐赠。”夏斯说。

比特币参与公益的潜力,这个话题在国际上一经抛出,就引起了持续不断地讨论,至今已有五年时间。支持者热切地指出它的优势,包括低交易成本甚至零交易成本,以及能使有些身处全球金融系统之外的人也能参与公益。

即使在一些比特币捐赠的真实例子开始出现后,许多公益组织还是对此小心翼翼,要么就仍然不知道怎么运作比特币捐赠。

“这将会改变游戏规则。”夏斯说,“比特币在非营利部门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非营利部门是会再一次落后其他行业10年,还是这一次成为先行者?”

阿兰·罗宾逊(Alan Robinson)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一家“食物银行”的首席财政官。他说,自从该组织今年2月份开始接受比特币捐赠后,他们至今已经收到了价值近1000美元的比特币。他们使用的交易平台也是“货币基地”,因为在这上面前100万美元的交易是不收费用的。之后,该平台会对每笔交易收取1%的服务费,但仍然少于对信用卡转账的收费。罗宾逊说,对于捐赠人来说,比特币成为了在现金、支票、借记卡和信用卡之外的又一种捐赠工具。

“我们将它视为潜在的捐赠增长点。”罗宾逊说,“尽管现在收到的并不多,但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通道打开,等到它变得更为大家接受后,我们便可以有条不紊了。”

一家名为女性专属基金会(Women's Annex Foundation)的机构,致力于在阿富汗帮助当地年轻女性普及网络知识。这家基金会在年初搭建了一个网络平台,让当地女性能够在上面开设博客并以此谋生,而平台为这些女性的支付方式就是比特币。据该基金会创始人费列什泰赫·福胡(Fereshteh Forough)表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女性开设银行账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在阿富汗,

PayPal 等电子账户也无法使用。而比特币交易却只需要在有网络的地方就能完成，无论使用者位于学校还是家里。

去年 11 月，“比特捐赠基金会” (BitGive Foundation) 在商品打折季举办了一次公益活动。这家基金会长期为非营利机构启动比特币募款活动，其创始人科尼·嘉里皮 (Connie Gallippi) 介绍，在活动一天内，即成功为超过 30 家公益组织筹得了 1000 余枚比特币，价值约为 100 万美元。

比特币捐赠的支持者认为，非营利组织面对比特币并没有惊慌。但对于许多潜在的使用者来说，比特币仍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一些人对于这种网络货币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因为这种一度在 2013 年底每枚价值曾达到 1200 美元的货币，在今年 4 月份跌至不到 400 美元一枚。目前，它的价值在 600 美元一枚左右徘徊。而更有甚者指出，比特币会被军火贩运商和其他罪犯用来洗钱。今年 3 月，知名比特币平台 Mt. Gox 也因丢失了价值数亿美元的比特币而倒闭关张。

面对这些，支持者们举出了其他新型科技产品的例子，认为这些新兴事物在起步的时候都不免步履蹒跚，甚至走上弯路，但是它们在未来却被证实是潜力不可估量的。

作为“货币基金”的一名投资人，联合广场投资公司 (Union Square Ventures) 的创始人弗莱德·威尔逊 (Fred Wilson) 乐观地说：“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公益领域，这里的捐赠人希望他们 100% 的捐赠都能用到项目实处。”

威尔逊认为，基于网络的募款已经开始缩小非营利机构的不必要开支。信用卡捐款的手续费仍旧是公益组织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比特币能够将这种费用降低至接近零。”威尔逊说。

7 月 14 日，威尔逊还在纽约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作用之一就是让参会的非营利部门从业者知道比特币如何运用。

“这当然需要时间。”威尔逊说，“比特币不会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就像互联网的兴起一样。非营利领域需要对此保持耐心和积极的投入。”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uojianli/6800.html>

[【返回目录】](#)

泰国创变者们怎么玩儿的？

社会创新如何变革亚洲？

如果将世界各大洲比作人体测算心率，最高值一定在亚洲！想体验很快、很“善变”、很年轻、很混乱、很丰富的生活，亚洲是最好的选择。经济学家不断争论着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关于亚洲 GDP 的推算：到 2050 年，将占据世界 GDP 的一半。除去日本、印度这样较大的经济体，传统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也在不断发力冲刺。对了，也请不要忘记拖后腿的“同班同学”，比如柬埔寨。需要正视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亚洲是贫富差距问题的重灾区。

如果你是一枚亚洲青年，恭喜你，你已深处世界中心，你踏上了快速运转的跑步机，开关已打开，观众已就座。你所处的大洲与你一样年轻，一样充满活力，不断尝试着各种新鲜事物，但是，它不一定知道自己将跑向何处。跑着跑着，有这样一部分青年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困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社会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聚集起来努力做一名“创变者”，“创变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磨刀霍霍向社会，其实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升创新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有社会创新的想法或行为都可以叫做社会创新，而当一部分人继续向前走了一步，通过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建立起需要盈利、但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那就是在做社会企业的事，有趣的是：一些人开始这么做时，其实并不知道社会企业的明确定义。

我们带来来自 9 个亚洲国家、地区的 17 个“创变者”的故事，3 条内容丰富的社会创新主题之旅，1 张中国社会创新地图，展示创新思维的可能性，以及结合政府力量和商业模式，青年究竟可以为社会带来哪些改变。

期待你的加入，因为这就是你的时代。

社会创新如何变革泰国？

泰国的社会创新活动是两三年前才开始启动的。由于彼时泰国的执政者有着深厚的英国教育背景，在参观了英国的社会创新办公室之后，泰国政府觉得完全可以学习英国的整套社会创新方案，再辅以参考韩国的社会创新经验，继而形成了泰国的整套社会创新体系。芯世界社会创新中心常务理事周茜介绍说：“泰国的社会创新和韩国、英国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实施方式和步骤不同。他们（政府）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但是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阶段，是社会创新的早期阶段”。

位于曼谷的 Change Fusion 是泰国最著名的社会创新支持和咨询机构，它帮助企业和个人制订战略、加快项目进程、培养领袖、改善企业文化、达成最终目标。Change Fusion 将他们在商业领域和企业培训的专业经验有机结合，为客户提供成熟的问题解决方案，创造不同。

UDDC/Urban Design and Develop Center (城市设计与发展中心)是一家政府支持的、重点用技术来驱动社区内生力的机构,它强调规划、设计与实施城市与社区复兴与发展的理念。该中心通过政府、私营机构与社区的合作机制开展项目,以促进经济富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UDDC 的项目成果来自伙伴的合作与支持,包括政府机构、地方机构(曼谷市政府)、私营机构和民间组织。

一方面是政府支持的、英国与韩国模式的、清晰成熟的社会企业,另一方面,泰国的草根中也蕴藏着蓬勃的社会创新力。流落在曼谷街头桥下的拾荒人,用一家零泰铢商店,解决了拾荒者的生存环境与经济问题。当很多外人纠结于这个社会企业是否盈利时,它想的只是如何提供最好的服务。

泰国的经济状况远不如中国,但很少有人抱怨环境。民间和政府可以良好互动,不会有无谓的紧张气氛和恶性循环。中国的社会创新还比不上泰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来源: Bottle Dream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4NzYyNw==&mid=202786347&idx=1&sn=abb10636513995095e65922474a189ab&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好时公司企业传播与社会责任国际部总监唐少瑰：企业做公益要考虑员工参与度

2014 年 6 月,唐少瑰来到了位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好时爱心商店”,将公司总裁 John P. Bilbrey 写给张静依同学的感谢信交给了她。

张静依是这家小商店的发起人。这个在北京出生的女孩 5 岁时搬去波士顿生活,美国的时代广场和好时巧克力世界旗舰店让她印象深刻,也让她成为了好时巧克力的小粉丝。

从美国回国后不久,静依的表姐被诊断为白血病,庆幸的是,静依的表姐找到了完美骨髓配型,重回正常生活。在表姐逐渐恢复的日子里,静依在医院看到了许多因为贫困而无法继续治疗的白血病孩子。

“表姐生病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开一家卖巧克力的爱心商店,用挣的钱帮助那些得病的小孩。”这位好时的小粉丝鼓起勇气给好时公司总裁 John P. Bilbrey 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我非常希望能够通过销售好时巧克力,为患白血病的孩子筹集资金。”

很快，就有好时公司的员工和张静依联系，在大家的同努力之下，小店顺利开张。“好时公司的愿景就是通过提供美味的零食，为人们带来一份欢笑、一段好时光，通过一点一滴的善举，为世界带来美好。凡是符合公司愿景的行为，我们都乐意支持。”唐少瑰说。

目前，爱心商店的运营团队已日益发展壮大，并利用周末到社区进行义卖。在老师、同学及邻里的支持下，小店取得了不俗的销售成绩。2014年1月8日，负责小店运营的同学们将销售的盈余5000元全部捐给了儿童医院的白血病患者。

《公益时报》：好时作为一家有着超过百年历史的企业，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

唐少瑰：1894年，弥尔顿·好时创立了好时公司，就抱着“做好的事，才能把事做好”的创业理念，这一理念也作为好时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被延续下来。

1909年，弥尔顿·好时将当时他的全部资产6000万美金捐献给了好时信托公司，并委托公司成立了好时学校。学校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是一所孤儿学校。好时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一切教育和食宿的费用。

委托成立学校的好时信托公司是好时公司最大的股东，这就说明，从公司创立伊始，好时就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日常经营中。可以说我们生产的每一颗巧克力和糖果都会帮到好时学校的孩子。

《公益时报》：好时学校是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唐少瑰：好时学校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是目前全美最大的私立学校。好时学校有很多个“学生之家”，每个“学生之家”住有8-12名学生，由好时公司的员工或者社区志愿者来做他们的临时父母。

弥尔顿·好时先生在他的遗嘱中明确把所有遗产捐给好时信托，而学校是这个信托公司的拥有者，持有好时公司最大的股权。好时公司的高层开玩笑说，其实好时公司掌握在一群孩子们的手中。好时学校在全美最富学校排名中名列第5，仅在耶鲁、哈佛等名校之后，这个1500多人的学校拥有资产超过90亿美元。

《公益时报》：2014年5月，好时发布了第三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除了阐释公司在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目标上的进展外还涵盖了哪些内容？公司发布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唐少瑰：除了总结好时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经达成的目标外，第三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还增加了全新的环境目标，公布了最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作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指导。

环保方面，公司以2013年为基线制定了新的2017年目标。包括将温室气体排放再减少10%、在另两家工厂实现零垃圾填埋目标、实现90%的回收利用率、将产生的废物再降低5%等等，都有具体的量化指标。

好时之前的 CSR 模型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市场环境、自然环境、工作场所以及社区。在这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公司公布了最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好时共享美好：卓越经营、改善生活、创造美好未来”。在新框架的帮助下，我们将评估现在正开展的项目并接触一些新的机会，可能会将一些项目优先开展。

《公益时报》：好时是否会根据所在国家或社区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 CSR 策略？

唐少瑰：好时在各国的 CSR 项目以儿童（尤其是弱势儿童）为主。主要形式是向他们提供教育、食品、医疗、健康生活等帮助。各个国家的儿童都有不同的切实需求与面临的困难，我们在各个地区会针对当地情况开展不同的项目。比如在中国，好时公司长期与一家非营利孤儿院“上海慈善之梦”合作，为兔唇儿童的手术和康复提供帮助；在墨西哥，好时公司与一家儿童烧伤中心合作，2013年捐助了400000美元。在这个中心里，当地儿童因烧伤而导致的死亡率从11%降低至1%。

《公益时报》：好时在选择公益合作伙伴或项目时，会有哪些标准？

唐少瑰：我们首先会考虑到项目的参与度，包括员工的参与程度。在加拿大，好时员工通过攀登多伦多标志性建筑 Canadian National Tower，为联合之路（United Way）募捐了超过12,000美元的善款。好时公司与联合之路的合作从1932年开始，它也是好时在全球最大的 NGO 伙伴。我们会通过联合之路来捐助赈灾款项。

此外，教育和儿童是好时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最为关注的领域，我们也会积极与致力于这两方面的 NGO 进行合作。好时与 Children's Miracle Network 合作近25年，这是一个遍及北美的非营利儿童医院联盟。每年，我们的员工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比如高尔夫球联赛、赛跑、摩托车赛等为此组织筹款。

《公益时报》：对于食品公司来说，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各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不同，好时采取的是全球统一管理标准么？还是参照各国的国标？

唐少瑰：我们严格遵守国际通行及各地的食品安全标准。简单的比如：农产品原料中出现荷尔蒙是绝不允许的，我们也会检查可可和其他原材料，严禁重金属、虫害及其他有害的元素存在其中。

好时对整体价值链的管理与维护，是从源头至终端确保食品安全高标准的基础。好时对于第三方生产合作商和供应商，有着同样的高要求，政府机构及公司内部审查不间断地进行抽查及评估，不断需求生产流程方面的进步。

同时，好时也特别关注原材料在生产中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比如可可粉的种植会引发当地雇佣童工及强迫劳动，这在西非尤为显著。因此，我们会用可持续的方法采购可可。早在2012年10月，我们便制定目标：在2020年前，所有使用的可可都来自经过可持续发展认证的可靠来源，并且在2013年年底，实现10%的可可来自得到认证供应来源。而这一目标则在2013年年底以18%

的认证比例超额完成了。

《公益时报》：你认为相比社会组织，企业有哪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优势？

唐少瑰：我认为社会组织往往专注于某一领域，深入发展公益项目；而企业则可以借助自己的业务专长与积累，充分发掘和调动企业资源，在广度和覆盖面上更占优势。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7/29/content_9399.htm?div=-1

[【返回目录】](#)

◎企业社会责任

全球社企孵化器研究报告

著名社企支持组织 The Aspen Institute 与 Village Capital 于 2013 年发布了一份社企孵化器调研报告，报告基于对全球 52 个社企孵化器的定量调研，分析了全球社企孵化器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困境。报告的结论与建议部分由新湖育微信编译如下：

为社会企业提供量身定制服务的孵化器和加速器（请参见译注 1）在持续增多。对于许多国家的社企来说，这些孵化器为他们进入一个更加宽阔的社企领域以及影响力投资社区提供了首要入口，在帮助他们跨越“先锋断层”（请参见译注 2）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研究聚焦于与孵化器成败相关的关键要素，指明了阻碍其成功的问题所在。以下是我们的核心调及相关建议：

与本地商业企业合作很重要

对许多从孵化器出来的社企来说，下一笔资金的来源很可能不会是影响力投资者，而是传统商业领域的投资主体：银行、天使投资者、推行战略 CSR 的企业——他们对孵化器的社会影响力目标倒是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对于社企成功发展最重要的角色是“本土的商业投资伙伴”，他们能够为社企提供资助，但不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影响力投资者。

两个案例：Nigeria 的 Wenvovation Hub 与 Google 非洲合作，为孵化器中所有社企提供 Google 产品，提升他们在团队协作与电子商务方面的表现；Nairobi 的 m:Lab 与 Nokia 和 Samsung 合作帮助社企开发适合当地贫困社企的移动端产品。在笔者的项目经验中，Village Capital 与 Pearson Affordable Learning Fund 合作，在印度投资、推动金字塔底部人群的教育服务。

筛选标准很重要

不难理解的是，选择了最好社企的孵化器最有可能获得最高的回报。诸多传统商业领域的孵化器研究都指出，筛选标准严格、入壳率低的孵化器旗下的创业公司成功率更高。许多孵化器因为深知创业公司失败率高，所以在选择创业公司时采取了“广撒网”的策略。我们的研究与上述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入壳率低的孵化器旗下社企具有更高的成功率。我们在报告中为孵化器提供了 2 个行动建议：1) 确保足够的社企招募量，保证孵化器不需要接受标准以下的机构；2) 专注于质量而非数量，设计严格的入壳筛选标准。

但目前也有团队在研究孵化器的“累积社会影响力 (cumulative impact)”。有部分孵化器采取了“大批孵化、轻度支持 (high-volume, light-touch)”的模式，他们认为降低筛选标准虽然会导致旗下社企较高的失败率，但因为投资对象数量上去了，孵化器累积的社会影响力也会更大。

慈善资金目前对于孵化器的生存仍旧很重要，但与社企的成功并不明显相关

四分之三的孵化器依赖慈善资金资助，54%的孵化器资金来源于资助。由此我们发现：1) 社企孵化器的商业模式目前还没有达到自负盈亏的程度，他们还需外部资助；2) 大部分孵化器利用慈善资金撬动更多资源，努力从自身经营活动中获取利润。我们认为，在不远的未来，慈善资金在支持社企孵化器方面仍会扮演关键的角色。与此同时，慈善资金捐赠者也可鼓励孵化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在不折衷社会使命的同时减少对资助的依赖。

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尝试在社企孵化器中找到投资机会，但却未果。

60%的影响力投资者说他们与社企孵化器有非正式的投资伙伴关系，但 47%的投资者都没能从孵化器中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这种不对称反映了孵化器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满足社企自身发展的同时，让其达到影响力投资对象的筛选标准。投资者在谈及不投资孵化器社企的原因时将“不符合我们的投资标准”列为首要的问题。就这点来说，孵化器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在入壳筛选环节中与影响力投资者合作，招募更具投资潜质的社企。

孵化器可能面临“搭便车”问题

虽然影响力投资者期待孵化器为其提供投资对象，但只有 20%的投资者为孵化器的运营提供资助。这种“袖手旁观”的姿态主要是由于影响力投资者不认为资助孵化器是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这种“搭便车”行为使得孵化器得去寻找其他资方以解决资金困境，长久来看会导致孵化器与投资者在社企选择与培育上的不一致。投资者、孵化器及其资助者需要探索一种合适的资助模式，既能搞定孵化项目运营资金、维系社会影响力，也能为所有主体带来合理的好处。

我们缺乏孵化器运营的系统数据——而许多孵化器甚至都没注意收集自身的数据

这个结论是来自于全球范围内一个 52 家孵化器的样本群，但我们需要关于孵化器运营成效的更多数据，才能评估孵化服务的质量以及筛选过程与筛选网络的重要性。虽然我们的样本量对于数据分析来说有点小，但在规模尚小的孵化器领域中已经足够有代表性。我们相信，拓展孵化器的数据库，将会促进对孵化器成功要素更加精细、多维度的分析。为了更好地评估孵化成效，我们需要关于入壳社企与未成功入壳的社企更多、更优质的数据。Village Capitaly 与 ANDE 目前正在与 Emory University 旗下的 Social Enterprise 及其他几个合作伙伴开发一个社企成效的数据库，这个项目将会探究这些问题：加入孵化器的社企与其他社企有何区别；孵化领域较广泛/全球性的孵化器项目与那些聚焦于某个领域/地区性孵化器项目在社会影响力上是否有可量化的差别；有哪些孵化器设计元素（入壳筛选、服务、资源网络）能提升孵化器影响力。

长期来看，这些数据库将能促成更多数据分析，帮助我们洞察哪种孵化服务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企产生何种影响。此外，大部分没有收集自身数据的孵化器都提到缺乏时间/资源。大多数孵化器自身也是初创机构，我们建议支持孵化器项目的资助者也能提供数据搜集/评估方面的支持。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我们为孵化器生态系统中的各主体都提供了相关行动建议：

对孵化器的建议

投资能够鼓励和提高壳内社企数据搜集能力的平台和系统

收集申请你孵化器的所有社企数据，以便设置控制组进行孵化成效的评估。可以在你的申请表格中嵌入简单的数据搜集流程。

搜集入壳社企在出壳后至少五年的数据，以便观测它们在中长期内的发展情况。孵化服务的成效可能需要若干年时间才能明显见效。

与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合作开发数据收集系统

增强你搜索备选社企的能力

借鉴其他领域，设计更加严格、多层次的筛选机制；并让影响力投资者、基金会、公益专家等其他主体参与到筛选过程中，使得入壳的机构有更大几率能够满足上游资助方的要求

与当地社区的各类型资方建立合作关系，不要忽视商业企业（相比影响力投资者，他们可能会给你旗下社企更多资助）

社企既需要投资也需要市场渠道。与国内外企业建立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关系

探索营利模式（诸如收取投资过户费或进行直接投资）

对影响力投资者的建议

与孵化器合作，积累投资对象资料，找寻可以与孵化器相互协作的项目

与符合投资准则以及业绩出色的孵化器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

投资孵化器——不管是你的时间还是资金，这将会让孵化器更好配合你的投资工作

对基金会的建议

在运营、绩效管理体系、成果发布等方面持续支持优秀孵化器的发展

资助孵化器时看重孵化器的质量而非数量

在投资者与孵化器之间构建强有力的资源网络以促进投资生态环境

为孵化器监测社企绩效提供支持

对学术机构的建议

为孵化器绩效评估开发方法与理论

开展关于孵化器构建成功因素的实证调研，包括对服务质量、筛选机制及资源网络有效性的研究

译者注：

1. 孵化器 VS 加速器：在传统商业领域中，孵化器（incubator）的服务对象是处于概念期、尚无客户与收入的创业者，而加速器（accelerator）则服务已有客户与收入的企业。但在影响力投资/社企领域，这种区分几乎没有意义，故该报告并行使用孵化器与加速器这两个概念。

2. 先锋断层（The Pioneer Gap）：2012年 Monitor-Deloitte 与 Acumen Fund 合作发布的一份影响力投资报告中提出这个概念，意指开拓创新市场的社企难以获得影响力投资者的资助。报告中指出，在300家自称为“影响力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中，仅不到10家能够在其每个投资对象上投资达到接近25万美元。而 Monitor-Deloitte 对非洲影响力投资的研究显示，84家投资机构中，只有6家投资过初创期的社企。而背后的原因，相当于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问题：一方面是缺乏足够的好创业公司，另一方面初创期企业也缺乏足够的支持。

内容来源：Bridging the "Pioneer Gap": The Role of Accelerators in Launching High-Impact Enterprises, Aspen Network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ANDE) and Village Capital, June 2013

来源：社会企业观察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biz=MzA4NDA0NDUwOQ==&mid=200373616&idx=1&sn=595414c9a358ff34f15ca0ebae8c3ed1&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落幕

2014年7月25日，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在北京圆满落幕。围绕“构建责任共识”的大主题，国内外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公益慈善事业的政府人员、企业代表、公益组织及媒体等多方聚在一起，向在2013-2014年度社会责任领域贡献突出的个人致敬，对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表现优秀的企业及责任案例进行表彰。

年会还在下午举行了两场分论坛，公益论坛重点就“公益基金会”领域的相关话题，在与会的多位公益基金会负责人及行业学者间展开了研讨交流；在医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分论坛上，发布了“2014中国医药行业CSR调研”的榜单，并发布了国内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

年度责任领袖

南方周末每年会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推举出年度“责任领袖”，以表彰那些“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有着自己的理念和坚持，乐于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同时也善于引导和带动其

他有志于此的人”。

本届年会的“责任领袖”有：山东省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会长王天仁，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卡特彼勒全球副总裁、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其华。

王天仁代表地方政府的企业社会责任监管力量，他推动山东省发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地方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势必引领各级地方政府的企业社会责任监管进一步标准化和细则化。

姜建清和陈其华所代表的行业看似迥异，但有其相通之处，银行代表着资本力量，其责任意识可以直接影响产业布局；而能源与工程行业既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发展基础，也是人类付出代价最多的一环，若其能以责任意识做出些小改变，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极大的进步。

公益与透明

在当天会议现场，主办方将“公益透明”作为本年度的“年度关注”话题，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和“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就这一话题进行了“站而论道”。

王振耀当场表示，把慈善公益信息发布在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不受公众关注的渠道，然后指责公众不会获取信息，是一种“土豪透明”，是“没有为捐款人提供有尊严的透明”；潘江雪则结合真爱梦想基金会自身经验，认为在披露公益组织运营状况时要进行“格式化披露”，对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都予以披露，不能“报喜不报忧”；刘文奎则认为，通过他人监督、民政部门监督及更重要的自我监督，强化制度的力量来遏制不透明；邓飞表示透明是对“免费午餐”项目的保护，发动捐助者对捐助项目进行自行管理，而他和公益团队更多只是提供召集协调服务，是使得“免费午餐”项目更进一步透明的根本。

公益基金会的高效和协作

在下午的高峰论坛上，南方周末重点就上学路上、微信“为盲胞读书”、ABC美好社会资讯社、宝马文化之旅、劲牌“阳光助学班”等多个公益组织或企业发起的公益案例进行了表彰。

同时，高峰论坛对公益基金会的运作进行了探讨。潘江雪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将商业化模式引入公益管理的“公益效率”案例，通过商业化管理模式和标准化的专业分工，使公益发端于感性，落实于专业化行动，建立可复制的公益模式，从而降低了公益成本、提高了公益效率、提升了公益项目的透明度。

其后，网信金融 CEO 盛佳则重点介绍了互联网众筹平台与公益基金会的合作可能：“如今，互联网捐助在互联网通过网络形式，在整个的公益行业当中所占的比例仍太小，这也说明有很多潜力可以挖。”

在论坛上，嘉宾们也与现场观众进行了充分的互动，在有 NGO 代表向腾讯企业社会责任部总监陈圆圆询问如何才能跟腾讯公益进行合作时，陈圆圆说“很多项目都是以想法出发，但我们更需要一个明确的计划和实施的步骤”，她表示正是因为很少收到有信服力的执行规划，才导致“几乎每周都能收到十多个合作邀请，但很少与之合作”。

而刘文奎则认为，未来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区别会越来越没有意义，他说：“基金会的终极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要有企业的方法来管理，企业的方法用得越好，这个基金会就会越好。”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qiyeCSR/6794.html>

[【返回目录】](#)

2014《中国企业公民排行标准》发布

7月25日，由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主办的“打造企业公民典范研讨会暨2014《中国企业公民排行标准》发布会”在京召开。企业公民委员会对外发布了《中国企业公民排行标准》，并宣布“2014中国企业公民十周年系列活动暨‘2014中国优秀企业公民排行榜’调查评价工作”正式启动。

打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奥斯卡”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排行榜”源于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05年联合发起的“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调查评价活动”，目前已成功举办九届。为了进一步提升评选的科学性、权威性，企业公民委员会于2013年底启动了评选标准修订工作，并形成了《中国企业公民评价标准3.0》，即《中国企业公民排行标准》；原有的“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调查评价活动”也升级为“中国优秀企业公民排行榜”，旨在通过科学、公正的评价机制，打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奥斯卡”。

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时代

会上，还发布了《201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从业者职业状况报告》。报告显示，目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普遍存在两大误区：“编报告”和“做公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管理治理依然漫长。与会专家纷纷表示，在目前阶段，许多企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价值，仅仅将其视为公关宣传和编写社会责任报告，其实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还大有可为。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刘萌女士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商业大环境正在发生改变，企业面临的生存风险与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规避系统化风险的主动策略。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专家指出，在全球化生产的大背景下，企业公民形象危机预防、预警刻不容缓。以“上海福喜集团事件”为例，企业形象危机与社会责任管理已经超出了单一企业的范畴，做好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象危机预警和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此外，来自中国铝业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专家也就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气候变化等相关议题作了精彩发言。

来源：新华网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07/28/c_126804336.htm

[【返回目录】](#)

国内首份《商学院责任教育现状评估》报告发布

2014年7月，国内领先的企业社会责任独立咨询机构商道纵横，联合环保部宣教中心《世界环境》杂志，发布了国内首份《商学院责任教育现状评估》报告，对20家知名商学院的MBA项目在开展责任领导力培养方面的现状进行披露，并对国内商学院如何在今后更好地推动责任教育提出了建议。该报告也是双方共同开展的“贝迩商学院责任领导力及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为推动商学院更加注重培养具有责任意识的未来领袖，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商道纵横责任教育团队在参考国内外已有评估指标基础上，设计开发了新的评估体系，包含组织愿景、师资与教研、学生培养和行动倡导4个维度，共11项具体指标。本次评估选取主流商学院排行榜中前20名，以商学院为单位对其所有MBA项目进行打分，信息来源于商学院及MBA项目网站、宣传册等公开渠道。

评估结果显示：尽管部分商学院在开展责任教育相关的教学、课程等方面表现较好，但商学院责任教育总体情况参差不齐。

20所商学院中有12家的使命、愿景中明确提出培养具备责任领导力的MBA学员，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使命）：培养兼具中国深度和全球广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

20家商学院中，9家设置了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的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18所商学院设置了责任教育相关课程，部分MBA项目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伦理课程设为必修课程，也有部分商学院将其作为选修课。

仅有4所商学院在招生要求中明确提及学生的责任意识要求，如：长江商学院MBA项目正在寻找那些有梦想、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有潜力、有意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万有青年”。

14所商学院就社会责任相关议题组织学生参加实践，16所商学院有社会责任相关的学生社团或学生活动。

20所商学院都至少获得了国际主流的高水平教学质量认证之一，包括AACSB、EQUIS和AMBA，但仅有5所商学院加入了联合国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PRME）。

本次调研评估发现，国内商学院负责任教育状况差异性较大。在评估的20所商学院里，有3所学校指标覆盖可达到80%，分别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7所商学院指标覆盖在60%以上（不足80%），其余10所则有比较大差异，有的只在某一两项指标有所作为。

对于未来如何更好地推动商学院开展责任教育，商道纵横认为：首先，未来商业领袖将对商业和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推动商学院责任教育意义重大。其次，商学院通过课程教学、学生实践、文化熏陶等多个方面影响未来管理者和商业领袖的观念和行为，从而让学员深入学习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方法，提升处理伦理问题或社会责任困境的能力。再次，责任教育需要学校、政府、商业领域及社会各界合力推动。企业可以从走入课堂分享责任实践、支持MBA社会责任案例大赛、设立实践基地等方式来助力商学院更好地开展责任教育；最后，目前责任教育领先的商学院应充分发挥引领和典范的作用，带动其他商学院责任教育整体水平提升。

商道纵横责任教育团队负责人陈颖女士表示：“本次评估虽然只挑选了20家商学院进行分析，信息来源也仅局限于商学院的公开渠道，但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学院开展负责任教育的现状。未来我们会不断完善评估体系，扩大评估范围、加强和商学院沟通，以便获取更全面深入的信息，提供更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从而帮助国内商学院了解责任教育的现状，识别存在的差距，明确提升和改进的方向。”

来源：商道纵横

地址：http://www.syntao.com/CSRNews/CSRNews_Show_CN.asp?ID=17152

[【返回目录】](#)

通用磨坊公司承诺采取行动改善气候变化

乐施会对其听取公众意见表示欢迎

作为对全球超过 23 万名乐施会“品牌背后”支持者联名签署的请愿信的回应，通用磨坊公司 (General Mills) 于 7 月 29 日做出公开承诺称：通用磨坊将采取行业领先措施减少供应链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就该公司做出的这一为应对气候变化、避免穷人因气候变化而挨饿的声明，乐施会表示欢迎。

通用磨坊公司作为世界十大食品和饮料公司，是保健麦圈、哈根达斯和绿巨人的制造商，它的承诺将使其成为第一家承诺采取长期和科学的措施、从运营和供应链的各环节减排的主要食品和饮料公司。这一举动回应了保持全球升温控制在 2°C 以内的目标。重要的是，这些目标包括明确承诺减少的是温室气体的其他间接排放，这一部分占公司价值链所产生的气候污染的 92%，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活动。

通用磨坊公司也签署了《气候宣言》，并加入了“创新气候与能源政策业务” (Business for Innovative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一个致力于使政策制定者通过有效的气候和能源立法的先锋联盟)。而家乐氏作为乐施会“品牌背后”倡导活动的另外一个目标企业，还在袖手旁观，仍未重视乐施会报告中强调的问题。

乐施会负责“品牌背后”活动的经理 Monique van Zijl 说：“今天，通用磨坊公司作为行业先锋，已经迈出了果断的一步，强调气候变化对食品体系现存和明确的威胁。在破坏其自身业务以及我们所有人食物的威胁日益严峻之时，通用磨坊公司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努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各国领导者和业界其他公司应该以此为榜样。

“如果没有不断涌现的公众行动，也不会有通用磨坊的宣言，公众受够了食品公司和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漠视。而这也进一步表明，消费者可以积极发声来改变公司的行为。”

乐施会欢迎通用磨坊采取气候行动的承诺，它们包括：

1. 界定和公开截至 2015 年 8 月的供应链温室气体减排的总体目标，包括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强调达成农业减排的目标。

2. 截至 2020 年，在高风险供应链上实现零森林净砍伐量。这扩大了其先前关于棕榈油和包装纤维供应链的承诺，使牛肉、大豆和甘蔗等可能造成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高风险供应链也被包含在内。

3. 公开其三个最大的棕榈油和甘蔗供应商。

4. 参加碳信息披露项目，包括其他间接排放数据的年度报告，并对森林信息请求作出回应。

5. 公开支持有效和高效的公众与工业联合政策，如鼓励同行加入消费品论坛的零森林净砍伐量承诺。

6. 加入“创新气候与能源政策业务”并签署《气候宣言》。

7. 定期回顾公司报表和政策，确保其与减缓目标、计划和适应行动相吻合。对气候政策方面的公司治理相关重要活动进行报道。

8. 评估供应商对所有重要高风险商品的标准，必要时采取措施解决相关问题。

公司的完整承诺如下：http://www.generalmills.com/ChannelG/Issues/climate_policy.aspx/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公司之一，通用磨坊公司对其供应商有强大的影响力，也帮助行业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乐施会的报告显示，十个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公司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如果把它们看做是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排名第25位的污染国家。该报告还包含了利比里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案例，那里的通用磨坊和家乐氏公司的棕榈油供应商被指责侵占土地、燃烧森林。根据这些新的承诺，乐施会希望企业与其供应商一起解决其在印度尼西亚和利比里亚的问题。

家乐氏作为通用磨坊的行业主要竞争对手，正在面临持续增多的公众要求其采取行动的压力。通用磨坊公司的举动表明，只要有决心，所有食品和饮品公司都能为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Monique van Zijl 说，“我们赞赏通用磨坊迈出这关键性的第一步，我们希望追踪它就其承诺采取的行动，现在是家乐氏对成百上千人呼吁气候行动做出回应的时候了。”

来源：乐施会

地址：http://www.oxfam.org.hk/sc/news_2500.aspx

[【返回目录】](#)

◎专题报道：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

徐永光：文化凝聚、慈善传统、信托管理是家族财富传承的三大密码

由《中国慈善家》杂志发起主办的首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于7月26-27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家族进化的命门与密码”。

在26日大会开幕的欢迎致辞中，《中国慈善家》杂志名誉社长徐永光以洛克菲勒家族传承六代为例，总结出：慈善的传承和家族财富的传承是一个家族传承的很重要的密码，家族的财富要代代相传，应该有三个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元素是家族文化的凝聚，这些家族有自己传承文化的密码。第二个元素是家族慈善的传统，他们一定会拿出一部分财富做慈善；第三个元素是家族信托管理。

在徐永光看来，这三个密码当中前面两个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必备条件。家族文化、家族慈善是必备的，而家族信托是一种方法，用家族信托的方法对于财富的传承会更加有效。

家族财富传承主要不是讨论怎么造就富二代，而是讨论怎么样培养创二代、创十代，善二代、善十代。他相信如果不和创新、创造联系在一起，不和善联系在一起，家族财富的永续传承是非常困难的。

发言中，徐永光提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6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201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国大陆富豪上榜人数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在美国之后。

两年以前，比尔·盖茨曾对他说，在中国让富人捐财产比在美国让富人捐财产更容易，因为美国的富人大部分是财富的继承人，他们有一个大家族，很难决定他们财富的安排，而中国的富人基本上是财富的第一代创造者，所以他们能够自己做出决定。

徐永光对此表示赞同，但他强调，中国的企业家先要当好企业家，再来当慈善家，不能揠苗助长，如果挣了不义之财做慈善，这不叫慈善，这叫伪善。今天中国的企业家能够给我们大家提供安全的食品，不污染环境，不制造矿难，不制造尘肺病，这就是最大的慈善。

此外，他还表示，中国的富人当然要做慈善，首先要学习怎么做慈善，做慈善要把钱花好真的不容易。现在有很多培训班，希望我们的一些富人也参加一些慈善的培训班，把1块钱能够花出2块钱的效果，否则乱花钱的话，1块钱可能只花出1分钱的效果，甚至是负数。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4/0730/4472.html>

[【返回目录】](#)

王振耀：中国的企业家能否创造类似联合国的慈善项目？

7月26日，在由《中国慈善家》杂志发起主办的“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上，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王振耀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主要讲了三点，“整个经世界进入了善经济时代”、“如何管理和安排财富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中国的财富家族和慈善家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以下为王振耀演讲实录的节选：

中国历史，特别是家族财富管理的历史，也许从今天起将要结束相当初级的财富处理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了善经济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家族财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我主要谈三点。

第一、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善经济时代。

现在，中国的GDP已经过了57万亿，人均GDP已经达到6800美元。

现在我们都骄傲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GDP过了57万亿，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到了6800美元。在人类历史上，2012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因为整个地球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当一个国家迈过人均GDP1万美元的时候，那就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这个转折很明显，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的话语体系、媒体，包括我们的情绪都在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共识，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

信息时代这样一些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生活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和人的沟通在发生变化。因此，整个社会发展方式，新的产业开始发生了，新的富豪创造财富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与过去争强好勇不一样，带着非常强的社会价值。这是一个善经济时代是地球人的共同努力。

第二，如何管理和安排财富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众所周知，过去中国财富安排处置的渠道不太通畅。现在，需要有大禹治水的智慧来安排这些财富。同时，对个人来说，财富传承也是相当紧迫的，如果个人不能很好的处理财富，如果陷入到原来的节奏，社会会有相当大的悲剧。我们看西方财富家族，当财富充分拥有之后，一些新的社会情况开始出现。美国社会确实有相当多的经验，一方面他们发动进步运动，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后，一方面是腐败一方面是污染。

但是，美国社会掀起了两场创造现代文明的运动，一是进步运动，政治家进行推进，进行了很

多改进，包括向中国学习科举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另一个是慈善家起来了，他们大量的建立大学、医院、公园、图书馆。现代的人类文明几乎有一大半是那个时代慈善家来创造的，他们不仅完成了财富向文明提升的转型，而且让自己的家族得以传承多代

第三，今天中国的财富家族和慈善家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思考财富传承、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思考是否能将财富的提升、文明的提升和家族的传承结合起来？当慈善和进步运动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然由美国慈善家和政治的推动提出了建立国联，大家知道那是联合国的前身，他们想到了很多大的设计。二战结束以后，洛克菲勒家族推动了联合国设置在纽约。我现在要问的是，中国慈善家，当我们的财富量充分涌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高的志向，将我们的家族传承与中国文明的提升与转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合起来。能不能学习洛克菲勒家族的精神，创造类联合国的项目？如果说联合国是 United Nations，我们能不能想一想，将来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类似的机构，他们在纽约，我们是不是在北京、上海，或者在西安。

我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慈善家的回答，历史在期待我们。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4/0730/4478.html>

[【返回目录】](#)

家族基金会与家族传承分论坛实录

由《中国慈善家》杂志发起主办的“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于7月26-27日在北京召开。26日下午举行的“家族基金会与家族传承”分论坛上，与会嘉宾针对主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文字整理如下。

徐永光：今天中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和易中天先生讨论关于天人的关系，接着今天下午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家族财富、家族慈善、家族传承这样一个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的天人关系。请金先生谈一谈。

金乐琦：两个方面：第一，家族企业中的女性更着眼于如何做好慈善；第二，你不需要变得巨富才能做慈善，尽管是一个小型的家族企业也仍然可以做慈善。

今天在场的很多观众都对慈善非常有兴趣，中国传统的观念就是，中国人是非常物化的，如果你到巴黎的话，大家可能都关心要买什么奢侈品。今天我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大家对慈善这个话题非

常感兴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慈善运行方式，包括信托，包括家族基金会等等。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之所以会有很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是因为他们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能够自己获得对自己财富的控制权，而不是想通过向政府纳税的方式把更多的钱留给政府处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

徐永光：下面请卢德之先生给我们做一些解释，一方面他宣布要捐 100 亿做家族基金会，另一方面他的基金会资产越来越小，注册的时候是 2 个亿，当时全国最大的，现在资金缩水到了 5000 万，这个很奇怪，怎么越做越小了？

卢德之：首先我对政府的相关政策表示理解，但是不赞成。所谓理解是中国要做的事太多，所谓不赞成是站在慈善界的角度，如果不改变现有的政策和法律，可以说我们的家族基金会是可以生，但是不能长。

别说 100 亿人民币，100 亿美金、1000 亿美金这个钱也只能站在基金会外进不去，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障碍，这个法律现在允许我们生，成立基金会很容易，但是这个基金会长大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障碍。在我看来，一个不尊重财富、不尊重财富创造者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未来 10—20 年依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市场，将产生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企业家，得需要有一批伟大的慈善家相伴而生。我们的后代，你叫富二代也好，叫官二代也好，不管你是什么代都必须变成善二代，如果你不善，财富是没法传承下去的。不管现在政策有多少障碍，我们都需要改变。

我认为共享是人类的目标，你不愿意共享就可能被共产，我想我们还是自愿的参与到共享的行列中间来。

徐永光：下面请高女士谈一谈三德的理念到底是企业的理念还是家族的理念？而三德精神对于您的家族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正面的效果？

高千媛：我解释一下三德基金会做些什么，三德基金会本身在新加坡和海外成立，我父亲的理念就是认为，只要有企业的存在，就有慈善的存在，所以他认为企业一边做，由我兄弟他们来管理，我就专注于做慈善。

从我 5 岁的时候就看到我奶奶在做慈善了，帮助孤儿院的小孩。我父亲做人、做事和教导小孩都是提倡三德，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三德的精神。我刚刚也仔细的说了我的兄弟，我父亲就是管家族事业，我就是做慈善，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精神融入在这里面呢？他很公平，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我们是互相的股东。他主张慈善要由家里开始，如果你不从家庭开始做慈善，对家庭成员没有善心的话你到外面做慈善可能都不太真实，最大的精神应该取决于这里。谢谢！

徐永光：曾先生经验很多，请曾宪章先生谈一谈。

曾宪章：目前国内每一天有 1.5 家的基金会成立，一年超过 500 家，我深切的期盼政府能够在

最短的时间把所有有关慈善公益所需要的财税配套，包括我们这几天所谈到的遗产税，为什么外国那么多基金会成立？因为50%要交遗产税。包括捐赠100亿、捐赠50亿为什么现在不捐？因为要先交税，包括各种基金会等等。政府财税配套完善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有数千亿、数万亿的钱流入到慈善基金里面去，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幸福、更健康，完全符合了刘东华先生谈到的正和岛的理想就是提升整个社会、整个企业界的正能量，让我们企业界不但在企业上挣钱，而且在公益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ElliottDonnelley：今年正值我们家族企业150年的纪念日，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研讨会，我们也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更好的了解，今天我们谈论家庭的遗产，家族的传承，家族财富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1871年芝加哥发生了一场大火把我曾祖父的企业毁于一旦，我的曾祖父在当时有较好的商业信誉，在发生大火之后，我的曾祖父来到了GP摩根，跟摩根大通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他自己介绍称自己，GP摩根听到我曾祖父的名字以后，他就迅速的将我曾祖父的名字与信誉联系起来，GP摩根认为给予我们无条件的贷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的家族企业，还可以帮助整个社区。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创新，我想今天所有在场的观众可能都用到过很多印刷机，你们用的很多印刷机可能都源自于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家庭从60年代开始做的就是，在家族企业当中不断的贯彻创新这样的理念，后来还帮助很多公司做了公司黄页，不仅帮助我们的社区，也通过公司的平台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成立了很多的慈善基金会，也在不断的跟别的基金会取得合作。

我们还有一个基金会专门致力于教育下一代，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富二代”。我们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致力于服务社会的理念。

徐永光：下面请雷永胜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般来讲一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怎么对我有利，牛根生把这么多财产捐出来，到底对他带来了什么好处？第二个问题，他建立的慈善信托基金很多人有兴趣，他是怎么建立的，是怎么运作的。

雷永胜：我只站在我的角度透视一下牛先生捐了这么多东西他到底得到了什么。

第一，牛先生对他自己人生有一个规划，在他50岁之前主要是学习、创业，得到更多的财富，通过度己来度人。50岁以后他想从善，把财富能够通过一个合法的方式回馈给社会。

第二，度人也好，度己也好，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是有一定的考虑的，慈善是一个事业，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和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他经常说一句话“一个人快乐的大小就看爱你的人数有多少”，通过慈善事业可能有很多人获得了资助，可能对他有了爱心，他可能获得了大的快乐。

对他的家族来说，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说叫比较安全的方式，一种制度化的形式、一种高尚的

形式把它传承下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第二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家族成员上下对于爱心、善心、感恩之心这种高尚的价值观得以形成，并且能够形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认为这样的家风是最好的家风。第三从家族来看，这样一种举动和行为，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包括他的形象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提升，能够使人们对他更加的尊重。

我们这个信托是由于蒙牛公司2004年在香港用红筹的方式上市，得以牛先生在境外有一定的持股，这个股份怎么处置？按照他的计划是要捐赠出去，他就可以考虑在境外的法律环境下寻找这样的路径，在律师的指点下，他作为委托人，把这部分股份捐出去，寻找一个国际上比较知名的信托机构作为受托方，之间有一个合作协议成立这么一个信托，共同再去寻找一个专业的理财机构打理这个资产，就是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这个理财机构如果打理的好，把风险降到最低，把收益提高到最大化这个理想模式，只要每年赚的钱大于我们用于公益慈善的数额，日积月累，我们做的善事越来越多，财富也会越来越大，理论上会永续的传下去，我们正在尝试。

徐永光：我几年以前在哈佛大学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说未来30年基金会将会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数量）。结果有一位美国的慈善界的朋友说，不对，30年以后会是中国第一。

家族基金会为什么重要？家族慈善为什么重要？因为家族慈善是最能够创新的。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做了那么多创新的事情？因为家族基金会的钱是自己的，不是向社会募捐来的，所以这些钱的投入可以做风险慈善，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进行创新，可以冒风险，所以家族基金会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慈善模式。

第二，家族基金会一定会做得最好，因为家族财富的传承在慈善的传承下面，这个家族的后代，世世代代会通过做慈善来继承家族的光荣和梦想。他们不能给先人丢脸。

第三，家族基金会基本不会有贪污腐败，因为从逻辑上讲，我自己捐了钱，再自己贪污回去是不合逻辑的，要贪污只能是贪污别人的钱，让别人的钱进入到自己的口袋。所以家族基金会一定是最廉洁的。

所以有财富的家族一方面把我们的财富做大，我们要通过建立慈善传统，使家族的精神，家族的价值发扬光大，同时使家族的财富代代相传。希望我们的财富家族能够做创二代、创十代，善二代、善十代，使我们的世界在大家的支持下变得更加美好。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4/0731/4489.html>

[【返回目录】](#)

华人七大家族荣获“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奖”

7月26-27日，在《中国慈善家》发起举办的“2014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上，来自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地区的数十个财富家族，为听众分享了各自家族的传承价值观、方法论，热烈而精彩，受到与会嘉宾及社会关注人士的热烈好评。一方面，这说明此次峰会办得精彩，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次峰会生逢其时。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族二代接班时代已经到来，他们急需传承的榜样，提供传承的智慧。

因此，顺应时代所需，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组委会特设“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奖”，以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果。哪些卓越的家族获得大奖？让我们一个个揭开神秘的面纱。

曹慰德【新加坡万邦集团主席】

颁奖词：

20年前，曹慰德从父亲曹文锦手中接过家族企业的权杖，掌舵万邦集团。一百年前，凭借黄浦江上的一条小木船，曹家开始起航。从上海起家，到香港中兴，再到新加坡雄起，因航运而成为百年大家族的曹氏家族，已成功传承四代。作为第四代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在二十年的时间内，曹慰德成功把家族财富扩大十多倍，目前高达数百亿元。曾经的香港四大船王之一，已升级为新加坡的商业帝国。纵横商海四十载，看惯沉浮兴衰，曹慰德更是形成一套独特的传承思想，“传承不是传承家族，也不是传承企业，而是传承人类文化精华的过程。”

第一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隆重授予曹慰德家族：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

余梁贵珍（马来西亚余仁生集团主席）

颁奖词：

1879年，24岁的余广离开广东佛山，远渡南洋，到马来西亚打拼。他的本钱，是随身带的一批中草药和世代积累的中药知识，寓意“仁泽众生”的“仁生”药店开张面世。一百多年来，余氏家族历经四代传承，家族事业涉及采矿、橡胶、银行、房地产。百年起伏，中药事业始终贯穿其中。135年后的今天，余氏家族的余仁生门店已超过300家，遍及东亚、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为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中药生产及零售商。巅峰时期，余氏家族是与陈嘉庚家族齐名的富豪家族；低谷时期，家业也曾一度分散，几乎陷入“富不过三代”的境况。然而，家族血脉中流淌的自强不息之精神并未让他们衰微不振，一代创业，二代兴盛家族品牌，三代守业，第四代接班人余义生兄弟和家人不但重整家业，更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从下南洋到走向世界，余氏家族以关怀为本，以品质为先，以仁泽社会为己任，厚德载物，如今，早已将“富过四代”的神话变成现实。

第一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隆重授予余梁贵珍家族：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

林德祥【新加坡佳通集团主席】**颁奖词：**

1930年代，福建的林德慎、林亚金兄弟初下南洋，一无所有，在新加坡创立基业；至二代接班人林德祥海外学成归来，扩大资产，家业中兴，经过整个家族近80年的艰辛拼搏，传承至今，林氏家族的佳通集团资产规模已超过60亿美元，集团业务遍及工业制造业、金融、投资、交通运输和房地产业等各个行业，其中佳通轮胎是全球最大的轮胎制造商之一。林德祥家族也曾遭难于动荡时局、重创于金融风暴，但磨难从未让他们停步，凭家族企业管理者的商业智慧与长远目光，屡次从沟壑中重新崛起。如今，包括林美金在内的林氏第三代接班人已进入家族企业，继续光大家族企业。

第一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隆重授予林德祥家族：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韩家寰【台湾大成集团董事局主席】****颁奖词：**

57年前，韩浩然在台湾以一家小小的榨油厂开始，一步步建构大成食品集团。在家族企业面临传承之时，韩家第二代韩家宇、韩家宸、韩家寰和韩家寅四兄弟并未分家，而是秉承父志，戮力同心，合力化守业为创业。二代接班已过二十载，韩家寰凝聚众兄弟心力，将大成食品布局到更为宽广的领域和地区，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在业界，韩家寰被称为“肯德基养鸡人”，凭借专注，他将家族企业打造成中国最大的鸡肉加工商；为了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到最低，他建立起从养殖场到消费者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韩家寰心中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把从父辈手中接过的公司做成最受尊敬的企业。

第一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隆重授予韩家寰家族：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茅忠群【方太集团董事长】****颁奖词：**

30年前，茅理翔握准改革脉搏，创立飞翔集团，并迅速成为世界点火枪市场之龙头。十年后，茅氏家族企业遭遇商业冲击，改革迫在眉睫。年仅25岁的茅家第二代茅忠群进入家族企业，肩负为家族企业寻找转型突破口的使命。作为家族财富的传承者，他与父亲共同带领茅氏家族走上二次创业之路。新的企业名称、新的员工、新的产品、新的厂址，茅忠群大刀阔斧，冲破重重阻力，在父亲开山铺路、“传帮带”的支持下，全力打造方太集团这一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企业。凭借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茅忠群将其融入方太企业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深厚的企业文化为支撑，使方太逐步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际化企业。他是民营企业“创二代”队伍中的一个标的。

第一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隆重授予茅忠群家族：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

谭孝曾【京剧表演艺术家】**颁奖词：**

200余年的京剧发展史，170余年的谭门传承。从第一代谭志道开始表演京剧，第二代谭鑫培迅速成为一代京剧宗师、“伶界大王”，谭派绵延兴盛，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一个家族，七代京剧艺术传承。谭派是京剧史上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枝叶最为繁茂的一个艺术流派，在世界戏剧史上罕有匹敌者。第六代谭派传人谭孝曾得祖父谭富英、父亲谭元寿的亲传，他嗓音高亢宏亮、韵味清醇、悠扬自如、扮相清秀、台风潇洒，且文武兼备，深具谭派神韵。在京剧势微之时，他仍坚守祖训，以匠人之心打磨京剧，为古老艺术寻找当代坐标。

第一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隆重授予谭孝曾：文化艺术世家传承榜样

章金莱【《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颁奖词：**

章金莱有着一个大名鼎鼎的艺名——六小龄童。他生于猴王世家，父亲六龄童被称为南派猴王，祖父被称为“赛活猴”，曾祖父被称为“活猴章”。六小龄童八岁承袭猴王世家衣钵，接过“金箍棒”，奋发练功，凭借其过人天分，通过刻苦磨练，在几代人积淀的家族文化熏染陶冶之下，猴王被六小龄童演绎得出神入化。1984年，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一经播出，章金莱扮演的“美猴王”石破天惊。数十年来，“孙悟空”的影视形象层出不穷，不可尽数，然时至今日，他所刻画的“美猴王”，仍是华人观众心目中无法超越的猴王形象。

第一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隆重授予章金莱：文化艺术世家传承榜样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4/0730/4481.html>

[【返回目录】](#)

◎公益布告栏

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邀您参评

安平奖申报地址：<http://2014.appku.org/>

这绝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会把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真正的生死与共：十面“霾”伏，我们要一起呼吸雾霾，水危机蔓延，我们只能一起“饮饮作痛”，食品安全告急，我们一起寝食难安……

这就注定，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坐视不管。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只要我们走到一起，去努力，去行动，去改变，一切便皆有可能！

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简称安平奖）由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北京北广传媒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旨在通过评选优秀公益传播作品，倡导并推动客观、公正、深入、有创意、有担当的公益报道与传播实践，致力于“成为公益新闻传播领域价值引领的风向标”。

我们想激励每一个人，从媒体到自媒体，从组织到个人，都去实践公益报道与公益行动，无论是恢宏叙事还是小而美视角，都以爱为笔、为镜头、为思想，去关照转型中的中国，关照我们内心所焦虑与热爱的这片土地。让公益安，使天下平！

一、【作品征集对象】

1、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所有记录和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发表在媒体和自媒体上的文字、图像、影像等新闻作品。

2、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有关公益事业的所有媒体和自媒体的创新的传播方式。

二、【作品提交方式】

申报者请登录安平官网进行作品提交。

<http://2014.appku.org>

参评作品以自荐为主，每个申报者（或创作团队）限报三篇（系列算一篇）。

三、【作品征集日期】

2014年7月15日至8月14日24时

四、【网友投票时间】

2014年7月15日至8月19日24时

五、【奖项设置】

本届公益传播奖共设十个申报奖项和一个评议奖项，分别是：

1、公益人物报道奖

以公益人物为报道重心的作品

2、深度调查报道奖

对公益事件、问题等进行深度挖掘或对其现象背后事实深入探求调查的报道

3、公共政策报道奖

针对公益领域公共政策的报道

4、特稿奖

以丰富的细节和完整的故事构成的公益报道，注重文本的可读性

5、评论奖

对公益新闻事件的评论作品

6、视觉传播奖

针对公益新闻、人物的影像传播作品

7、新媒体创新奖

通过创新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使公益内容得到有价值的传播

8、传播行动奖

针对各种公益行动中组织化或个人化综合应用各种媒介进行有效传播的作品

9、公益广告奖

各种形式的优秀公益广告

10、技术公益创新奖

NGO、社会企业以创新的方式推动公益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

11、年度安平人奖

评选周期内，最能代表安平所倡导的公益传播理念的媒体人

六、【奖项层级及奖励办法】

本届安平奖奖金总额为42万元。

除“年度安平人奖”外，其他所有奖项均分为三级，对入围作品按照得分次序排列，前三名分别获得“安平奖”、“致敬奖”和“新锐奖”，未获得以上三个奖项的两个入围作品均获得“入围奖”。

所有入围作品均获得荣誉证书及奖金。每类奖项奖金总额均为4万元，分配方式如下：安平奖1个20000元，致敬奖1个10000元，新锐奖1个6000元，入围奖2个各2000元。

“年度安平人奖”为评委会评议奖，奖金 20000 元。

以上奖金均为税前数额。

七、【评选规则】

安平奖的评选分为初选、二审和终审三个阶段进行。初选由网友通过投票产生前 10 名，但评委将针对突发性报道或专业性报道保留 2 个名额的调整权利，此阶段共产生 10 个进入二审的作品；二审由评委对 10 个作品打分，前五名均为入围作品，并评出获奖名次；终审由顾问与评委合议解决评选中的重大争议并提名评议“年度安平人奖”。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安平奖评选秘书处联系，联系人：

黄英男：18610757451

冯允：18301116238

来源：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

地址：<http://www.appku.org/>

[【返回目录】](#)

美国影响力投资高级哈佛大学访学团开始报名 截止 8/31

项目介绍：

在哈佛大学社会责任投资行动项目专家团队的大力支持，本次考察团由馨道天成有限责任公司（波士顿）联合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本次主题定为影响力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关注概念、趋势和应用战略等三方面的前沿洞见。

在 9 天的访学行程中，学员将

在哈佛大学参与独特定制的工作坊（6 大核心模块）

全面掌握影响力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的概念、国际趋势和应用战略

拜访世界最著名的大型金融机构和社会金融企业

由哈佛导师带领，拜访机构包括摩根士丹利、哈佛大学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Bloomberg 集团、波士顿联储银行、著名创新国际小额贷款机构等，深入学习他们对影响力投资的应用

深度提升自我交流和分享效能

融入由人生教练主导的禅意内观方式的团队建设和反思总结设计

哈佛导师亲自签署结业证书

重要时间提醒:

项目时间: 2014年11月1日-11月9日(9天)

截至报名时间: 2014年8月31日晚12点

名额限制: 20人

面向人群:

1. 金融机构、投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高管
2. 企业投资部门、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战略高管
3. 基金会领导人
4. 民营企业家、慈善家

项目咨询和联系:

崔馨月 小姐

电话: 18516013719

Email: xinyue@serc-china.org

张嘉伟 先生

电话: 13801998858

Email: jiawei@serc-china.org

地址: 上海市建国西路285号4楼 200031

来源: 社会企业观察网

地址: <http://www.serc-china.org/research/visit.html>

[【返回目录】](#)

2014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公众教育小额资助项目招标公告

2014年至2016年，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将以公众及政策倡导为核心，支持特殊需要儿童以及家庭等相关群体的发展与成长。项目将开展多元化的公众教育、机构与家长支持、政策研究与倡导等活动，改善公众长期存在对特殊需要儿童及其家庭的认知，营造包容与接纳的环境氛围，促进特殊需要儿童及其家庭享有有尊严、无障碍、有品质的社会生活。

现就2014年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之“公众教育小额资助项目”面向全国公益组织公开招标。招标项目如下：

一、项目概述

公众教育小额资助项目主要以资金支持形式，支持相关公益组织开展社会性公众教育活动，目的是为了搭建公众参与的平台，促进特殊需要儿童与社会公众的融合，提升公众对特殊需要儿童的理解与接纳度。

二、项目信息

- 1、资助对象：从事特殊人士服务的公益组织
- 2、资助金额及数量：2万元/个 数量约70-80个
5万元/个 数量约30-40个
总计约100-120个

三、入选基本条件

- 1、认可海洋天堂计划愿景、目标、理念；
- 2、具有清晰的组织架构、愿景、使命；
- 3、原则上为合法注册的公益组织，非公立学校或非公立福利院/中心；
- 4、具备较完善管理制度与专业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专业服务等；
- 5、具有一定的传播及议题倡导意识与渠道。

四、申请要求

- 1、项目内容：公众教育、社会融合
 - (1) 以社会公众为主体的参与性活动；
 - (2) 为特殊需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社会融合的互动性活动。
- 2、资助内容：
 - 2万元/个：包括活动经费
 - 5万元/个：活动经费、艺术硬件设备（设备由资助方统一采购）

3、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讲座、沙龙、运动会、艺术展、夏令营、艺术团、硬件设备等。

4、项目周期：2014年8月-2015年1月（6个月），具体以项目申请书为准。

5、预算编制要求：

（1）预算应合理设计，可开展多个小型活动；

（2）资助款仅用于活动开展经费，不得用于办公设备采购；

（3）资助款不设行政管理费。

五、申请资料提交清单

1、项目建议书及预算（模板请见附件）

2、机构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3、机构章程制度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4、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合作申明（加盖机构公章）

5、其他支持材料（机构所获荣誉相关证件）

六、申请方式

申请资料包括纸质版与电子版：纸质版申请资料于2014年8月4日18:00之前寄送至各枢纽机构，并同时以邮件形式发送电子版资料至枢纽机构邮箱，邮箱详见附表。

七、其他申请说明

1、因项目以工作网络模式进行管理，请申请机构按照附表中的省份分类指引到相应枢纽机构申请；

2、机构只能向其中一个网络的枢纽机构提出申请；

3、一个机构最多只能申请一个项目；

4、鼓励多家机构联合申请。

八、申请审批流程

1、申请时间：2014年7月21日-2014年8月4日18:00时

2、申请结果公布：2014年8月15日-2014年8月20日

3、各机构将申请资料提交至所在区域的枢纽机构处，枢纽机构根据提交的材料进行整理汇总，最终由海洋天堂项目专家委员会确定入选名单。

九、附件

1、附件1《2014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项目建议书》

2、附件2《2014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项目预算表》

3、附件3：枢纽机构联系方式

十、壹基金海洋天堂项目组联络方式

联系人：郭阳博、陈玫花

联系邮箱：hytt2014@126.com

联系方式：0755-25652651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 5030 号阳光儿童乐园 6 楼海洋天堂项目组办公室

附件下载地址：<http://www.sas.org.cn/index.asp?bianhao=1139>

2014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其他内容即将启动，敬请关注！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sortinfoview.php?id=9724>

[【返回目录】](#)

凉山社会性别与艾滋防治研究会寻求项目支持

各位同仁、朋友：

凉山州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防治研究会是四川凉山一家民间组织。我们的《凉山彝族流动农民工面临的社会性别歧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改善》在联合国性别基金第七期 73 份项目申请书投标中胜出（详细项目信息请见附录），成为 7 个中选项目之一。我们也收到了资助方的邀请函，参加联合国妇女署将于 2014 年 8 月 18-20 日在北京为中选项目组召开结果为导向的项目管理研讨会，并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及颁奖典礼，正式授予项目中标证书（请见附件邀请函）。

这个消息令我们非常开心和鼓舞。一家基层少数民族民间公益组织能够在本次全国性的招标中胜出和中选，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但忽然又得知，由于本项目赞助方出现了资金缺口，目前只能赞助中选项目 7 个中的 6 个项目，这个项目不能获得此次项目资金赞助。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获得赞助才能完成，由此，希望能有资源方支持我们团队，如能获得支持，我们组织将接受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代表技术指导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

为此，非常急切地特请朋友们帮着发这封求助信，希望帮着我们找到资助方，使我们能如期完成这个项目。感谢大家。

备注：1、赞助款请直接汇到联合国妇女署总部；2、联合国妇女署对于赞助款无法开具免税发票；3、赞助款金额应该不低于 54000 美金；4、赞助单位（个人）需要在 8 月 15 日之前有一封书面承诺信。

研究会负责人：白史各

电话：13340974799

信箱：674753982@qq.com

联合国性别基金联系人：MA Leijun—马雷军

电话：+86 10 8532 0936

信箱：uunwomen.china@unwomen.org

附：

项目名称：凉山彝族流动农民工面临的社会性别歧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改善

项目申请单位：凉山州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防制研究会

项目目标：通过东莞和凉山两地彝族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调研，倡导性别平等，改善彝族农民工就业歧视环境，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女性平等的就业、健康、教育等权利得到保障，推动社会制度完善。

项目经费预算：336,150 元。

项目背景与意义：近年来，外出务工成为增加凉山贫困山区农民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的主要有效途径，彝族农民工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据2008年“童工事件”（南都网，<http://nd.oooo.com/sszt/dongguantonggong/>，2012年3月访问。而这庞大的20万仅是指在广东珠三角一带的彝族农民工）。媒体报道，在珠三角的彝族临时工有近20万，目前已经有30万彝族农民工分散在珠三角的东莞、惠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江门等市区工厂，文盲半文盲率在彝族农民工中占70%以上，他们在东部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其就业权、健康权、教育权等基本生存权利遭遇了多重性别歧视，成为了被社会忽视和遗忘的角落。本项目将通过彝族流动农民工流入地广东省（东莞市）和流出地四川省（凉山州）两地的基线调研，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和视野开展凉山彝族社区文化与珠三角凉山籍流动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研究活动，探讨影响两地流动农民工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因素。对处于贫困的西部彝族社区和发达的南部珠三角制造业中的彝族农民工面临的多重性别歧视，以及现代社会性别制度中所反映出的对彝族女性叠加的性别歧视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如制度缺失、体制不健全、资源分配不公平等制度性障碍为凉山彝族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本项目将通过参与式调查研究探讨我国少数民族社区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最佳模式。旨在促进男女平等与社会公正，改善社会性别歧视环境。

凉山州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防制研究会简介：凉山州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防制研究会（简称研究会），于2005年3月23日正式注册成立，是一个致力于社会发展和抗击艾滋病的基层民间组织。已成功

申请主持 2005 至 2012 年全球基金第四轮、第六轮中国艾滋病项目、联合国第二个世界少数民族国际十年行动计划资助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艾滋病预防控制项目、加拿大基金援助项目、(美国)中国艾滋病援助基金会资助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科研项目等 16 项,参与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世界卫生组织项目、海外中华妇女学会项目、香港乐施会资助能力建设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10 多项,参加“第七届亚太国际艾滋病会议”、“中港艾滋病培训计划”、“第三、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10 多次,参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女性感染者网络、英国国际发展部、香港乐施会、全球基金、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全国妇联、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中国女性抗艾网络相关“性别倡导”、“性别策略与基层女性领导能力建设”、“社会性别与社区发展”、“社会性别与艾滋病”、“提高领导力和倡导能力,在艾滋病项目中纳入社会性别”、“女性感染者性与生殖健康权利”、“艾滋病医疗于职业安全”等相关社会性别领域的培训 10 多次。为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促进男女平等与社会公正,改善社会性别歧视环境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突出贡献。

来源: NGO CN

地址: <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893>

[【返回目录】](#)

“青杏网”青年发声性教育资助计划开放申请

“青杏网”(greenxxoo.org)是成立于香港的公益组织“易生活教育”(elife-edu.org)旗下的青少年性教育中文网站,旨在用轻松活泼、新颖有趣的方式介绍包括避孕常识在内的性知识。青杏网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九月上线,网站会设有青年发声平台,目的在于让年轻人参与性教育,并带动身边的更多的人,提升安全性行为的意识。资助计划现开放申请,详情如下:

计划对象:

全国高校的社团或个人

计划内容:

在当地开展与性教育相关的活动,可尝试多种不同形式,如做问卷调查、街访大学生并制作成短片、拍摄微电影、制作动画、录制电台节目等等,活动可持续数月至一年(如一年内每月录制一期电台节目,共 12 期),唯内容必须与性或性教育相关,成果将展示于青杏网及其社交平台。

资助金额:

最高三万元人民币

申请方式:

有意申请的社团或个人需提交详细的计划书, 清楚写明社团或个人的背景、计划开展的活动目的、详情、日程安排、预算, 在**2014年8月20日或之前**发送至 wang@elife-edu.org。

如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青杏网负责人王骁双 (Email: wang@elife-edu.org, 电话: 14715441727)。

来源: 易生活教育

地址: <http://weibo.com/p/1001603737984603144444>

[【返回目录】](#)

【刊物简介】

公益慈善周刊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策划编辑，旨在为 NGO 领导人以及政府民间组织管理负责人提供一周公益慈善新闻回顾，把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而为 NGO 机构发展与地方民间组织政策推动发挥积极作用！

【主办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人文与发展学院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民政部民间组织局相关政策调研项目、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以及众多国际与国内 NGO 的项目评估与监测项目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公益慈善领域主要关注的重点：

-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 公益组织发展咨询研究
- 公益项目开发、评估与监测
-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刊物订退阅】

如果您的同行或相关人士希望订阅此刊物，请发送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位至 gycsweekly@gmail.com 即可。

如果您希望退订此刊物，也请直接回复上面邮箱告知。

主办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董 强

编 辑：陈婉君、潘思佳、刘春霞

办公电话：010-62731470

电子信箱：gycsweekly@gmail.com